太和智库 | Taihe Institute | 太和文明论坛 Taihe Civilizations Forum

第四届
太和文明论坛
内容集锦

2020.09.06-12

目 录

太和文明论坛简介 …… 1
太和智库简介 …… 3
开幕式致辞 …… 5
分论坛主旨演讲 …… 17
国际关系分论坛 …… 17
教育文化分论坛 …… 77
前沿科技分论坛 …… 118
青年对话分论坛 …… 134
分论坛重要观点综合摘要 …… 139
媒体传播 …… 165

太和文明论坛简介

中国传统哲学经典《易经》有言：“保合太和，乃利贞”，展意为自然赋予万物独特禀赋，成就各自品性，协调万物并济，达至最高和谐，是为“太和”。其意旨在引导人们正确认知本我与世界，体悟其中深蕴的哲学道理，创造共同价值，进而获取源源不断的生活智慧与前行动力。

几千年后的今天，人类社会虽然步入高速发展轨道，但人类文明传承与可持续发展却面临种种挑战。科技飞速演进对社会伦理制度的冲击、人类生存环境面临的多重威胁、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的失衡、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等，正严重影响着人类文明体系的和谐运转与共同价值观念的建构。

2017年，太和智库发起创办太和文明论坛，每年一届，以“探寻共同价值，共谋和谐发展”为根本宗旨，以“科学文化 · 未来伦理 · 共同价值”为主题，以“严谨客观、面向国际、着眼前沿、务求实效”为原则，聚焦人类文明共生共享，发掘研究矛盾问题根源，寻求平抑化解冲突之道，旨在促进国家地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社会和谐恒续发展。

太和智库简介

太和智库是2013年于中国北京成立的一家以“凝聚全球精英，寻求共同价值”为使命职责，为中国发展提供决策依据，为世界交流提供智力支持的研究机构。

智库研究聚焦人文交流、教育文化、国际政治、民族宗教、前沿科技、财经贸易六个领域，目前已与中国政府主要部门建立了课题委托关系。除委托课题外，研究成果向全球发布，重大成果以太和智库丛书形式集结出版。

太和智库与近百家国内外知名机构建立了联系，合作领域主要涉及学术研究与交流，以及非官方活动组织。太和智库是“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及“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成员单位，是中美青年创客交流中心专家委员会主席单位。

开幕式致辞

Rashid Alimov

太和智库高级学者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
（2016–2018）

各位袍泽、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我很高兴能在祖国塔吉克斯坦的首都杜尚别向你们发来问候。古时的丝绸之路，商队总是星期一在此停留，因此杜尚别在塔吉克语中意为星期一。高耸的帕米尔山脉环绕着这座城市。伫立在直耸入云的山峰之巅，我们可以远眺地平线。每天，山鹰都会腾空翱翔，用强健的双翼划过蓝天。

此次论坛的任务就像山鹰穿透云层一样，要超越当前世界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努力为明日的世界、为过去六个月里极速改变的世界，打开一扇广阔的窗口。经济未能如期增长，却意外转向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因为这次危机，大多数国家过去二十年的成就付诸东流，数千万人下岗失业。

我们也见证了制裁是如何日渐成为地缘政治斗争中强有力的武器。对抗正破坏着各国业已建立的合作关系，我们忧虑地关注着中美、美俄以及美欧之间的风云变幻。

冷战，原本似乎已被人们遗忘，却如冰河时代一般悄然重来。世界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国际关系危机。而不幸的是，这已成事实。

很多人都在说新冠病毒才是罪魁祸首。当然，新冠病毒确实改

变了世界，使人类面临着残酷的疫情危机。但一切并非如此简单。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新冠病毒已经成为某些大国继续破坏国际关系秩序的借口，这一秩序正是当初它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我们都还记得，美国在疫情期间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

然而，除了对抗，我们还有别的选择，那就是平等对话、互动与合作。今年，世界将迎来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日。反法西斯和反军国主义的胜利与国际组织的诞生密切相关。这证明共同的苦难可以使人类团结起来，联合对抗挑战和威胁。

我们还可以再回顾另一个例子：2001年秋天，整个国际社会都在支持美国打击恐怖主义。原本我们是有机会建立有效的全球反恐战线的。但不幸的是，我们错失了这个机会。与此同时，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阿富汗的局势也一直没有改善，远远没有实现和平与稳定。此外，在过去二十年中，滋生不稳定因素的温床不断涌现，世界遭受着国际恐怖主义的摧残。

但现在，建立全球统一战线的机会再次出现了。这次大家可以共同对抗新冠危机。毕竟，此次人类危机并非源于个别国家或民族，而源自不分国界、肤色和种族的致命病毒。这次新的威胁让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再强调一次，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我们要记住不仅发达国家需要抗病毒疫苗，贫穷的国家也需要疫苗。我们要让每个人都能接种疫苗。我们要并肩战斗。在这场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向发展中国家伸出援助之手，并通过金融、医疗、教育和其他手段帮助他们克服这次疫情危机。

人类必须从历史的教训中得出正确结论，共同行动，调动在健康、教育、食品和生物安全领域的合作潜力。太和文明论坛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能够让我们讨论一系列紧迫的问题。然而重要的不仅是讨论当代紧迫的话题，而且还要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共识。仅仅适应已经改变的状况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重启文明对话，利用共同的机遇，为所有国家和民族建设更美好的世界和可持续的未来。

俗话说得好，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山鹰翱翔高空所以拥有广阔视野。我们的论坛集合了世界各地的权威专家。毫无疑问，通过共同努力，我们也可以高瞻远瞩，看清人类发展的方向。

谢谢大家！

这是我有幸第四次参加由太和智库举办的太和文明论坛。我是这个论坛的见证者、亲历者和推动者。

论坛因时而立、因时而兴、因时而勃。四年来，论坛坚守太和智库的本真和初心，紧跟时代步伐，聚焦世界变局、前沿科技和人文交流，汇聚天下英才、有识之士，辨析真伪、廓清事实、激浊扬清、去芜存菁。微言大义、黄钟大吕均承载着警世、醒世、喻世和启世的历史担当。这就是太和文明论坛的坐标经纬，这就是太和智库的家国情愫和世界胸怀。

太和文明论坛走过的每一步，都是太和智库人智慧和心血的付出。太和文明论坛的每一次提升，都得益于参与论坛者思想的碰撞和价值的认同。太和文明论坛取得的每一个成果，都有赖于各界的鼎力支持与垂注。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四年来，太和文明论坛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太和文明论坛走过的四年是世界风雷激荡、波诡云谲的四年，是竞争与合作、霸凌与抗争、“脱钩”与互联、共生共存、相互交织与叠加的四年。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人类社会更懂得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更能体会“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与此同时，在时代的嬗变中，也沉渣泛起、乌云笼罩，特别是美国一些极端势力的政客，丧失理性与良知，不择手段地挑动中美对抗，千方百计地遏制和打压中国，处心积虑地要与中国“脱钩”，蓄意要把中国拖进“新冷战”的深渊，这是中美之殇，是世界之痛。中美两国人民不会答应，世界人民也会说“不”。天理昭昭，报应不爽，鼓噪“脱钩”与“新冷战”的人必将自食其果，以失败告终，这是历史的铁律。

吴海龙

太和智库首席国际关系学者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国会走稳自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中国的疫情已得到控制，经济在复苏，人心在凝聚。中国不会畏惧任何强权和霸凌，中国将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任何势力都休想阻挡中国的崛起和复兴。

太和智库和太和文明论坛将一如既往，洞明世界之变局，厘清国际之乱象，在守拙中奋进，在抱朴中前行，为中国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展贡献真知灼见和智慧良策。囿于线上，惟愿本次论坛开得有水平、有质量、有深度、有成果。

谢谢大家！

H.E. Vladimir Norov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我很荣幸参加第四届太和文明论坛，这是一个重要的研讨平台，其权威性不仅在中国得到认可，也受到国外专家的好评。无疑，这次论坛性质特殊，因为在此论坛召开期间，我们还处在由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流行病及社会经济危机之中。

在此困难时期，我们见证了亚洲大家庭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抗击疫情的努力。我们进一步夯实了“上海精神”，是这种精神使我们走到一起，进行更为密切的合作。人类所面对的种种考验愈加显示我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疫情表明，世界是相互关联的。这场疫情危机对世界发展的影响难以预测，并可能引发现代世界秩序的根本改变。

全球和区域安全面临的新旧挑战正在升级，要求国际社会通力合作、协商应对。首先，疫情还没有促成一个整合多边资源的有效平台，以共同应对这一新的全球性挑战，这格外令人担忧。相反，如今我们看到的是各国之间的不信任加剧，主要国家之间非但没有加强合作、共克时艰，反而把注意力集中在疫情追责问题上。

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被卷入疫情制造的这场混乱当中，产生了对全球生产链复苏、良好的贸易与投资环境恢复的极大负面影响风险。此外，疫情还有可能破坏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在平等、协商一致、协同合作、互相信任、互利共赢、和平解决争端、放弃对抗及阻挠思维基础上的国际关系变得更加重要。

在21世纪头20年里，这些原则尤其突出地体现在上海合作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当中。上合组织覆盖了欧亚大陆60%的领土和世界近一半的人口，持续形成了未来全球新集合架构的雏形。

亚洲国家审慎应对了这场突发性的生物安全危机。我们对一些国家率先成功研制出新冠病毒疫苗而倍受鼓舞。我们对世卫组织的立场表示声援，疫苗不应受政治利益和国界的影响，人人都应该尽可能地拥有获取疫苗的广泛途径。在即将召开的圣彼得堡亚洲峰会期间，我们计划通过一项联合行动计划，以抗击各类流行病。该计划旨在采取具体措施，以深化在流行病学和生物安全领域的合作。与此同时，防止新冠病毒毒株、其他生物制剂以及用于生产疫苗的危险化学物质和技术落入恐怖分子手中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亚洲成员国认为有必要进行多边谈判，以制定一项针对制止化学和生物恐怖主义行为发生的国际公约。

各位，尽管这场疫情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但也给世界带来了新的机遇。最重要的是，疫情加速了几乎所有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的数字化转型进程。现代世界正处在前所未见的革命性技术变革的边缘。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促进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已成为世界贸易和整个世界经济动态及范畴的关键推动力。显然，疫情过后，数字经济将在重建世界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日益复杂的世界里，每个国家的战略任务都是发展一套有持续性创造力的高科技教育体系，以达成教育体系、经济和社会整体发展的战略目标。多亏了21世纪年轻人的无限热情和求知好问的精神，技术革命才得以实现。

要提高青年人才的专业水平，就必须持续培养和重视他们。亚洲地区有八亿多青年，几乎占世界青年总数的一半。亚洲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与年轻人合作，引导他们将精力投入到培养创造力上。其中，最重要的是让他们获得高质量的教育，从而充分发挥他们的个人潜力。最后，我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并能就论坛议程的各个方面展开卓有成效的对话。

谢谢大家！

太和文明论坛的主题是“科学文化·未来伦理·共同价值”。确立这样的主题，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对此，我向太和智库表示祝贺。太和智库又一次证明，其为认清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挑战、寻找解决方案所做的努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要的。的确，我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且这些挑战还在不断增加。

如今，我们面临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一场危机，这场危机对政治、经济、社会和人道主义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后果。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影响了数百万人的生活。而疫情还在持续蔓延，带给我们巨大的伤害和痛苦。

这场疫情不仅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负面影响，而且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估计，疫情导致的经济不确定性，可能造成全球经济超过1万亿美元的损失。国际劳工组织预计，在全球范围内，约有12.5亿工人会失业，或者面临收入减少的风险。联合国粮农组织也向全球发出警告，要保证食品供应链的稳定，确保粮食生产以及粮食安全。

疫情导致经济萎缩，就业机会大幅减少，不平等问题加剧，贫困人数增多，还对我们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几十年来为达成并履行国际协定所付出的努力都可能会付诸东流。这里说的国际协定指的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协定》。

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是发展中国家，而首当其冲的是那些没有完善的医疗卫生体系、没有经济或者财政能力应对如此重大危机的国家。对极度缺乏抗风险能力的国家来说，疫情是雪上加霜。这些国家需要更多的帮助和支持。

Irina Bokova

太和智库高级学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2009–2017）

毫无疑问，这场疫情危机是联合国和人类在和平时期遇到的最严峻挑战。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危险时期，和平和安全都可能受到威胁。很重要的一点是，新冠肺炎疫情不分地理或政治边界，不分政治制度，也不分种族或者宗教，每个人，无论身处何地，都有被感染的风险。这一全球性的威胁需要全球携手应对。纵观人类近代史，全世界共同采取行动对人类的存续及和平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要。

在这次全球合作中，联合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我们需要领导者。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值此之际，联合国需要重申践行多边主义的现实意义和成果。这场疫情及其带来的各种影响凸显了践行多边主义的重要性。政府间需要加强合作和对话；科学界及高校机构需要积极开展研讨交流；全世界需要持续加大对民生、科研、教育和学习上的投入。与此同时，国家之间、国家内部的不平等问题都在加剧，这对人类尊严、社会包容、可持续发展以及和平造成了巨大挑战。公平正义和道德伦理问题是这次讨论中的关切。本次论坛也将围绕发展伦理、科研伦理，以及气候变化的伦理问题进行充分讨论。

提到发展伦理问题，最能凸显公平和正义的莫过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最终目标：不落下任何一个人，优先帮助最困难的人。这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道德准则和深刻的伦理基础。2015年9月，在联合国总部，193个成员国一致通过了可持续发展目标，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表明，伦理道德不是只有少数人能负担的奢侈品，而是整个人类发展的基础。

在制定这些目标之时我们就已经反复讨论到，要想不落下任何一个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减少不平等，为所有人创造平等的机会。当时，我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和联合国发展小组成员意识到，让所有人获得高质量的教育、医疗服务、能源、基础设施等机会对于每个人发挥自身潜力是极其重要的，而在当时这一共识的达成异常艰难。

但要实现这些目标，这场疫情已经清楚展现出，我们需要加强科学合作，推动全世界共享科学成果，让科学更深刻地为政策制定提供建议。科学需要靠对话、各民族和各文化的交流、灵感火花的碰撞，才能繁荣。同时，科学必须符合伦理道德。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国际科学、技术和创新合作的模式。全球围绕科学、技术、减贫、环保等问题携手合作。如果人们口中的进步只让一少部分人受益，而不能消除贫困、减少不平等，不能保护我们所居住的地球，那么这样的进步毫无意义可言。

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对本就千疮百孔的多边秩序是一记重击，但与此同时，它也进一步提醒我们，战胜危机的方式是重新践行多边主义。疫情以这种方式，简单明确地再次提醒我们国际合作的首要前提：单边主义无法应对当今时代的挑战。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不管是国家之间陷入争端，还是危机不断恶化，我们都会发现，没有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闭门自守、破坏国际秩序的路行不通。如果没有一套全球性规则的话，我们的成果只是昙花一现，问题依然无法解决。这场疫情正深刻地暴露出这些问题的极端严峻性。

最后，我深信，我们需要重新致力于践行多边主义，重申对联合国的承诺。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全球性的政治社会契约，造福全人类，保卫和平、改善民生、保护环境、减少不平等、促进科技进步。我希望这届论坛能够成功解决这些问题，并且为全球寻求对策。

谢谢大家！

Stephen Orlins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

参加太和文明论坛这么多年，这是我第一次不在现场。我很想念太和的朋友们，这几年，我向你们学到很多东西，特别是太和智库理事长彭彬哥先生。我和彬哥先生经常讨论问题，虽然我们有的时候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但是我们有很深的友谊，所以我们的讨论总是很精彩，很有成效。

今天论坛开幕，我想跟大家说，无论美国政府说什么、做什么，还是有很多美国人相信，过去的 40 年，建设性的中美关系，为亚洲带来了和平、繁荣、稳定。我以前提到过，我 50 年以前开始学中文，是因为我相信美国人会说中文、了解中国，中国人会说英文、了解美国，可以帮助中美关系健康和平地发展。我不同意“接触政策失败了”的说法，我 50 年以前就支持接触

政策。到现在，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每天我都在跟美国那些要让中美关系脱钩的政策斗争，因为那些政策对美国人民不好。把中国妖魔化，驱逐官方媒体，扩大实体清单，并且不解释为什么；拒绝签证，也不解释为什么。关闭休斯顿领事馆，而且可能禁止使用微信和抖音，这些政策，伤害中国也伤害美国。

但是为了成功地反对这些政策，我需要你们的帮助。我需要你们帮助我改变美国国内的一些看法和说法。有一些美国人，不再相信建设性的中美关系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我需要你们帮助我把这些人争取过来。怎么争取？有很多事情中国可以做，比如在不涉及南海主权的前提下，将南海国际化；进一步开放对外投资和贸易；比如邀请被驱逐的美国记者回到中国，开放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其他一些美国媒体，允许 Facebook、Youtube、Google、Twitter 这些公司在中国运营，限制香港国安法的域外管辖。

接下来的两个月会非常艰难，但是不管下一个美国总统是谁，我都需要你们的帮助。我知道太和文明论坛的朋友们和我一样，相信建设性的中美关系，会影响我们下一代的未来。所以请你们帮助我，帮助我改变美国国内的那些看法和说法。

我非常想念大家，希望明年能在北京见到你们，祝太和文明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尊敬的各位阁下，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我十分荣幸能在这一重要论坛上发表演讲，感谢主办方太和智库在这一关键时间节点举办太和文明论坛。我相信这次线上论坛将会推动国际上一直以来对世界未来的讨论，并希望能够借此机会加深各国之间的理解。

为强化多边主义进程，我们需要共同寻求应对流行病、气候变化、不平等、国际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等严峻挑战的国际性对策。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全球合作平台，以应对这些挑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是帮助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机构。

中国致力于发展多边主义，并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进展。中国使脱贫成为可能。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吸引了近 70 个国家，给世界社会与经济发展带来更多可能。我很高兴我的祖国阿塞拜疆是首批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

虽然世界仍面临各种各样的冲突，但我们也越来越认识到，你我同是地球旅人，我们的未来和人类的未来取决于地球的社会经济条件及其物质存在。

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看到了国际团结协作的短板，同时也强调了人类需要树立共同承担未来责任的意识。尼扎米 · 甘伽维国际中心秉持人类共同体的理念开展行动。

Rovshan Muradov
尼扎米国际中心创始秘书长

在尼扎米·甘伽维国际中心全球网络的支持及董事会成员的指导下，我们向世界 30 多个国家提供医疗以及各类救助。我们也努力通过举办一系列线上会议、采访和宣传活动来最大限度地提高全球合作意识。

尼扎米·甘伽维国际中心关注世界最新动态，我们的成员和友人在向联合国、二十国集团、联合国安理会和世界各国政府公开发声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强调全球停火、粮食安全及营养、教育、贫困、儿童保护等问题的重要性，并呼吁使新冠疫苗成为造福数亿人的全球公共产品。

最后，我想重申尼扎米·甘伽维国际中心的使命，那就是在不同文化及国家间搭建沟通的桥梁，从而促进和平、扩大包容以及加强对话。人类只有携手并进、共担责任，才会变得更加强大。

谢谢大家！

国际关系分论坛主旨演讲

中亚是国际合作的空间
而非美国可强加意志的“大国博弈场”

Rashid Alimov
太和智库高级学者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
（2016-2018）

中国和美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中美是世界上最为领先的两大经济体，在过去四十年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相互补充。中美之间的任何紧张局势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最近美国针对中亚推行的新战略就是一个例证。有文件指出，美国在中亚最为关键的政治目标是“帮助中亚国家维护主权以及抵抗其他大国”，其中主要针对的是俄罗斯和中国。

但这份文件并没有指出是哪一个中亚国家的政府请求美国保护其主权。该文件还提到美国应该在战略性发展领域，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之外的另一选择；在安全领域，成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补充选项。为实现这一政治目标，美国可以为中亚国家提供军事装备和训练军事人员，帮助中亚国家减少对俄罗斯和中国的依赖。需要格外注意的是，这样做还可以使中亚国家向美国打开军贸市场。此外，美国军事援助还可以激励中亚国家加强与美国在打击区域极端组织方面的合作。从自身

安全角度来讲，美国对这一合作很感兴趣。但文件同时也提出，“只有这样才能阻止中国和俄罗斯在中亚的行动”。

本质上讲，这个战略不是一个合作性战略而是一个竞争性战略，会使中亚发生冲突的潜在可能性上升。中亚并非美国能够随意强加意志的“大国博弈场”，而是一个更加广泛的国际合作空间。每一个中亚国家都有其自身的发展战略，但同时也拥有共同的区域性目标，其中最为紧要的是应对阿富汗地区的系统性安全挑战。在过去四十年中，阿富汗的“结”越系越紧，即使联合国、个别国家和国际组织采取过一些行动，这个“结”仍然没有办法解开。阿富汗的冲突显然只能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来解决。

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可以与中亚国家一道，通过合作，为阿富汗重建和平与稳定作出决定性贡献。同样，也应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加强合作，但美国在这方面同样未能给国际社会做好表率，其退出世卫组织的举动令人非常失望。面对全人类的共同威胁，负责任的大国应该展现出领导力并加强互助合作，而不是制造紧张局势。世界仍希望中美能够缓和紧张关系，这不仅符合中美两国利益，也能够改善整个国际大环境。

中美军事冲突，威胁来自何方？

陈虎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世界军事》杂志总编辑
（2006-2019）

最近一段时间，随着美国打压和遏制中国的行为全方位不断升级，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军事冲突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人们研究和讨论的一个话题。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表明中美军事冲突的结果只能是双输，甚至是多输，因此中美军事冲突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小概率事件。尽管是小概率事件，但由于中美军事冲突对中美两国乃至世界产生的负面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因此无论是中美两国还是相关各方都在试图避免中美军事冲突。那么要想避免中美军事冲突，首先就要搞清楚中美军事冲突的危险和引发的要素来自哪里。认清危险来自何方，才有可能有效地避免或制止中美军事冲突的发生。

寻找中美军事冲突的危险来自何方，首先是要从中美双方着手加以研究。毕竟，中美双方是冲突的两个主体，那么我们首先从中国一方来看。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努力地适应和融入现有国际准则，并且摸索和建立起来一整套在现行国际准则原则下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方法和途径，关于这一点，中国40年来的发展成果就足以证明。所以说尽管今天的中国也面临许多内部和外部的困难与问题，但几乎没有什么问题和困难是不能够通过自身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加以解决的。所以从这个逻辑上讲，中国是现行国际规则的执行者和维护者，在中国不存在用军事冲突解决困难的主观动因。从客观方面来

讲，中国上至领导人，下到中国的军队和中国的民众，他们的目标是高度一致的，中国军队的高度纪律性和党指挥枪的原则，使得中国军队出现背离国家意志的异动情况，被压缩到了趋近于零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因此从客观因素来讲，因为中国某些执行层面的误操作，而引发中美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趋近于零的。

下面我们再从美国的方面来看，由于美国自身的问题，使得美国正常的发展出现了诸多障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美国对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产生了高度的焦虑感，在这种焦虑感面前，美国的决策者中有人开始主张把与中国的和平竞赛改变为敌性的竞争。在这种竞争出现了不利于美方的趋势时，这些人不再满足于对现行规则的有限调整和完善，而是主张重新建立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新的国际规则，那么在这里实际就潜伏着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主观动因。2015年美国兰德公司在研究中美军事冲突的报告中，在对中美军事冲突的多种形态进行对比研究之后，认为无论哪一种冲突形态，对于中美任何一方而言，它的损益比都要大于一。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一方，军事冲突所带来的损失都会大于收益。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兰德公司认为中美军事冲突不是一个好的选项。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认为，尽管军事冲突对中美双方的损益比都要大于一，但就单方损失而言，中方的损失会比美方更大。同时兰德公司还认为在使用常规手段的军事冲突当中，中方相比于美方存在着明显的短板和弱项，美方可以有效地对中国大陆实施高强度的打击和攻击，而中方在使用常规手段的情况下，对美国本土无法形成有效打击。那么这样的两个结论隐含着美国对华主动使用武力挑起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虽然双方的损益比都大于一，但如果美方可以承受己方的损失，同时能给对手造成更大损失的话，美方就有可能走上诉诸武力的选择。同时既然中方存在着由于地缘劣势所造成的常规远程打击手段不足的弱势和短板，那么只要有效地控制冲突的强度和规模，美方就有可能从这种军事冲突当中更多获益。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美方的战略决策当中，实际上潜藏着使用武力引发中美军事冲突的主观动因。从客观现实而言，美国的国内政治在某些特殊的特定的时期内，比如选举时，会出现党派利益高于一切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就有可能根据党派利益的需要，采取超乎常规的行为，这为中美军事冲突增添了客观的不可测、不可控的风险性。与此同时，美国军力大量的前沿部署和在中国沿海大量的侦察、演习、巡逻等等“贴边”行动，客观上增加了中美双方作战力量的近距离接触和摩擦，这将成为引起突发事件的主要客观危险。

研究中美军事冲突的危险来自何方？主要是要研究中美双方，但是也不能忽视中美双方之外的第三方。美国在遏制中国的过程当中，乐于看到甚至积极挑动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矛盾甚至冲突，与此同时也不能排除一些国家希望利用中美冲突实现自身战略利益的最大化。这样就存在一种风险性，即美国怂恿和支持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对抗，甚至是军事冲突，而在这一过程当中，美国又可能被拖入和卷入其中，最终形成了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

此外，除了中美两国和相关国家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非国家政治势力，这些势力鱼龙混杂，其中不排除有些势力希望利用大国间的对抗和冲突，“浑水摸鱼”乘机做大。比如说国际恐怖主义势力，这些年在世界各国联合反恐的打击下，已经开始逐渐式微。但如果大国间发生军事冲突，国际反恐联盟完全崩解，这显然是他们乐于见到的事情。

如果有机会他们也会利用各种手段积极地促成，特别是利用中美两国军队作战平台的近距离接触与摩擦，制造某些突发事件，引起“擦枪走火”，这样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此外，中国还面临多种极端分裂主义势力，这些势力也会在中美之间制造各种各样的事端，引发中美两国的矛盾和冲突。极端情况下，这些势力有可能会有意为之，造成一些行为，成为引发中美军事冲突的导火索。

虽然从表面上看，中美军事冲突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通过我们上述一系列分析就会发现诱发中美军事冲突存在多源性的诱因，正是这种多源性客观上导致中美军事冲突虽为小概率事件，但很难完全排除。

要想避免中美军事冲突的爆发和扩大升级，至少要作出三个方面的努力。第一，中美双方必须要达成共识，并建立相应机制防止第三方因素引发中美军事冲突的爆发和升级；第二，中美双方必须建立多层次的信息传递渠道和沟通管道，避免因一方内部因素诱发中美军事冲突；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中方必须让美国清晰地看到，美方在中美军事冲突当中的损失是其无法承受和绝对不能接受的，任何将中美冲突控制在较低强度和有限区域的想法都是幼稚的，同时也是不现实的。只有如此，才能彻底打消美方通过军事冲突获利的主观动因，在这样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使前两个方面的努力具备实现的基础。

美中关系：21 世纪的挑战

Susan Elliott

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

自美中建交以来，双方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方面始终存在分歧和不同。随着两国经济体量的不断增长，尤其是 1979 年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现象级的发展，两国之间又产生了一些新矛盾。自去年 11 月以来，先是美中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达成一致，随后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在全球蔓延，接着华盛顿和北京都出台了一些负面政策，比如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和美国驻成都总领馆。

美中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不仅会对亚太地区国家造成负面效应，更会给全世界带来灾难性影响。目前美中关系似乎正处于“螺旋式下降”的状态中，两国必须设法结束这一趋势，因为其结果不仅会对美中产生负面影响，也会威胁国际社会的安全。美中两国经济总量约占全世界的 40%，如果两国始终互相攻击、互相仇恨，那么全世界都将陷入极端不稳定的状态，很难实现商贸和经济繁荣。

考虑到现在世界经济正处在下行状态，尤其是疫情暴发以来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会给每个人造成困难和挑战，建议美中两国采取以下几点举措，以便尽快改善双边关系的恶化态势。

第一，停止在疫情问题上互相指责。美中可以通过外交和私人合作的方式发展针对新冠病毒的诊断、治疗和疫苗研发，而不是指责对方。在疫情得到控制后，双方也需反思如何防止未来再次发生疫情。

第二，重启经贸及双多边议题对话。两国间有很多争议点，但双方需要通过对话和公开讨论来解决彼此之间的问题。美中都不应单方面禁止对方公司在自己国家的活动，同时避免强迫其他有关各方“选边站队”，并应通过多边途径来解决技术等方面的摩擦。美中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需要合作，“脱钩”并非是正确选择。

第三，逐步放宽针对留学、公务来往、旅行和记者入境的限制措施。人员交流互访是双方建立互信、增进相互理解的重要途径，两国应通过对话解决问题，而不应损害两国以及世界各国间的人员流动与往来。美国制定对华政策应以基于风险的国家中立战略为基础，同时还要考虑全球所有国家政府的数据实践、人权记录、政治制度和法律环境等情况。

最后，关注和解决美中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中国需要对国际社会的关切做出回应。同样，美国也应在这一问题上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沟通协作，而不是单方面强行制裁中国。双方都需要在这一重要问题的解决上付出更多努力。

美中两国应共同努力，成为支持国际秩序和体系的领军国家，否则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不仅会对彼此造成不可修复的损害，还会影响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全球的经济安全。

当前，像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和太和智库这样的机构可以在促进两国沟通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美中双方智库间的互动，有助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加强美中在众多领域的交流与互鉴，为美中关系的稳定作出贡献。

中美关系以及国际体系

Thomas Fingar
美国斯坦福大学 Shorenstein
APARC 研究员

中美关系是围绕国际体系进行预测和解读的中心议题。中美政府做出的决定将对全球体系产生重大影响，但国际体系的发展也将制约和影响中美两国的选择和行动。许多国家认为中美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乐于看到一定程度的摩擦，因为这会为他们提供可乘之机。没有哪个国家想要纯粹的对抗，这会迫使其在两极世界中选择立场。也没有哪个国家希望中美关系过于密切，因为“两国集团”会限制他们自身的行动自由。第三国的行动将影响中美两国政府的选择，因为他们试图重置国际关系。没有什么结果是无法避免或不可改变的。

中美关系能被重置吗？如今的中美关系陷入低谷。有些人坚持认为进一步的恶化和对抗是不可避免的。其他人则认为也同时希望，关系重置和合作恢复是可能的。这两方都希望中美关系得到改善，从而重置关系。但是，这种重置的性质以及随后发生的情况很难预测，因为这将取决于两国多方行为体所做决策的相互作用。单靠一个国家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特朗普通过妖魔化中国，转移人们对疫情和美国其他问题的关注。拜登虽拒绝妖魔化中国，但也申明必须解决长期恶化的双边问题。但竞选口号并不能准确预测当选后的外交政策。 如果特朗普成功连任，他可能会设法重置两国关系。虽然他不像政府中的其他人那样反华，但他的方式与拜登政府将大不相同。 两人都将设法改善中美关系，但都不会设法恢复在以前那种条件下形成的高度不对称关系。

- 两人都将设法改变影响美国利益的中方行为；
- 两人都将要求增强互惠；
- 特朗普将采取单边行动；拜登将采取多边行动；
- 拜登的做法将更有利于美国和国际体系。

“脱钩”还是重新接触？“脱钩”是一个无益的概念，一个我们都不希望看到的目标，以及一个不太可能实现的政策结果。全球化带来相互依赖，但新冠肺炎疫情却突显了过度集中和单点故障脆弱性的危险。每个参与主体都尽可能通过多样化来控制风险。自中国在冷战高峰期获得进入“自由世界”制度的独特渠道以来，全球体系中发生的变化，将加速推动减少对中国依赖的程度。目前，数十个国家都在设法跟随中国的发展路径，通过开放市场，换取在全球生产和供应链中的一席之地。企业和其他国际行为体都将对中国国内外所出现的机遇做出回应。经济和其他方面的考量相比与中国脱钩的政治辞令更为重要。相比于美国政府所做的决策，中国政府如何应对私营部门参与者的合理担忧，将成为更为重要的决定因素。

特朗普和拜登将采用不同的方式来应对我所说的“接触 2.0”。拜登将设法重振和调整美国传统的接触政策，这些政策旨在依靠基于规则秩序来降低风险，而这种秩序能够促进一体化和相互依赖。和中国一样，特朗普将追求更强的经济民族主义。虽然下一届美国政府采取的方法非常重要，但对接触或脱钩的类型以及程度的影响将小于中国政府做出的决策。与美国政府相比，中国在限制美国和其他外国势力、交流机会和接触方面做得更多。如果中国政府继续这样做，特朗普或拜登政府就会采取类似的限制措施。

我们将会面对哪种类型的中美关系？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但直到最近，中国才开始在美国的政策制定中扮演类似的角色。从老布什到奥巴马政府都曾试图为对抗苏联的大战略制定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但都以失败告终。特朗普非常强调冷战战略的关键要素，甚至试图把中国放在苏

联的位置上，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焦点。他的“回到未来”方法的某些部分是有意义的，但其他许多部分既不合适也不可行。虽然几乎没有人想要冷战“2.0 战略”，但事实证明，设计一个总体框架还是有困难的。其中的挑战包括：

- 就美国在维持基于规则秩序方面的适当作用达成共识；
- 调整盟友和伙伴关系中的责任分担；
- 修改冷战政策，与盟友和合作伙伴的要求相比，这些政策给予他们更多进入美国市场和获得其他资源的机会；
- 在冷战背景下进行国内政策重组。

中国将是美国下一届政府应对这些挑战的核心，但也并非唯一的考量因素。

虽然中美关系中的摩擦不容忽视，但不太可能主导两国的政策制定，因为两国都面临着严峻的国内挑战。两国外交政策都将为推动国内目标的实现而制定。这一现实将限制脱离接触的速度和程度，并有助于建立更加积极的中美关系。

未来中美关系怎么走 三个问题不能回避

郭长林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知名国际问题专家

中美关系现在处于建交以来的非常时期。反常俨然成为正常，乐观变成稀有商品。许多人对中美关系失去了信心，认为至暗时刻正在到来。我对中美关系依然抱有信心，相信不会一路走到黑。黑夜再长，也有明天。明天可能是阴天也可能是晴天。即使是阴天，也比黑夜要好。当然，晴天出着大太阳，也可能下冰雹。但那毕竟不是常态。

我有一种感觉，11 月初美国总统选举尘埃落定之后，不管是共和党的特朗普总统连任，还是民主党的拜登入主白宫，中美两国之间“怒与火”的紧张关系会有所降温，日子还得过，希望双方能够冷静下来，认真思考两国关系未来怎么前行，不能就这么烂下去吧？当然，最理想的是推动两国关系“行稳致远”。

未来两国关系怎么走，能不能“行稳致远”？有些根本性的问题恐怕是不能回避的，需要我们接受现实，超越一些思维定式，作出选择。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7 月 9 日在中美智库媒体论坛上的致辞，我想美国朋友可能都研究过了，不用我提醒这篇讲话多么重要。总体来看，未来中美关系怎么走，王毅代表中国政府，把该讲的话都讲了，把该传递的信息也都传递了。特别希望民主、共和两党的竞选团队重视这篇讲话。

作为一个长期跟踪中美关系、也在中美关系第一线工作多年的学者，我提出中美关系中三个突出的现实问题，和中国和美国的朋友们探讨。

第一个问题：中美这样两个大国之间可不可能有“战略互信”？或者说，中美两国之间建立“战略互信”这个门槛是不是太高，甚至高不可攀?

中美两国之间一直存在着“战略互信”问题。这不是什么秘密。从克林顿政府说起。中美双方达成共识，承诺共同致力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虽然调子定得很高，但是未见两国之间“增加多少信任，减少多少麻烦”。

小布什政府“逢克林顿必反”（anything but Clinton），当然不接受克林顿时期对中美关系的定位，但是由于突发的“9 · 11”事件，调整国家安全战略，以反恐大局为重，搁置了本来要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构想。双方同意共同致力于“建设性合作关系”，开始搞战略对话，从“高级别对话”（senior dialogue）到“战略经济对话”，再到“战略与经济对话”，也未见两国之间增加战略信任。尤其是，他发现这些年来美国忙着反恐，中国在“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综合国力明显提升。他感叹，没想到中国的发展这么快，成为一个更加强大的 “战略竞争者”。

奥巴马政府期间，两国同意“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 21 世纪的积极合作全面关系”，中美战略对话全面展开。同时，中国领导人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场合，反复跟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讲：中国的发展将是和平的发展，我们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对美国构成威胁，我们无意、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第一把交椅地位。可谓推心置腹，苦口婆心。但是我们发现，他们根本听不进我们的解释，不相信我们的“战略意图”，所以仍是“你说你的，我做我的”。

从小布什政府开始到奥巴马政府任期期满，中美之间一共进行了 16 年的战略对话，但是两国之间的战略信任却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说的“战略互信赤字”。那时，我们就在认真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中美两国之间可不可能有“战略互信”？如果两国之间根本不可能建立“战略互信”，不存在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的可能性，未来两国关系如何管控而不出现“战略误判”？

我们的担心现在成为现实。王毅表示，当前整个美国对华政策就是基于缺乏事实依据的“战略误判”。

美方对中国的无端猜忌已经到了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地步。似乎每一项中国投资都包含政治目的，每一位留学人员都带有“间谍背景”，每一项合作倡议都“别有所图”。只要跟中国扯上关系，甚至扯不上关系，都上升到国家安全高度。逢中必反，成了新的“政治正确”。

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不可能为中美战略竞争设置一个“底线”，使中美之间战略竞争可控，双方还能够“共处”？

中美关系演变为“战略竞争关系”，应该有 20 年时间。2000 年，美国国内就出现“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这样的提法。首先提出这一看法的就是当时作为共和党候选人的小布什。但是，他上台不久就发生了“9 · 11”事件。“9 · 11”事件改变了他的战略关注点，使他未能实施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构想。

奥巴马政府虽然没有讲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但是事实上明里暗里已经开始与中国展开 “战略竞争”。美国把战略重心从欧洲转移到亚太，加强在亚太地区前沿军事部署，在中国家门口拉帮结派，专门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完全不顾及是否刺激中国。美国对南海的所谓“中立”政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在南海频频挑战中国。那时，所谓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战略较劲已经很明显， “修昔底德陷阱”已经成为热门的话题。

2017 年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出台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认定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正式认定中美关系是“战略竞争关系”。2020 年 5 月，国安会又发表《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明确特朗普行政当局“如何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至此，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关系正式确立，同时也出现了美国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没有底线的发展势头。

有一点我想指出：虽然民主、共和两党在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与中国的关系是战略竞争关系上有共识，但是在“竞争什么”“如何竞争”以及要“达到什么目的”这些问题上，也就是说在“用什么手段达到什么目的”上，是完全没有共识的。

有美国前政府官员指出，特朗普政府正在重犯接触政策未能改变中国的错误，企图通过与中国进行

战略竞争，迫使中国投降，搞垮中国。美国的建制派中，许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不同意这种以“迫使中国投降，搞垮中国”为目的的“战略竞争”，不同意与中国进行没有底线的“战略竞争”。他们认为，应该为中美关系，其中包括与中国的战略竞争“设置一个底线”。

综合起来看，主要有这么一些看法：

战略竞争，但不能与中国脱离接触，不能与中国“脱钩”。该竞争的地方竞争，但是需要合作的时候还是要合作。战略竞争，但是不能出现灾难性后果，不能打架，不能发生军事冲突。战略竞争，但还是要共存，共同演进。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对外政策顾问最近接受 CNN 采访时也说：未来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两国应该“比高不比低”。他说的“比高”，就是比国内的力量，看谁能够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做得更好。他不赞成特朗普政府用“low 的手段”就是低级的手段跟中国进行战略竞争。

战略竞争，说到底还是“竞争”。竞争（competition）就是比赛。不管什么样的比赛，拳击也好，还是决斗，都讲“规则”。而且这些规则应该是国际公认的规则，任何一方必须遵守。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不得凌驾于规则之上。

第三个问题：中美这两个有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经济制度的大国能不能和平共处？这是美国必须做出的根本性选择。这不仅关系到中美关系的未来，也关系到世界的战争与和平。

我想起《上海公报》的一段话：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这些原则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的《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都重申了这些原则。

过去几十年，中国也没少指责美国“干涉中国的内政”。但是，中美两国基本上还是能够“和平共处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求同存异”。两国在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上的本质区别，没有影响两国 “和

平共处”。48 年后的今天，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后的今天，美国发现，她越来越不能接受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经济制度的国家。认为“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与一个真正不同文明的冲突”，与“一个非白人的强大竞争对手”的文明冲突。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构成了“现实的威胁”，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是“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竞争将是长期的。

现在，特朗普的执政团队一提到中国，言必称“中共”。我们注意到，国安会那份《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的报告当中，35 次使用了“CCP”。给人的感觉，这是一份针对“中共”的战略报告。用“中共”取代“中国”，传递的信息是非常明确的，即“未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将更加聚焦中共”，当然还有其“威权制度”。这不仅仅是一种“反共意识形态”的战略取向，更是一种赤裸裸的 “麦卡锡式的偏执的反共围剿”。

疫情期间，特朗普团队表现出对“中共及其威权制度”的“刻骨的仇恨”。他们排斥“中共”，就像有些宗教排斥异教徒一样。《纽约时报》甚至爆出美国政府正在商讨禁止所有中共党员及其家属赴美旅行的动议。不管能否付诸实施，都说明特朗普执政团队中，一些人骨子里与“中共”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

未来中美关系怎么走？能不能行稳致远？以上三个问题，尤其是美国要深思。最重要的是，要面对现实，承认现实。中国崛起是国际现实；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是国际现实；中国不可能变成另外一个美国，美国也不可能改造中国，这也是国际现实。

我们都学过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提倡现实主义，所谓现实主义，是指从利益出发，不要受意识形态影响。美国是一个崇尚现实主义的国家，希望未来的美国政府能够基于国际现实重新认识中国，制定现实的对华政策。美国不能不让中国发展，不让中国发展是不现实的。

关于重构中美关系战略框架的几点思考

郭新宁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国际项目高级主任

今天我想就重构中美关系的战略框架谈几点不太成熟的看法。在过去的几年里，中美关系正经历着全方位、多领域、高频次、强烈度的矛盾与冲突，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国际观察家开始谈论中美“脱钩”并且进入“新冷战”或者“黑暗森林”的可能性。2019年11月份，亨利·基辛格在接受一次访谈时就曾满怀忧虑地说，中美关系“正处在一场冷战的前沿地带”。更有专家认为，中美关系实际上已经处于新的冷战状态。我觉得这不是危言耸听，中美关系正步入1972年尼克松破冰之旅以来最艰难、最震荡、最危险、前景最难以把握的严重危机时刻。

中美关系被普遍认为是当代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其发展变化不仅对两国生存和发展的实现具有重大影响，也直接关乎国际经济、国际政治和国际安全的发展前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约翰·利普斯基就认为，“建立一种富有成效且可以预期的美中关系，是巩固全球治理机制的必要条件”。

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固然与美国国内政治有些密不可分的联系，但亦有其必然性。当前是中美关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节点和转型阵痛期，或者说是为未来双边关系性质以及走势定下基调的关键期。如何正确判断双边关系的历史方位，确定未来发展方向，规制、塑造并管理好转型期关系发展态势，可以说攸关中美核心利益，攸关国际体系的和平、稳定和繁荣。

这里我想就中美关系谈几点不太成熟的认识。

我的第一点认识是中美关系需要“软着陆”。

中美冲突正处在一个螺旋上升的态势，美国政府似乎决心进行一场豪赌，采取极限施压手段，步步紧逼，层层加码，试图迫使中国就范，摆出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姿态，两国关系可以说是笼罩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阴霾之下，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经济上“脱钩”之势已然形成。美国一些极端政治势力面对中国迅猛发展势头，心态严重失衡，于是鼓噪中美“脱钩”。他们一个重要论点是中国从两国交往与合作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而美国却遭受了严重损失。实际上，国家间关系状态的决定因素是利益关系，那么利益共同会驱动合作，利益冲突则会引发对抗。中美关系发展亦是如此。合作从来没有单方面的受益者，而对抗与冲突只会使双方共同受损。记得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曾经对周总理说：“过去我们有时候是敌人，今天我们有巨大分歧，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超越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我个人认为，“脱钩”实际上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愚蠢之举。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就认为，“草率鲁莽地将两国关系脱钩，势将带来失败的战略”。从近两年情况来看，美国政府似乎已经将“脱钩”或者“半脱钩”作为政策选项，这是第一点。

其次，政治上对抗加剧不断压缩战略回旋空间。美国政府新近采取一系列对抗性措施，包括在涉港、涉疆问题上新出台的政策举措、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等等，使中国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相应反应。美国政府这种任性，已经把中国政府逼到无法再退的墙角，动摇着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损害着双边关系的战略互信。两国政治关系严重恶化并倒退，任其发展甚至可能危及正常关系的存续。

第三，安全风险一再触及和突破增大了军事风险。引起人们高度担忧的是，两国关系正在被引向对抗。美国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安全问题上蓄意生事，包括在台湾问题上一再违背自己的承诺，实质性升级美台关系，加强在台海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军事活动；在中国南海问题上，一改过去不选边站的立场，并且加大在该地区的危险军事活动。这一切都有可能导致局面失控甚至擦枪走火。

中国学者于洪君曾经这样描述，“目前的中美关系，似乎已成脱缰野马，完全失去了牵引和控制，前景十分悲观和可怕”。如无有效遏止的措施，两国极有可能走向没有赢家的全面对抗。

因此，任由中美关系自由落体式的下滑将导致不可修复、不可逆转的恶果。在这一紧急关头，两国应当本着为两国人民负责、为世界人民负责的态度，从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共同利益、造福人类社会出发，审慎处理相互关系，扭转不断恶化的态势，实现双边关系的“软着陆”。当务之急是降温撤火，降低对抗调门，避免战略盲动，重新回到对话与沟通的渠道。

这是我的第一点认识，中美关系需要“软着陆”。

我的第二点认识是中美两国必须避免认知层面的偏差和执念。

纵观近50年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美关系发展可以说并非是一帆风顺，其间也有过曲折甚至冲突，但总体上保持着合作面大于冲突面的基本态势。进入本世纪第2个10年以来，两国关系似乎步入矛盾越积越多、对抗逐步升级的恶性循环。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两国力量对比此消彼长和地缘战略因素引发的连锁反应，相互间利益关系调整过程中相互碰撞，互动过程中逐步积累和日益增强的对抗性势能，也有主观认识层面的偏差和执念。这些因素交互影响，交互作用，导致两国关系中对抗和冲突的消极面凸显，而积极面消退。

中美关系的状态我觉得首先是取决于双边利益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两国主观认定有着直接联系。历史上不乏主观判断失误引发本可能避免的国家间战争与冲突的例子。目前需要注意的是，避免主观对双边关系利益矛盾的过度解读导致行动上的过度反应，进一步压缩政策上的回旋余地，并将两国关系导向并非本意且无法挽回的轨道。

我觉得以下几个认知层面的问题值得重视：

首先美国的“一超”地位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仍将难以撼动。“一超独大”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战略格局的突出特点。尽管有许多迹象表明美国正走向相对衰落，但可以预计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美国仍将拥有其他国家所无法比肩的超强实力，而且如果内外政策得当，这一优势还会长期保持。美国在此问题上的误判徒然引起战略上的恐慌和危机感，产生过度的反应。另一方面，其他大国在这一问题上的误判则会带来战略上的浮躁和冲动，导致错误的战略和政策，加剧与“一超”的对抗与冲突。

二是中美都没有能力按照自身的设计塑造对方。美国对华政策正经历一次方向性调整，一个最重要

的根源是其战略上的挫败感，也就是它以往政策未能达成促使中国朝着其预期的方向发展的战略目标。美国对外政策委员会一份报告就认为，冷战后西方将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战略已经破产。而实际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必然选择，也是已经证明是一条引领久经历史磨难的中国走向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记得苏联也曾经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图来塑造中国，结果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并分道扬镳。美国如果仍然幻想通过颠覆性政策调整迫使中国按照其设计的轨道发展，不仅不会奏效，而且会使两国关系发展成果丧失殆尽。美国学者哈斯就认为，美国没有权力决定中国的未来，中国的未来只能由中国人及其领导人决定。反之，中国如果试图按照自己的思路来塑造美国，同样也不可能成功。

三是美国诸多问题更多源于自身失误。美国目前国内问题堆积如山，在经济发展、国内政治、对外关系、疫情应对等方面，各种矛盾叠加并同时迸发，形势极其严峻。客观上，这些问题的产生与发展与国际环境的演变多少有点关系，但更多的是美国的治理能力以及决策失误所致。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一些政客和所谓专家拒绝查找自身的问题，却习惯性地将之归咎于他国的政策甚至阴谋，不负责任地“甩锅”。这种做法或许能够获得短期的国内政治效益，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并且激化了与其他国家的矛盾，进而导致局面失控。

四是中美关系不是美苏关系的简单翻版。如果说美苏关系最突出特点是对抗性的话，那么中美关系最突出特点则是复杂性。经济上，美苏几乎相互隔绝，相互影响不足挂齿；而中美则经济上相互依存，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和投资对象。安全上，美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形成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而中美则是在矛盾中推进合作，在冲突中谋求对话。在互动机制安排上，中美通过积极努力，已经构建起多层次、多渠道而且畅通有效的战略对话与磋商平台，这有助于双边矛盾管控。可以说，中美关系内在稳定性和质量应当远高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

五是“零和博弈”不适用于中美关系的客观现实。两国已经形成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将双边关系简单定位于敌对或者友好，并且在政策取向上简单地对应以对抗或者合作，显然过于草率和鲁莽，更不符合自身利益。在相互依存日趋深化的当代，大国利益关系调整，往往是以平等、互利、互谅、互让为原则，以“互惠共赢”为目标。那种“赢者通吃”的丛林规则与时代潮流相悖，在大国间利益关系调整中必然引发激烈的碰撞，导致任何一方都无法承担的后果。而实际上，中美关系的发展从来都是合作与冲突并存，在合作与冲突中推进各自的利益。可以说，合作中冲突、冲突中合作是两国关系发展进程中的常态。只是在不同的阶段，有时主流是合作，有时主流是冲突，但合作是使双方共同获益的唯一途

径。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就曾经指出，“中美关系不能也决不能以我们目前面临的那种对抗性、零和的观点为基础。”

这是我的第二点认识，中美关系必须避免认知层面的偏差和执念。

应当看到，实现“软着陆”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能否实现取决于双方互动，特别是作为中美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是美国的政策取向。“软着陆”是指采取稳妥的措施化解两国关系当前危机，使之能够平稳运行，但并不意味着回归过去的轨道。实际上，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这次危机是两国利益矛盾长期积累迸发的结果，双边关系几乎不存在回归过去的现实基础。而着眼双边关系长远稳定发展，中美须共同努力，重构符合现实的双边关系战略框架。

我的第三点认识是中美关系须重构处理相互关系的战略框架。

一是准确界定双边关系的性质。对两国关系性质的错误定位将导致自我实现的预言。双边关系性质取决于利益关系，而从利益结构上分析，中美在经济、政治、安全领域关系非常复杂，既存在冲突利益，也拥有共同利益。冲突利益可能导致对抗，而共同利益则促进合作。近年来，意识形态上的歇斯底里已经导致美国一些政治势力对共同利益视而不见，刻意放大双边矛盾与冲突。中国国内也有一些专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过于强调两国利益关系中矛盾的一面，而忽视共同的一面。更何况即便是利益冲突，也可以区分为可调和和不可调和两种类型，从目前情况看，双方利益冲突尚未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两国关系也不是美苏那种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

二是廓清相互战略底线以求基于现实的共处之道。现代武器装备的破坏性和毁灭性，使大国之间形成一种恐怖的军事平衡。一旦发生战争或者武装冲突，中美双方都具有予以对方难以承受之损失的能力。所以，如何避免军事领域的正面碰撞进而导致一场灾难性战争，是中美都必须认真思考认真对待的重大战略问题。在这方面，率性的触探甚至恶意跨越对方的战略底线，损害对方的核心利益，可能导致无法收拾的后果。实践证明，中美都无法塑造或者改变对方，也都没有能力以极端的方式在保全自身的同时使对方消失。所以，共处是两国必须接受的政策选择，而达成和平共处，必须相互尊重核心利益，避免随意触碰或者跨越对方的战略底线还有不负责任的战略盲动。

三是制定行为规则和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而没有规范就没有秩序。国家间关系也是如此，

如果缺乏规制相互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国际关系将陷入弱肉强食的无序状态。与冷战结束初期相比，无论是国际格局和地缘战略态势，还是两国力量对比和双边关系的内涵，中美关系面临的客观实际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除非双方或者其中一方不愿共处并决心进行你死我活的对抗，否则有必要制定基于国际体系和两国关系现实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从而引导双边关系朝着有序、稳定的健康方向发展。

四是协商共建冲突管控机制。这里主要指军事安全领域里的冲突管控机制。相对于其他领域，军事安全领域的矛盾和冲突尤为敏感，其管控尤为困难，其后果尤为严重。最近一个时期，美国在多个事关中国核心安全利益问题上不断迫近甚至试图跨越中国的底线，使得军事安全领域里的风险明显增大。虽然双方在军事安全领域里也曾达成过一些协议，或者建立信任措施，但离有效管控可能的危机与冲突尚存在巨大差距，可以说这是非常薄弱而且亟待补齐的短板。在双方军事活动频繁上演对峙局面的情况下，如何避免擦枪走火，如何防止对抗升级，是中美双方必须严肃对待的重大问题。

以上是我几点不成熟的认识。总之，中美关系已经到了一个需要重新定位、重新构建关系框架的关键时期。何去何从，取决于两国政府的理性、智慧和战略运筹能力。

欧洲如何看待中美战略竞争

Geoffrey Harris

欧洲议会官员

（1976–2016）

中美竞争愈演愈烈，双方都在试图对欧洲发起“魅力攻势”，但恐怕两国都对结果不甚满意，因为欧洲想要代表自己的利益，不愿选边站队。德国外长曾非常清楚地表示，欧洲不会允许自己成为美、俄、中这些大国竞争中踢来踢去的“政治皮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讲话时宣称，当前中美之间的状态是“新冷战”，欧洲必须做出站边的选择。美苏冷战期间，欧洲彻底分裂成两个阵营且形势一度非常严峻，鉴于历史教训，欧洲完全无意再经历一次这样的噩梦。两次世界大战，欧洲损失惨重，因此，欧洲最根本的目的就是避免牺牲。虽然欧洲会继续将美国作为盟友，但与美苏冷战时期不同，欧洲在中美两国的冲突中不会盲目支持任何一方。欧洲已经准备好与中国进行建设性对话，但同时也不会放弃自身利益和核心信念。

中国与欧洲都致力于推进多边主义。法国和德国在 2019 年都在联合国呼吁实现真正的多边合作。“多边”和“共赢”是根植在欧洲基因中的优先选择。尽管欧洲会遵守承诺继续与美国在安全问题上的合作，维系跨大西洋联盟，但特朗普政府却并不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以及欧盟的发展壮大。美国这种做法无疑会损害跨大西洋联盟合作。而中国一直以来都非常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欧洲也不会像美国一样将新冠病毒诬为“中国病毒”，或对中国使用排外性话语。当今世界充斥着怀疑与失信，国与国在交往中应基于相互信任，作出努力以扭转这种趋势。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 Fontelles）最近明确表示，欧洲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将采取更加现实的做法。他重申，虽然中国毫无疑问是欧盟的关键经济伙伴，但同时双方在寻求推进不同的治理模式方面也存在着“系统性竞争”。不过博雷利也强调，中国和欧盟在推动多边主义发展方面立场相同，欧洲支持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有效多边主义，中国则对多边主义有另一种选择性的观点，反映出对国际秩序不同的理解。欧洲坚决反对特朗普政府在贸易与国际关系领域的“零和”观点，也反对中美在疫情问题上互相指责的做法。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世界将会从多边共赢走向“没有赢家”的对立局面。在应对疫情、日益严重的国家间发展不平等、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及其国际地位等问题上都需要主要经济体，包括欧、中、美共同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复杂问题的解决需要政治和外交上的协调沟通，不存在简单的解决方法。

欧洲的基本策略是十分明确的，首先，要避免全球性经济衰退和失业；其次，继续坚持自己的全球价值观，并对中美上述的一些做法进行批判；第三，中欧之间保持竞争，但也会在现代国际体系中寻求合作；第四，要竭力避免东西方“脱钩”；第五，中美对立，但欧洲的基本目标仍是自身的战略自主。不过英国可能对此持有不同态度，我对英国的脱欧决定深感遗憾，但也证明了一些教训，即相互依存实际上是一个争取国家利益和战略自主的更好的办法，英国脱欧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欧盟财政不平等、一体化发展受困的一个表现。

欧洲需要努力寻求推动多边主义发展的最佳方案，中国可以在重建世界互信过程中发挥作用。目前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非常渴望加强与中国的相互理解。9 月 14 日，中欧峰会的一个重要议题是讨论能否在年底之前达成《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若能实现该目标，将在中欧互信的更大基础上前进一大步。

“新两极”体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Cliff Kupchan
欧亚集团主席

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带给世界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冲击。国际体系正在快速进入“新两极”体系。

国家权力是由国家实力决定的。过去10年，中美两国无疑是世界体系中的领导者，军事、经济实力雄厚。从经合组织（OECD）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美中军事和经济实力排名位居世界第1、第2，且与排名第3的国家之间差距巨大。不可忽视的是，软实力与硬实力同等重要。疫情暴发前，美国的软实力更强，排名世界第5，中国排名第27。“新两极”非常重要的特征是中美寻求平衡的领域主要体现在经济上，与冷战时美苏两极相比并没有那么紧张，而且“新两极”体系相比多极体系更加平衡、稳定。

美国试图与中国“脱钩”是当前“新两极”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尽管中美两国经济并未完全“脱钩”，但“脱钩”态势越来越严重，原因是两国对“国家安全”有不同的定义，美国认为高科技是“国家安全”最重要的领域之一。未来，美国针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限制会比现在更加严厉。同时，疫情使得中美“脱钩”形势更加严峻，形成“脱钩2.0”或者称为第二波“脱钩”。“脱钩2.0”不仅影响美中贸易，也会影响世界贸易。就医疗行业而言，所有国家都会将其看作战略型行业，囤积医疗资源，以保护各自公民不受疫情影响，从而维护国家利益。医疗行

业应该会走在“脱钩2.0”前列。从权力政治的角度看，疫情导致更多国家“向内看”，国家间将越来越独立，国际体系更加趋于中美“两极”体系，而其他国家可能会更加追寻现实的利益。中美关系可能越来越紧张，贸易政策、疫情、香港问题、南海问题、台湾问题、民族主义、大国权力变动等因素都会恶化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会恶化到何种程度也取决于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如果特朗普连任，中美关系可能面临更严重的情况。如果拜登胜选，则有两种可能：一是受现有美国政治局势限制，拜登进一步延续目前的对华政策；二是因拜登对华态度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中美关系可能出现一些改善。

新出现的中美“两极”体系有可能在短时内加剧两国紧张关系，但也可能会使未来双边关系更加稳定、更加安全。原因有二：一是与美苏不一样，中美寻求的是经济上的平衡，而非军事平衡；二是中美存在管控机制和合作空间。冷战期间美苏虽为敌人，但两国仍存在一定的管理机制，这说明超级大国间是可以进行合作的。如果拜登胜选，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军控、危机管理等方面都可以成为中美未来合作的领域。

推动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深层次力量

Kishore Mahbubani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
卓越特聘院士

显然，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长期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如果我们人类确实是地球上最聪明的物种，我们就应该团结起来，一起应对这场全球性的疫情。而且像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国，也应该在地缘政治竞争上按下暂停键。这本来是合乎逻辑的事情，可恰恰相反，地缘政治竞争在疫情影响下非但没有停止，反而继续加强。这很不幸地证实了我在新书《中国赢了吗？》里所说的推动这场地缘政治竞争的深层次结构性力量。确实，如果我们要对地缘政治竞争进行管理，我们就必须了解这些深层次结构性力量到底是什么。

我简单提一下其中的三个要点。第一个地缘政治竞争的深层次结构性力量是，每当世界第一新兴大国（比如今天的中国）即将取代世界第一大国（比如今天的美国）时，世界第一大国就会试图镇压世界第一新兴大国。这一现象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因此中美之间目前所处的局势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第二种结构性力量从未有人讨论过，尤其是在美国人和其他西方人当中。因为这是一种情感力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是一种长期扎根于西方人内心深处的东西，我称之为对“黄祸论”的恐惧。我之所以要指出这一令人不安的现实，是因为很明显，当中美地缘政治竞争违反逻辑、超越理性，甚至在疫情都无法阻止其继续进行的情况下，这种行为就是由情感力量所驱动的，并且这股力量是以我刚才提到的“黄祸论”的形式出现的。因此，我们应该探讨这种力量，并尝试理解为何其如此强烈。

推动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第三种结构性力量是几十年以来存在于美国政界中的一种期待。他们希望中国在开放其经济的同时，也能开放其政治体系，成为像美国一样的自由民主国家，这种期待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我们当然都知道这种期待没有成真。这也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中国有自己的政治文化和传统，这种期待显然有些天真。美国人想当然地以为，像美国这样有着不到两百五十年历史、人口总数仅是中国人口四分之一的年轻国家可以改变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而不会被中国改变。我必须再次对此加以强调，因为这解释了中美之间现存的误解，也解释了为何在疫情肆虐的背景下，这场地缘政治竞争仍然势头不减的原因。

如今中美地缘政治竞争发展到了什么地步？双方转圜的希望是否已经破灭？还是说我们仍能够怀揣希望，去找寻遏制这场地缘政治竞争的方法，使局势免于失控？实际上，我认为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共同找到使情况不至于失控的方式。我想，要做到这一点，其中一条就是去论证为何中美两国需要重新考虑这场地缘政治竞赛。接下来，我将提出三个观点来论证中美两国应该这样做的原因。

首先，美国政府的首要目标如果是改善民生，那么就应该致力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很不幸，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美国人民遭受了很多苦难，占人口总数50%的底层民众的平均收入也有所下降。这种糟糕的情况需要得到遏制，美国应该聚焦民生问题，而中国也希望关注本国国民的民生问题。如果改善民生是中美两国的首要目标，那么两国就可以达成合作。

两国应该合作的第二个原因是，如今我们逐渐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小世界。坦率讲，在这个世界应对共同的挑战十分重要。新冠肺炎疫情就是很好的例子，还有一个例子是全球变暖。坦率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立解决全球变暖问题。人类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应对。当然，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也必须携手应对这一挑战。这就是中美应该合作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同样重要，那就是世界上有75亿人。其中，有14亿人生活在中国，3亿人生活在美国，还有大约60亿人生活在世界其他地方。如果问这60亿人，看看他们希望中美关系如何发展。我想大多数人会回答，现在必须要把重点放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上。我们必须聚焦疫情带来的突发性挑战。如果这60亿人能够表达他们的诉求，他们必然希望中美两国停止这场地缘政治竞赛。

因此，我希望通过本次论坛，大家能对中美地缘政治竞赛背后的驱动力有更为深刻的认知，同时也借此机会向外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都应该在这场竞赛中按下暂停键，将精力集中在解决当今人类共同面临的诸多挑战上。

对中美关系“危机时刻”几个问题的看法

钱峰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

今年以来，中美关系加速下滑。尤其是进入七月以来，美国对中国发动了所谓“七月攻势”，我们看现在的招数之繁、力度之大、密度之频、破坏程度之强，不仅为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之最，也为中美建交40多年来所罕见。

我觉得这既是特朗普阵营打“中国牌”的竞选连任策略与美国国内极右势力反华思维契合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有美国凭借综合实力优势，加大测试中国的禁区底线，逼中国在华盛顿的极限施压下出招犯错的考虑，其中更有右翼反华势力试图绑架美国未来政策的意图。现在距美国总统选举已经不到三个月，随着美国在对华问题上的极端性、冒险性、无理性的做法持续增多，我觉得中美两国的敌意还将持续累积。可以说现在正处于1979年以来中美关系最危险的危机时刻。我觉得包括中美但不限于两国，任何珍爱和平、崇尚正义、不愿意世界重新进入冷战的人们，应该并肩携手，一起推动美国讲公理、守法律、走正道，避免历史上“大国政治悲剧”的再度上演，给人类社会带来很大的灾难。

当前，在舆论场上，我们看到各种声浪和形形色色的信息铺天盖地，让人眼花缭乱。因此，我想借太和文明论坛这一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平台，分享我对近期中美关系的观察和看法。

第一个看法是辨识美国对华政策升级的“虚”与“实”。今

年6月中美夏威夷高级别会谈后，美方并非不知道中国的底线，但如今频频在中国警告的底线问题上出重手，我想主要原因是国内疫情形势反弹恶化、经济复苏进程受阻、白宫面临的政治压力陡增、共和党选情颓势渐显这几个原因。

对于特朗普而言，连任是事关他本人及他的家族是否被“政治清算”的头等大事。因此，特朗普当前出台任何反华政策的首要目的都是为了谋得对拜登阵营的优势。其实，细观近期美方使出的台湾、新疆、香港、疫情等招数，大部分都是前期一直在打的舆论“牌”，包括在“南海仲裁案”四周年之际想炒热南海问题。我想无非是彻底揭掉了美国一直以来假中立之名、行打压之实的面纱，对中美战略竞争的整体态势并无多少实质影响。

但相比政界，我看到美国军方在两军关系上“求稳”的愿望还是比较强烈的，主张保持军方高层交往和建立防意外冲突机制。近期，美国防长埃斯珀主动释放希望今年年底前访华的信息，并在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的电话交谈中，表达了加强中美两军风险管控的意愿，一定程度表明美国军方并未随美国政客的集体失智而走向一个极端。

这一方面源于两军发生冲突可能带来难以承受的巨大代价，另一方面也由于美军高层对近年来美军作战能力已经接近极限有清醒认知。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美方举措中确实含有不少反映美国精英阶层和利益集团布局中美关系长远竞争的“实招”。特别是在高科技问题上，美国最担心的并非是中国经济总量的超越，因为美方也认为这一势头是难以阻挡的。

真正可能动摇甚至终结美国霸主地位的是中方在高技术领域的投入与赶超，这也是白人精英群体几个世纪以来对有色人种竭力维持技术代差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执着”。特别是近期我们看到，美方以“国家安全”为由打击抖音、微信，矛头对准中国近年来崛起的最具创新力的高科技互联网企业，这也是继美国“围剿”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高技术硬件公司之后的又一新“实招”。因此，未来美方在技术领域的打压还会变本加厉，中美科技脱钩趋势还将继续加剧。

第二个看法是区分美国现在各派势力在对华问题上的“同”与“异”。遏制中国是美国国内近年来形成的基本战略共识，在这一问题上共和党与民主党、“狂热派”与“理性派”的目标基本一致，只是方法与手段不同。但随着中美关系近来的加速下坠，也引发了美国精英阶层对华认知出现了一些微妙变化。

特别是通过观察发现，现在美国的“理性派”越来越多地担心相关举措不仅会进一步加剧中美对抗，强化中国社会对美的敌意，而且未来可能会让美方卷入大规模军事冲突。同时，美方“理性派”也注意到中方释放的不想升级对抗的信号，认为中国提出的“三个清单”对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和全球金融市场，对防止中美爆发军事冲突具有现实意义。

原因很简单，首先是美国极右翼反华反共势力为在11月选举前取得成果，不得不变本加厉采取极端措施，使得他们言论和行动的荒谬性和危险性更多暴露出来，这种无理性、无底线的言行引发了精英阶层的忧虑。

其次，共和党阵营认为打“中国牌”比拜登阵营有优势，但民主党出于选举考量，也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跟着特朗普设定的政治议程走。在目前民调领先的情况下，民主党想必会在“中国议题”上梳理和整合对特朗普阵营的反击观点，客观上也起到了引导美国舆论反思中美关系现状与未来发展的作用。我们看美国内部“理性声音”的上升虽不会改变中美战略竞争的基本态势，但有助于防止中美关系全面破裂、走向冲突和战争。

第三个看法是要警惕美国反华极右势力的“不变”与“变”。目前美国对华狂热派在政坛占据高位，在决策圈声量很大，其中包括“民族主义鹰派”，这主要是以种族和宗教正确的政治倾向看待中国，还有一部分“自由主义鹰派”，他们长期渲染中国“人权”问题，“传统鹰派”是渲染中国军事安全的挑战。其中，“民族主义鹰派”把中国视为“文明异端”，在对华政策上不考虑国家利益跟相关政策是否具有现实可操作性，他们对华的敌性认知从未改变。

他们以彻底遏制中国发展、颠覆中国制度与政权为目的，试图推动中美全面“脱钩”。7月以来，他们这批势力出现了三个重要变化。第一是攻击方式由原来的分散突袭，转变为体系化作战。第二是攻击中国的议题由原先围绕的经贸、科技、疫情等现实问题，转变为以意识形态挂帅，企图唤起美国民众的冷战记忆,然后促使中美关系出现不可逆转的恶化趋势，将意识形态斗争固化为中国和美国战略竞争的主基调。

第三是攻击节奏由原先持续加码、力图长期消耗，转变为极限施压、渲染“即刻决战”紧张气氛。这是因为反华派担心特朗普可能无法连任，所以期望抓住选举前的关键窗口期，凭借美国科技、军事、金融优势，逼中国疲于应对，然后忙中出错，掉入其预设的陷阱。

第四个看法是要静观美国选举结果对中美关系的“利”与“弊”。目前离美国总统选举还有不到3个月，拜登几乎在所有的民调中遥遥领先，入主白宫的几率不断增大。但是综合考虑美国主流媒体对民主党的传统“偏爱”与“好感”，以及特朗普阵营有可能制造“十月惊奇”来扭转选情，所以目前下断言拜登胜选还为时尚早，仍有待观察。但是拜登的竞选策略、政策，他的执政思路，尤其是今后对美国外交政策做出的可能调整还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如果拜登当选，我想大概率会对特朗普外交政策进行一个拨乱反正，重回“奥巴马时代”的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框架，并致力于修复与盟友的关系，重建国际领导力和美国软实力。弊的一面，美国与盟友的关系将被再次拉近，这使中国在与美国的下一步竞争中面临较多不利。但利的一面，拜登本质上不是一贯仇华反华反共的政客，也不像特朗普那样不可预测、易走极端，他能够听取建制派包括智囊团的意见，中美之间的交流可能会恢复起来，沟通也会变得正常一些，这可能会为中美在气候变化、疫情防治等重大国际问题的合作带来一些机遇，客观上有助于避免中美关系的加速下落。而且我们也看到，即便特朗普连任，也不意味着中美就没有合作的可能或者两国关系没有改善的机会，我认为这取决于特朗普，特别是如果他连任后对身边反华极右势力的管控情况。

第五个看法我想展望一下国际环境蕴藏的“危”与“机”。在美国的挑唆和影响下，当前国际环境对中国总体是不利的，风险在上升，挑战在加大。其中，既有美国传统铁杆盟国在反华问题上的积极呼应，也有我们看到像印度等邻国在领土问题上的趁势发难，还有一批“骑墙派”国家在美方重压下的摇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国际关系的发展演进很难再以意识形态为主导。中美关系恶化以来，绝大多数国家其实并不希望因中美两强相争而被殃及，也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

同时，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不仅无法在国际社会得到认同，也很难真正聚合盟国一致对华。7月27号，盖洛普公司发布本年度《全球国家领导力声望调查报告》，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国家和地区对美国全球领导力的认可率其实仅33%，位于历任美国总统的最低点。其中，欧洲不认同率达到61%，创历史新高。

而该报告反映出，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中国的相关数值总体处于企稳回升的态势，而且如果考虑到美方近年来掀起的对华抹黑浪潮以及该调查只在中国港台地区进行，中国在国际舆论战上本身就处于一种绝对劣势地位的这种综合实际情况，可以说中国还是基本顶住了美国和西方的诋毁，国际声誉得

以稳定，这其中既有中国自身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包括外交成就，同时也有特朗普政府自身执政混乱、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所致，这在疫情问题上反映得特别明显。因此，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坚持推动多极化进程，争取和团结更多国家仍有很多可为的空间。

总之，从发展趋势看，中美关系最理想的发展前景应该是，在未来的一二十年的“转型期”内，双方经过一个可控的摩擦、碰撞过程，逐步找到一种良性、共存的竞争办法，然后保持中美关系相对稳定，最终形成相互适应、接触与合作重新成为两国关系的主导这一格局。如果那时这种格局得以形成，美国的优势还会保持更长时间，而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也将得以延续。

这有利于真正形成一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并非没有可能。大国竞争“回归”不等同于“新冷战”或者“热战”，中美双方都需要更多保持理性，并在双边政策制定和调整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从苏美冷战起源看当前中美局势

沈志华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华东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周边国家研究院院长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引起了全世界关注。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想从历史的角度，特别是从冷战起源的角度来谈一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第一点，就是大家都在谈中美关系是不是要朝着“新冷战”的方向发展，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冷战？我想这里应该先纠正一个概念，就是中美之间现在发生的问题，是两个国家的关系问题。冷战不是两个国家之间关系的问题，是一个世界格局的问题。虽然主体是美国跟苏联之间的争斗、对抗，但在国际关系当中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两个阵营的对抗，所以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是产生了两极的格局。那现在我们看中美关系发展会不会走到两极格局的状态，我现在看不到这个前途。其实从冷战结束以后二十多年，原来的苏联已经彻底消失了，而苏联的盟国大多数都变成了他的敌人，有的甚至是对他恨之入骨的敌人，就是从原来的盟友变成了敌人。但美国阵营反而越来越巩固，越来越扩大，北约东扩、世界经济组织和货币组织的扩大，都说明冷战以后这二十多年的发展趋势，是美国一极坐大，就是一个超级大国变得更加超级。

在这个趋势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种冲突。其对未来的影响，我个人认为不会走到两极格局。现在跟着美国走的人，也是踌躇不前。他们可能对中国有不满，

但是由于有很多利益关联，所以他们不想跟美国站在一起反对中国。而中国这一边，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中国能不能拉起一个阵营，形成世界的一极，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所以不宜用冷战或者新冷战这个概念来表述现在的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就是两国关系，从原来的合作友好，后来发生分歧、发生冲突，现在走向对抗，下一步会不会发生更激烈的冲突和对抗，是我们关注的问题。

第二点，历史往往给人很多启示。中美贸易战以来，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我在观察美苏冷战前，觉得经济因素也是一个特别值得观察的问题，现在就是把它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上看。

总体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苏处于一个合作的状态。这一合作状态的表现是，美国在地缘政治方面满足了苏联所有的要求，就是苏联战前对波罗的海三国、对芬兰、对波兰、对罗马尼亚等等的领土要求美国都满足了，甚至包括后来的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这些国家。

再就是美国设计的战后经济组织千方百计要拉苏联入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给了苏联种种优惠条件，满足了他几乎所有的要求。苏联斯大林时期也非常想跟美国合作，因为他看得很清楚，就是二战结束以后，原来的世界列强都垮了，不管是盟国阵营还是法西斯阵营，剩下的就是美国和苏联。而苏联在实力上又与美国相去甚远，如黄金的百分之七八十都在美国，航空母舰大部分在美国，原子弹别人没有就他垄断。这种差距就是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也就百分之二十多一点，他怎么跟美国对抗，所以他不想跟美国对抗。而且雅尔塔体系已经保障了苏联的所有利益，他何必去冒这个险。所以苏联解散了共产国际，在他势力所在的范围内，搞联合政府政策、多党制等等，都是为了安抚西方、安抚美国，说以后不搞共产革命，不搞世界革命了。

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双方是要走在一起的。美苏共治就是1945年初，战争将要结束和刚刚结束那会儿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但是为什么不到两年，双方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和根本的对抗呢?

从地缘政治上讲，美苏之间没有接触。联合国成立就是按照罗斯福的设想，“四大警察”，美国管美洲，中国管亚洲，苏联管东欧，英国管西欧，各管一片。在联合国安理会“大国一致”的原则，一票否决，这一机制就是为了保证战后的世界和平与安全。经济上是世界经济一体化，所以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后来虽然国际贸易组织没有成立，但是关贸总协定还是通过了，规则还是有的，就是大家遵守统一的规则。如果是那样发展，这个世界就是由美苏两国主导，世界政治经济是一体的，就不

会发生这个冲突。而我们现在看这个冲突的产生，责任主要在美国。因为美国是个多元的政治，当时罗斯福是属于亲苏联的民主党，而民主党长期执政，从他搞新政开始，就在原来自由资本主义的概念当中加进了国家干预的因素，所以叫新政。

实际上后来罗斯福搞的世界经济组织，用美国反对派的话讲就是国际上的新政。所以他是倾向拉住苏联，跟苏联一起搞，但是反对他的人非常多。从国会来讲，从两党政治来讲，美国人也不能容忍民主党，已经四届了，你还在战后搞。英国的丘吉尔打赢了世界大战下台了，法国的戴高乐打赢了世界大战也下台了，这就是西方政治决定的，东方人不大理解。所以美国在这个时候，反苏的舆论势力开始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苏联不要去为反共反苏的那些政治势力提供口实、提供借口。但这时，苏联也有很多自己不放心的地方，所以处理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华沙起义的问题，他没有去及时援助华沙起义的地下军和市民，因为他担心这些人起来以后不在我的控制下怎么办，但这一件事就弄得整个世界舆论大哗，然后跟着在东欧操纵选举。然后又发表了一些不适当的言论，特别是1946年2月9号那个讲话。

其实他讲话的意思是对国内老百姓讲，说大家不要以为战争胜利了就要过好日子了，因为确实当时国家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是最先进的。其实原来这样讲在老百姓当中是起作用的。但是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情况就发生变化了。美苏关系和好以后，美国的电影、小说、文学、报纸都到了苏联，民众开始了解西方了。他还用原来意识形态的话语去教育他们，不但在国内没起作用，反而刺激了美国。因为他说，我们现在不能掉以轻心，这个危险还是存在的，为什么，因为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现在帝国主义还存在，战争的危险就没有消除，我们要准备打仗。你想美国人听了什么感觉，这战争结束才几个月，你就要准备打仗，你跟谁打仗？所以就把美国的舆论给刺激起来了。刺激起来以后，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就非常担心，是不是要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是不是要加入国际贸易组织，是不是要加入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可能会有很大风险，再加上苏联经济学家确实不懂市场经济，也没搞过市场经济，所以他就非常犹豫。其实美国给他的是最好的条件。如果真的按着那个经济的计算指标，苏联不是排到倒数第几，罗斯福硬把他拉到第三，就是靠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资本金，就是发言权。结果最后斯大林还是放弃了。这样就迈出了第一步，跟美国做了经济上的切割。经济上的切割会导致什么结果呢？会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国采取任何手段不会伤及自己。那么走到这一步以后，其实双方还不是非常情愿想走到冷战地步，结果苏联又搞了伊朗危机和土耳其危机。

这样做的第一个结果是刺激了国际舆论，让美国反共反苏的政治势力抓到了把柄，找到了借口，所以杜鲁门主义就出来了。杜鲁门主义出来以后，其实苏联还没有警惕。他觉得可能他就是说说而已，因为苏联就是这么做的。苏联报纸总骂美国，但他不是真的想跟美国闹。他骂美国是在说给国内老百姓听，其实这时美国已经要采取动作了，这个时候发生了希腊危机。希腊危机也冤枉苏联，其实苏联真的没有支持希腊共产党打游击、搞武装斗争。

但是苏联背的包袱非常沉重，他是全世界共产党的领导。你虽然不同意希共发动武装斗争，但你也不能反对，借这茬西方就把这帽子扣在苏联头上了。而且英国人最狡猾，关键时候从希腊撤军了，说我没钱了，养不起军队了，美国人你要来你就来，你不来，希腊就让给苏联了。美国哪能看着这种现象出现，一旦希腊让出去，巴尔干就是苏联的，苏联占领巴尔干以后，整个西欧就不行了，西欧的经济垮台会导致社会动荡，所以美国提出了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不包括苏联，但是美国不说这句话，他们内部讨论说这话不能由美国说，让苏联人自己说。苏联又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判断，他认为马歇尔计划是什么呢？是美国发生经济危机了，是资本过剩，钱多得没地儿去了，非要借给西欧，所以他认为轻而易举就能拿到这笔钱，就派莫洛托夫去巴黎谈判，结果一谈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人家根本不想给他。所以他就马上全部撤出，不但苏联不参加，所有他控制的东欧国家都不许参加。

结果这一招出来以后，彻底隔断了苏联和苏联控制的东欧各国和西方的经济联系。整个世界舆论包括欧洲都认为，是苏联破坏马歇尔计划导致了欧洲的分裂，其实不是那么回事。美国是采取了一个隐而不发的态势，其实真想扩张的是美国不是苏联，苏联并不想扩张。雅尔塔体系已经保障了苏联的安全，他是很满意的，他不想因为自己的外交行为导致体系的破坏，这就会危及他的安全，反而是美国要扩张，因为美国要把美元推向全世界。美国这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实力已经高高在上，虽然国内还有孤立主义的障碍，但是扩张的态势已经出来了。但美国人自己从来不主动提出来，都是等着欧洲人请，道德的制高点被美国人占领了。随后，苏联每采取一个动作，都会导致美国进一步进入欧洲，渗透到欧洲。

比如1948年2月，本来欧洲是恐惧苏联，美国并不恐惧。欧洲经济一片瘫痪，但是他们又不想联合起来，一是内部矛盾，二是怕这种联合惹恼了苏联。1948年2月捷克政变，共产党把原来的政党都赶下台，这下欧洲就不得不联合起来。《布鲁塞尔条约》是怎么出现的，就是在这之后的5月出现的。但

《布鲁塞尔条约》就是欧洲国家，没有美国。

跟着苏联又搞了个封锁柏林，8月一封锁柏林，立刻北约就成立了。欧洲必须得要把德国拉进来，因为没有德国，欧洲形不成力量，另外要把美国拉进来，得靠美国作靠山，所以北约就形成了，就是在柏林危机以后。但是到这个时候，美国人还不想更深地参与欧洲事务，所以美国不派军队去，而是美元先去，然后是美国政治势力到了欧洲。但是他不管军队，说北约自己搞。接着朝鲜战争爆发，朝鲜战争一爆发，北约立刻军事化，没几个月就形成了。就是苏联采取这种做法，把对方内部的矛盾全打消了，使得他的敌人团结起来，就这样一步一步走。

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面对一个强国的挑衅、强国的威逼的情况下，第一，是不是对形势的认识要提早有分析。我觉得苏联比较大的问题就是醒悟得比较晚。他说美国是敌人，什么都是意识形态上的。苏联一直认为他没招惹美国，所以他就不了解西方政治，不了解美国政治，你是没招惹美国，但美国就是冲你来了。第二，在这种比较紧张的国际局势下，你采取的每一个动作，发表的每一个声明，特别是外交讲话，都要考虑下后果。实际上现在我们来观察，把事实都摆出来一步一步看，苏联所有的外交行为和外交言论、国际言论都适得其反，都不是他想达到的那个目的，而恰恰相反。本来美国国会有人替苏联说话，结果这些行为一出来，人家没法替你说话了。美国国会的意见一致了，两党的意见一致了。你搞柏林危机，把法国又给推过去了，就一步一步壮大了敌人的力量，而且给反对自己的人提供了很多借口。所以从美苏冷战起源的历史观察的角度，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中领略出一些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当前的局势，应该采取怎样的外交决策。

中美关系可以重启

Susan Thornton
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
亚太安全论坛项目主任

二十一世纪充满无限可能，全世界都非常期待在经济社会发展、技术、全球化等方面取得进步。目前，即时通信快速发展，一些致命疾病得到根治，人类所处的全球环境变得越来越可持续。但也确实存在一些负面因素，其中有些可能是人们意想不到、客观上造成的结果，比如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犯罪、恐怖主义活动，这些都对人们的生活与安全构成影响。整个社会还没有完全做好迎接二十一世纪巨大变化的准备，并且可能会发现这些变化很难适应。

二十世纪，中美两国在二战中共同战胜了轴心国。经历一段时间的疏远后，中美又一起抵抗咄咄逼人的苏联。再次经历一段疏远后，中美又一起发展经济，应对武器扩散和恐怖主义问题，避免全球陷入崩溃，携手致力于结束达尔富尔战争、抗击埃博拉疫情、限制伊朗核计划，并就《巴黎协定》中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限额达成一致。这些都是在东亚长久和平与繁荣的基础上实现的。在过去50年中，东亚地区没有发生重大军事冲突，中美共同经历了风风雨雨。历史经验证明，中美合作可以带来很多积极的结果。

我们本来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多？是的。我们有没有犯过错？犯过。我们是不是错过了什么机会？是的。我们未来能够做得更好吗？现在还不知道，但我对未来中美合作依然充满希望。美国

要再次伟大，中国要实现复兴。美国的建国之本是传教士式的狂热和雄心，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美国希望每一个国家都能像美国一样，而中国认为没有任何国家能像中国一样。二十一世纪，中美必须合作，结束对抗，学会应对和管控冲突，共同应对自然灾害、人为冲突造成的问题。

一些系统性分歧会成为中美合作的主要障碍，而且中美之间确实缺乏战略沟通，中美都互相视对方为安全威胁，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还可能增大人们对两国是否会发生战争的担忧。但中美注定不会发生战争，因为两国间并不存在明显的战争迹象。首先，国际体系通过此前的权力竞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前主要国家会非常认真对待自己的承诺，一些国际机构也会帮助管控中美之间的分歧和不平衡。这些国际机构需要改革和完善，一些大国需要更严肃认真地对待国际组织改革。第二，中美两国也有相应的应对机制。其实美国很久之前就预料到中国的崛起，所以美国才十分渴望能让中国全面参与到国际组织中来。1958年，美国参议员富布莱特（James Fulbright）撰写的中美关系报告称，应允许中国参与到全球体系中，并说服其承担一定的国际责任。当然，现在的中国已经全面参与到国际体系当中，但承担国际责任的问题尚未得到完全解决，美国政府的一些行动也导致中美之间出现了问题。但其实在特朗普上台前，美国政府的一些行为就已为中美今天的问题埋下了伏笔。如果不想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就应该思考如何帮助守成大国完成转变，就像美国当初帮助中国参与到国际体系当中一样。

二十一世纪的中美都需要有一些新思维。恐怖主义、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等问题导致部分全球化进程受阻。退出全球化并非一种负责任的行为，其会影响中美乃至世界的发展。面对疫情，中美两国的责任是继续保持开放，并有效解决问题、减缓疫情。中国需要改变，美国也需要改变，我们必须在和平共处的前提下展开竞争。

我认为，中美关系可以重启，我们应该思考中美关系重启后的局面。中国一直表示，外界对于中国的战略意图存在误解。如果的确是这样，中国就应该采取行动修正外界的误解，例如调整对外舆论基调等。中国应该给世界带来惊喜，这样才能为未来打下基础。希望中美都能有足够的智慧，抓住关系重启的机遇。

新时代中国对美外交需要耐心和智慧

王在邦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知名国际问题和世界经济问题专家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特别是今年以来，随着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和美国选举临近，中美关系呈现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全方位的“自由落体式的恶化”。两国关系持续恶化，达到了40年以来的最低点。尤其是最近美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悍然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在恶化两国关系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

此次中美关系转入全面下行轨道，特朗普主政下的美国是主推方，责任在美国。我们看到，美国对华政策、美国精英阶层对华政策理念以及受上述两方面影响的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也呈现出系统性的转向。

美国对华政策转向，令全球愕然。中国国内从政府官员到普通民众，有愤慨，有无奈，有惊恐，但官方政策基调也有坚守。从中国方面看，如何看待和应对美国对华政策这种系统性变化，对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演变是至关重要的。毕竟，探戈舞要两人跳。

我谈三点看法。第一点，美国对华政策转向是历史性的，这有三个层面的意义。

一是这种转变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根源，不是一朝一夕就完成的。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正如大家说过的，已经回不到过去。

二是今天的美国对华政策只是一个重大历史时期的序幕，高潮还在后面。因为今天美国对华政策本质上属于美国对于一个所谓“挑战者”的反应。中美两国的力量对比还没有达到势均力敌的程度。2013年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我当时预测十年后美中关系将进入高危期。有三个指标性因素，这三个因素现在看都没有达到。第一个指标因素就是中国经济总量实质性地接近或者超过美国，这是美国人不大可能容忍的。第二个是人民币国际化对美元的世界霸权构成实质性挑战，这也是美国人不大容易接受的。第三个就是中国海空军现代化实质性地挑战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霸权。当这三个指标出现的时候，中美关系就要进入高危期。那么这个高危期，目前来看，开始了但还没进入高潮。

三是新时代中美战略竞争的基本特点是长期的巅峰对决。这是两个大块头的对决，而且对决是长时间的，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分出胜负。那么其强度、烈度、敏感性和复杂性都将是前所未有的，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即使特朗普这次败选，拜登上台，美国对华政策会有调整，但对华战略竞争的大方向是不会改变的。

第二点看法，针对上述这种根本性转变，中国处理对美关系就要立足打“持久战”。为什么?

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需要时间。我们有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第一个一百年现在接近完成，第二个一百年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还有30年时间。30年时间还是挺长的。

二是让美国接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现实需要时间。我们看到今天的美国有三个不适应。第一个不适应是对中国迅速崛起壮大成为一个巨无霸不适应。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迅速逼近美国，超过美国历史上所面对过的任何一个挑战者。二战结束的时候有一个苏联。但是，无论从人口规模还是经济总量，苏联在很多方面都没法与今天的中国相提并论。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美国整不动的大块头。

第二个不适应就是对中国的行为方式不适应。美国建国不足250年，主要是在继承了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所谓的美国式的政治、经济、文化。而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政治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协商、人民民主，经济上是国有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全面开放的市场经济、制造业发达。美国实行联邦制、两党制、三权分立，经济上是私有制、市场经济、跨国经济、服务业发达。在对外关系领域，美国是均势政治、地缘政治、威慑论、新干涉主义或颜

色革命或政权改造这几条。而中国有五六千年的历史，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底蕴，有重仁厚德的对外关系理念，有刚柔相济的外交风格。如何与这样一个大国打交道，美国没有任何经验可谈。过去对苏联那套，不管用。

第三个不适应就是对今天的国际环境不适应。冷战期间，美国对抗苏联，美国在西方世界甚至在全世界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几乎一呼百应。但是今天，这个世界是全球化的世界，中国与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同程度地相互依存。美国已经发现，说服其他国家和美国一起共同对抗今天的中国，不大好办。

三是美国的反思与觉悟需要时间。因为建国以来，美国人自信地认为他们是上帝唯一的特选子民，美国霸权不可替代、不容挑战是全美国的政治正确。那么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这种认知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或许是有根据的，但从历史长河看，它又是反历史的。要让美国人真正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21世纪的世界选择，美国不可能永远是世界第一，这可能要经历一个漫长痛苦的反思和自我调适过程，外人急不得，急也没用。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美国内部展开全面深刻的辩论，形成新的主流认知，也需要不断的政策调整，最终找到与世界、与中国和平共处、共谋发展的途径。

既然要打持久战，我们就要超越以往的外交理论和实践，在理论上和策略上要更加成熟。第一个要在思想上克服“失败论”。我们要看到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刚刚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那么不堪一击，那么缺乏承压能力。今天的中国，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依然并将继续处在上升通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刚刚完成或正在接近完成上半场，下半场可能更精彩。我们可以说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趋势。

第二个要力戒“速胜论”。我们不要幻想中国会迅速超越美国，中国也不可能一夜崛起超越美国，综合实力即使超越美国，我们也不做第二个美国。我们不把美国当敌人，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是超过美国当世界霸主。

第三要确立“必胜论”。中国有14亿人口，中产阶级人数相当于美国的人口总数，工科毕业生是美国的10倍，现在GDP全球第二，研发投入世界第二。从长远看，我觉得时间在中国一边。从文化上看，中美两国与21世纪这个世界的契合度不一样。中国的哲学和战略文化与当代世界的本质特征高度吻合，而美国保守派，特别是保守派精英的理念却与今天的世界格格不入。

在策略上要打持久战，第一就是我们不挑事。不挑战不挑事，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坚持和平发展。在和平共处的前提下，展开理性竞争、按规则竞争、建设性竞争，在竞争中促进共同发展。

第二就是要坚决捍卫核心利益。今天的中国绝不容许美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胡作非为。对美国公然危害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我们坚持后发制人，灵活反制，防止其在涉及这些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得陇望蜀。只有这样才能促其知难而退，才能促其自我反思调整。

第三要防范美国铤而走险。随着中美力量对比逐步接近均势，美国极端保守派和反华派在危机感的驱使下很可能铤而走险。实际上，美国政府发动贸易战、科技战等等，已经属于狗急跳墙了。因为他们担心时间不在他们一边，遏制中国发展有些迫不及待。特朗普核心幕僚班农就曾明确表示，对于美国来说，遏制中国发展的时间窗口只有5年。

第四是要强化危机管控，要避免偶发性的危机演变成系统性、全局性的危机。

如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中美关系并非无法逆转

吴海龙
太和智库首席国际关系学者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关注的焦点，中美关系何去何从不仅仅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事，也是全球的事。不管用什么措辞来描述，中美关系已坏到了人们无法想象和难以预测的地步。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最有影响的国家把关系搞到了这种地步，这既是中美两国人民的悲哀，也是世界人民的不幸。人们不禁要问，这是谁之责任，谁之过错，答案是明摆着的，是美国的一帮极端势力的政客，搞坏了中美关系。

中国改革开放的 40 多年，我们一直想把自己的事办好，既造福本国，也造福世界。中国从未觊觎过美国的霸权地位，从未挑战过美国的利益，从未找过美国的麻烦，从未干涉过美国的内政，从未想过要改变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念。我们只想和美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但美国又是怎样对待中国的呢，美国企图要按照美国的意愿改造中国，当中国凭着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不断崛起壮大，但又未如美国所愿时，美国的一些人焦虑不安，恼羞成怒，断定这是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失败，于是乎，歇斯底里、丧心病狂，必欲把中国打趴下而后快。

美国主动挑起了对中国的贸易战，不择手段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拼命封杀 5G，强行与中国脱钩。美国不断粗暴干涉台湾、香港、新疆等中国的内部事务，频频挑战中国的海洋权益和领土完整，处心积虑地压缩中国在美外交机构和媒体等的活动空

间，毫无廉耻地把美国自己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失败的责任甩锅给中国，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政治制度，竭力拼凑反共反华联盟，蓄意与中国打一场新的冷战，企图把中国孤悬于世界之外。

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搞坏中美关系，美国难辞其咎，难诿其过。

孤立了中国，世界就没有了好日子过。把中国打趴下，世界也就站不起来了。我们不能让美国那些失去理智、毫无底线的政客肆意妄为、胡整一气。更不能容忍他们把中美关系引向不归路，我们不能掉进这些人设置的“新冷战”的陷阱，我们不能上当受骗。

中国依然会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中国一直在释放改善中美关系的诚意，并不断提出切实的解决措施。

世界发展的历史表明，不同制度、不同信仰、不同文明是完全可以共生、共存、共荣的，是完全可以互鉴、互容、互进的，不是非此即彼，不是有你无我，不是我生你灭。

中美关系走过的四十多年历史也证明，中美虽道不同，但可以共事，虽利各异，但可以合作。互利互惠、求同存异维系了中美关系基本平稳向前的大局。不管中美之间有多大的分歧、多深的矛盾、多烈的冲突，我们都愿意与美方寻找解决之道、管控之道、相处之道、互利之道。

但美国如果一意孤行，非要把中国逼到墙角，非要让中国走投无路，中国也不会手软，不会怯步。美国要打什么战，中国都会奉陪到底。美国没有打赢中国的胜算，当然中国也不想带着一身伤疤去庆祝打败美国的胜利。因此，世界各国要行动起来，共同抵制和反对美国的“新冷战”，要避免世界再遭惨不堪言之祸端。

中美关系虽已坏到了几乎不能再坏的地步，但并非不能逆转，并非无法挽救。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中美两国领导人还有机会对中美关系的现在和未来做出选择。这一选择将决定中美关系的生死存废，将决定中美两国人民子孙后代的祸福安危，也将决定世界今天和明天的荣枯兴衰。

中国的态度是清楚的，立场是坚定的，选择也是明确的。现在球在美国一边，选择权在美国一边，美国领导人做何选择，需三思而后行。

关于中美关系的三点宏观研判

徐弃郁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应该说中美关系向下的趋势进一步加剧了，近期以来我觉得扰动也更加明显，大家对中美关系会怎么走，应该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想今天借此机会对中美关系说三点宏观判断。

第一点，现在还不能说中美已经进入了“新冷战”。中美关系现在的状态确实是建交以来非常罕见的。它虽然没有出现像1996年台海危机、2001年撞机事件这种重大的突发性事件，但是现在中美关系向下的趋势非常得大，而且恶化的速度非常快，目前为止也没有看到触底的迹象。所以现在美国也好，我们中国也好，很多人开始讨论中美“新冷战”。

但是，我个人认为，用“新冷战”来描述现在的中美关系是有问题的，甚至带有很大的误导性。历史上美苏之间的冷战是一种特征非常鲜明的现象或者说是一种历史模式，中美关系套用不进去。

比如说吧，中美之间确实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深刻分歧，但是意识形态在中美矛盾里面并不是占有主导地位的，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中国实力的增长才是关键。而在冷战当中，意识形态冲突恰恰是一个主导性因素。

再比如，中美之间没有一个明确的地缘政治对抗，现在西方有一些分析家就说中美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地缘政治对抗，在非洲、南海、一带一路、印度洋这些都是地缘政治对抗，这是有问题的。你看冷战期间，美苏之间存在的地缘政治对抗是非常明确的，而且界限非常清晰，你如果看一下地图你可以找到明确的“前沿地带”，你比如说美苏地缘政治竞争的重点就是在欧洲，欧洲的重点就在中欧，中欧的重点就在德国，德国的重点就在柏林，柏林就在柏林墙。

另外，中美矛盾是不是已经发展到当年美苏那种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必须有一家退场才能够结束的这种状态？我觉得还没有到这个程度。目前来看，中美之间那种相互依赖因为美国单方面和中国搞脱钩确实有所减少，但是相互依赖从绝对值上来说还是非常大的。而且美国这种单方面脱钩的做法在经济上、政治上、安全上都有相当大的回调压力。所以我想说中美现在的矛盾和当年美苏之间的矛盾还不是一个量级的。

再有就是军事对峙和军备竞赛，在冷战期间这是美苏竞争的主要内容，但是从目前来看，我们中国还没有可能陷入到一场和美国的军备竞赛当中去。应该说我们中国不会掉到这样一个陷阱里面。

所以我觉得用新冷战这个词来描述中美关系其实差得很远。中美关系现在确实非常不好，而且从近期来看，你也看不到有什么好转迹象，但是中美关系的恶化并没有到不可挽回的程度，它和当年美苏之间的矛盾也有质的区别，这是我对中美关系宏观判断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中美之间危机管控的重要性在上升。我说中美关系没有恶化到不可挽回的程度，并不是说中美关系当中没有风险。实际上现在最大的风险是，中美关系的这种恶化造成了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之下很多原来可以很轻松解决的，有正常渠道解决的事情现在变得不好解决了，甚至说你连谈都很难谈了，甚至对方会出来不少极端行动。这些行动刺激性很大，很容易引起一种舆论的爆发。这种情况下一些小摩擦可能变为大摩擦，一些小的事件可能变为一些大的危机，这样一来防止意外事件、危机管控的压力就变得很大了。

说到危机管控，实际上中美之间已经有一些危机管控机制。从2014年中美两国元首签署两个备忘录开始，中美两军就开始了危机管控机制建设，防止出现意外情况，实际上就是防止擦枪走火。应该说这几年下来，阻力是相当不小的，但是两军在这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应该说现在可以做到防止一

般性的意外情况发生。在现在两国关系这种状态下，美军在我们当面采取的行动这么频繁，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这种还处于初步阶段的机制就面临了非常大的压力测试，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我在中美关系宏观判断上的第三点是“第三方”因素在中美博弈当中的影响不断上升。讲中美关系不能忽视第三方因素，实际上美国现在仍然是第一强国，但是已经越来越不像超级大国了。因为美国相对实力的下降，使得在中美博弈当中，第三方或者说处于第三方地位的大国或者说是一个战略力量，它起的作用就会增加。比如，在中美贸易摩擦和技术竞争当中，欧洲和日本就处于两难的地位，一方面他们和美国是盟友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和中国之间有着非常大的共同利益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欧盟也好、日本也好，都有足够的动力去追求一种相对独立的对华政策，和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当然，做到这一点对这些国家来说其实很难，但是趋势已经出来了。特别是欧盟，在对华政策上已经和美国形成了明显区别，像6月22日中欧峰会以后欧盟方面的官方文件就把中欧关系定义为“复杂而重要的伙伴关系”，而“伙伴关系”这个词在美国国内已经没有人用来形容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了，讲到中美关系时基本上清一色都在说“竞争”，有的甚至是说“对抗”。这种区别很重要，说明欧盟这样第三方力量的影响和地位正在变得更加重要，其实俄罗斯也是这样一个第三方力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下一步中美关系怎么样，能不能稳住，能不能往前走，就需要从一个更大的框架来分析、来看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认认真真做好中欧关系、中俄关系、中日关系，本身就是对中美关系的一个良性刺激。中美关系非常重要，但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大国关系。现在的情况下我们尤其要看清楚这一点。

世界已进入多边体系框架的新时期

Vladimir Yakunin
文明对话研究院董事会主席
俄罗斯铁路股份公司总裁
（2005–2015）

2007 年，“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曾指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多边世界，实力相对较弱的国家将拥有更大的地缘力量”。国际关系学者 10 多年前预言的世界多边体系框架如今已经全面建立起来。

在当今国际政治体系中，很多国家的经济实力与政治实力之间存在巨大脱节。虽然新兴市场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 60%，但这些国家在主要国际组织尤其是经济和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尚不足 30%，这既不公平合理，也不可持续。如今国际关系的基本概念和框架仍然建立在过时的国际发展理念基础之上，原因在于两方面：其一是在通讯与信息技术驱动下，世界变化速度过于迅猛；其二是在世界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个别国家仍希望在意识形态方面保持排他性和优越性。近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中美已进入“新冷战”，但这一概念背后的意识形态体系与美苏冷战时相比有着根本区别。“新冷战”是源于中国在科技、经济等方面挑战了美国的主导地位，引起了美国的强烈不安。

过去几十年，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和国际秩序的重要参与者一直是西方发达国家，其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为世界其他国家建立了学习的模板。西方国家设立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一经济指标作为衡量各国福祉的核心标准，也确定了其发展模式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因此全球化进程基本上是建立在西方社会固有的科技、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基础之上的。

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更重要的议题是生存。如今，随着亚洲和非洲国家的迅速发展，世界领先国家阵营中出现了新面孔，这就意味着西方国家的代表性相对在下降，以及国际架构将从以西方为中心的模式向更倾向于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及其文化多样性的新模式过渡。要想确保这一新模式可持续发展，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保证各国能就关乎全球发展的关键问题进行平等对话，团结一致克服贫困和不平等的问题，深入了解并认同不同文明之间的价值观、政治体制和政策的差异。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以西方国家为中心、以西方标准看待发展中国家的模式是危险和错误的。西方政治精英的错误观点会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比如使《中程导弹条约》等长期合作机制失效，这样一来，各国想要恢复或重建新的合作平台将变得更加困难。

各个文明都应肩负起各自的责任，尤其是西方国家必须接受现实，承认世界已进入更加现代化的多边体系框架新时期，承认文明之间相互平等的新范式。理想的对话和合作应该建立在各种文明平等的基础之上，而非是将每一次价值观问题的讨论变成意识形态之争。人类的福祉有赖于文明间平等而广泛的合作，而不能用军事或经济实力来区分三六九等。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尤其是在谈到中美及中欧关系时，要重视各方之间的文化关系，更多地举办像太和文明论坛这样的讨论平台，不断加强观念方面的合作与发展。

今年是二战胜利 75 周年，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所肩负的责任，不能忘记我们为新生所付出的代价。战后联合国成立的基础是战胜国对战争结果达成的共识，目的在于避免全球冲突，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75 年前，各国放下意识形态分歧，怀抱更高理想，构建全球合作机制，这为如今意识形态冲突频发的世界树立了榜样。当今世界最危险的现象之一是公众观点和政界观点的两极分化，国际关系的状态被认为应该就是国家集团之间的对立，个别国家只能沦为对立关系的牺牲品。但我们必须反对这种国家集团模式，遵循文明之间保持对话与交流的原则，互相学习，保持文明之间的平衡。

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的威胁不分文明和国界，世界各国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应对。疫情提醒我们，当今世界的分裂相当危险，世界需要紧急解决这一情况。当今世界也缺乏具有国际领导力的国家。某些应该负起责任的国家却在疫情中只考虑本国的利益，抛弃了原本引以为傲的国际原则和规范，完全忽视了亚非新兴国家及全球利益。多年前，我曾提出中国未来可能面临两个陷阱：一是美国可能怂恿中国接过自己在全球政治、经济和金融方面的领导权，成为世界第一的政治力量。二是美国营造全球舆论，称中国在历史、文化上已经做好接棒成为世界第一地缘政治大国的准备。中国应顺应世界文明发展的新范式，以合作、多边、共赢的态度应对全球发展中的各种挑战。跨文化的讨论和文明间的交流是可以实现的，也只有这种方式才可能解决现代纷争。

疫情下的“一带一路”：联通·阻滞·重启

翟崑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

我今天给大家演讲的题目是，疫情下的“一带一路”：联通·阻滞·重启，这是三个关键词，会涉及到中美关系对“一带一路”的影响。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改变世界，当然它也会影响“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疫情暴发之前，“一带一路”建设在过去七年已经形成了一个内外联通的局面，它的主题词就是联通；在疫情之中，“一带一路”建设的内外融通横遭阻断，它的主题词就是阻滞；在疫情治理当中，“一带一路”的内外融通需要健康重启，所以它的主题词是重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带一路”和中美关系又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关系。

我们先讲第一个问题，即疫情前，“一带一路”是怎么形成一个内外联通局面的。从2013年秋天“一带一路”提出到现在，“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个新现象，也是一个新名词、新知识，用现代话来讲就是一个新的IP。相关书籍越来越多，我自己也贡献了好几本，我们通过太和智库所提出的“一带一路”五通指数也受到国际关注。有人问我，要了解“一带一路”的前世今生和来龙去脉，应该读什么书？我推荐两本书是能够打通“一带一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本是英国人写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副标题是“两千年来始终主宰人类文明的世界十字路口”，这本书一语道破“一

带一路”的前世，就是“丝绸之路”，是跨洲际的文明大动脉，而且是世界性的。另一本书是美国人写的《超级版图》，副标题告诉我们“一带一路”的三大未来：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还有新商业文明的崛起。这本书也有一个广告词，即全球版的“一带一路”战略路线图，未来国家竞争力全景预测。那么这两本书描绘了当代中国人的全球视野和全球化道路，就是从“丝绸之路”到“超级版图”。而我把“一带一路”理解为中国全球互联互通史的延续，它蕴含着中国兴衰起伏的国运密码。如果我们就用一句话或者几个字，来简单概括中国几千年来的发展模式，可能就是内外融通。中国治国理政的理想是长治久安，要长治久安就得解决内忧外患，要解决内忧外患就得统筹内外两个大局。这是中国领导人一直在知行合一、修习实践的一门大课。内外统筹解决得好，中国就国泰民安，反之亦然。当年汉武帝封西域归来的张骞为博望侯，也是表彰他在统筹内外两个大局方面所作的贡献。所以，内外融通是中国的国运密码。新中国建立以来，历代领导人都在统筹内外两个大局方面下大功夫。

直到习主席提出“一带一路”作为统筹内外两个大局、带动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的抓手和实践平台，进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带一路”就成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根据以上国运密码的原理，“一带一路”兴则内外兴。如果大家想以最简单的办法去了解“一带一路”内外融通的发展大略，可以查找2017年、2019年在北京召开的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有很多资料，这样就可以知晓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如何与对外推进“一带一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太和文明论坛每年会有“一带一路”相关的内容，也是最新的对“一带一路”进行战略判断和战略咨询的非常好的平台。

那么“一带一路”是如何带动中国和世界共同成长呢？就是它的动力何在？习近平主席曾经在2017年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用打通大动脉来形容“一带一路”的建设。那么现在，“一带一路”大动脉的发展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和认知，呈现一种叫“万物互联竞自由”的形与势。2013年的时候，习近平主席在中亚最大的国家哈萨克斯坦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中国的发展之翼向欧亚大陆延伸，进而形成陆上的六大经济走廊；他在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尼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国的发展之翼延展至海上，进而形成三条蓝色经济通道，我们说这是大国之翼。其中，通往北冰洋的冰上丝绸之路将“一带一路”引向极地。这只是早期“一带一路”建设的空间布局，现实和想象就是用来打破的。之后，中国又创造性地开发了空中丝绸之路、网上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也有专家在倡议空间丝绸之路或太空丝绸之路，最近北斗三号的表现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希望。在万物互联的新时代，尤其是随着工业互联网的全球化新发展，“一带一路”将成为一个在海陆空天网的新

空间中涌动的一条新的大动脉。这就突破了刚才我提到的《丝绸之路》和《超级版图》所描绘的现实和所预测的未来，这是中国致力推进的一个内外联通的互联互通的新世界。

“一带一路”大动脉给中国的内外融通带来一个历史性的变化。从中国地图上，我们可以先找到重庆，然后从东西向和南北向看“一带一路”大动脉的发展。首先看东西向：重庆首创了渝新欧铁路运输的这个中欧班列，此后中欧班列快速遍布全国，尤其是向广西等西南部沿海省区推进，这就打通了欧亚大陆，联通了中国腹地，并且往中国的沿海地区去推进，形成了东西向内外联通的“一带一路”大动脉。然后我们再看南北向：还是看重庆。2019年8月，国家发改委颁发“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文件，从重庆向南向北，打通从内蒙古一路南下、经过中西部到贵滇的南北向大动脉，并跟东西向大动脉相对接，这就形成一个十字架似的但是遍布全国的局面。这两条大动脉相互交叉，覆盖全国并且通达世界，有力支撑了我国现在对外开放的格局，就是“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这个局面是历史性的，它意味着国家在做“十四五”规划以及地方发展开放规划时，都需要融入“一带一路”这个大动脉。

在这条大动脉上，“一带一路”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们把它叫做心手相连。心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初心，手是“一带一路”合作的内容框架，就是五通，我通常把它放在五个手指头上，分别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是“一带一路”的硬核，就像一只握起来的拳头。五通如果是一只拳头的话只是一只看得见的手，还有一只是看不见的手，这就是“一带一路”所说的市场环境和国际环境。我们今天在这个论坛上去探讨“一带一路”的发展环境，也是尽量想给这个市场环境和国际环境增加一些确定性，使它推进更加顺利。这是第一部分，就是在过去七年“一带一路”所形成的一个比较成型的、稳定的、内外联通的大构架。第二部分我给大家再说一下疫情中一直到现在，“一带一路”经过七年的建设已经形成了内外融通的基本盘。我们本来认为“一带一路”可能就这样一路走下去了，这是一种非常线性的思维，但是我们美好的愿望遭遇了疫情的阻断。病毒的横贯蔓延阻断了“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也恶化了“一带一路”的内外发展环境，使得“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面临三大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全球撕裂。如果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金字塔，那么疫情严重扭曲了金字塔的基本形状，导致“一带一路”痛则不通。从金字塔的基底来看，疫情直接危及全球人类安全，造成全球性恐

慌。疫情的影响已经超过非典，引发种族歧视、民族主义、对全球化的敌视态度，进而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从金字塔的这个塔体来看，疫情打击了全球发展，加剧了全球安全困境。全球经济衰退已经成为定局，中美欧三大经济体也是三大经济引擎一度停顿，G20国家首当其冲。疫情造成全球产业链断裂，全球股市、汇市、油市大动荡。全球12个主要行业中的10个，包括半导体、汽车、医疗设备等已经发生或正在酝酿新的产业链重组。从金字塔的塔尖来看，疫情考验各国的应对治理模式，并涉及国家体制、政治制度、国民素质、意识形态和综合国力的竞争，而在疫情大考中，合格的国家非常少。

第二个挑战就是中美矛盾。中美矛盾并没有因为“一带一路”的停滞而缓和，反而加剧升级。自特朗普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报告出台以来，尤其是今年5月20号推出美国对华战略文件以来，它更加地针对“一带一路”，美国主要做法很多，我给大家列举一下：第一，把印太战略作为对抗“一带一路”的主要抓手，继续在印太地区进行战略部署，推进“蓝点网络”计划，挑战“一带一路”的标准建设；第二，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将“一带一路”称之为“病毒丝绸之路”；第三，煽动“一带一路”国家提出追责免债，好多国家都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最近看来确实难以实现，确实非常无理，也没有根据；第四，以“质量不合格”的原因来抹黑中国的医疗卫生援助，并且美国在4月出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叫数字援外战略，因为大家都把数字经济发展作为疫情之后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所以美国就率先出台了一个数字战略，通过数字援外去建构它的数字生态；第五，通过“脱钩”“断链”“破网”“退群”等等这样的行为把中国赶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第六，防止中国“利用”国际组织推进“一带一路”的公共卫生合作和人道主义援助。未来，在中美战略博弈升级的情况下，中国总的来讲有两方面的应对策略：一方面，就是两国在“一带一路”的竞争和对抗是一种新常态，“一带一路”的中美关系化和中美关系的“一带一路”化是一个发展趋势，就当注意它“争”的一面。另外一方面，我们还要注意到它“和”的一面，“一带一路”的本质属性是合作，我们要通过合作应对反对，在这种情况下“一带一路”所具有的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地缘政治属性将会加强。因为美国、印度、欧盟都认为“一带一路”是具有地缘政治因素的中国国家战略，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所以这就是我们怎么去在原则上推进合作、推进中美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的合作与磨合，规避矛盾的主要方面，争取在矛盾的次要方面保留一些合作空间。比如：中国可以进一步加强与亚欧非的合作，将“一带一路”与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印太战略，和东盟的印太展望战略一起磨合、对接和融合；中国要推进高质量“一带一路”建设，美国、日本、欧盟也在推进高质量标准，中国可以与这些国家尤其是美国尝试进行一些磨合对接；在第三方合作方面进一步加强，中国和美国可以在公司层面加强在东南亚的第三方合作，比如数字经济，现在东盟在搞智慧城市网络建设，需要中国、美国共同努力把它去推进。

第三个挑战是崛起困境。“一带一路”让世界是更好了还是更坏了？这是个时代之问。“一带一路”的本意是达则兼济天下，以内外共同发展的路径，来缓解中国的崛起困境，那么这里有一个概念就是中国的崛起困境是什么？一方面中国要保持自身崛起和发展动力，另一方面要改善和优化因为我们崛起而给其他国家带来的安全困境，这就是一个矛盾，由于发展而要去优化环境。安全困境的意思也非常简单，你强了，我就感觉危险了。这是人之常情也是国之常忧。

在疫情暴发之前，“一带一路”给世界共同发展带来了公共产品，这是公认的成就；但在消解其他各方的安全困境方面，仍面临很大阻碍。西方国家主要从意识形态、价值观、地缘政治思维出发，质问“一带一路”到底是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不是用来替代美国霸权秩序的中国霸权秩序，同时也批评“一带一路”政策和项目缺乏透明度，并且在推进过程当中实施“新殖民主义”，造成债务陷阱、缺乏透明度、破坏生态环保、加剧腐败等等这些问题。

总体上，中国在全球的认可度和软实力都有待提高，“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着地缘政治、政权更迭、政治斗争、恐怖主义、法律不彰、天灾人祸等各种风险。当前，疫情影响了中国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能力、规划和节奏。疫情更像一个潘多拉盒子打开之后的世界，它激发和放大了各种负面效应，加剧中国的崛起困境。

第三部分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在疫情暴发之后如何使“一带一路”在停摆和停顿当中健康重启的。

基于以上这些困境叠加，“一带一路”还要继续走吗？这是一个新的问题，国内外也有一些观点，其中有的观点就认为中国是否应该放弃“一带一路”，中国是否应该封闭起来，自成为一个世界？当然不是！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内外融通”是中国的国运密码，“一带一路”是国运密码的当下体现，它不会因为遭遇打击而停步，这正是战略定力的体现。“一带一路”的“本职”工作就是为中国和世界的共同发展铺路搭桥。路不平，有人填；世界阻断，由“一带一路”来填补、来修补、来增补。

世界的停摆，它必然造成“一带一路”的停摆，疫情也给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了机会。一方面中国有时间去反思“一带一路”建设的初心，以及这七年的经验教训，可以确定在新的时期“一带一路”建设的轻重缓急，进行一些战略调整，比如说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更重点的国家，更需要我们一起

合作的国家；另一方面就是中国可以有时间进行再设计，进行健康重启和再出发，既要建设健康的“一带一路”，也要保障“一带一路”的健康发展，这两个健康是不同的含义，在这个基础上赋予“一带一路”的新的国际合作的含义。这里强调一下是健康的“一带一路”和保障“一带一路”的健康发展这两层含义。

所以从3月开始，中央已经作出决策，就是“一带一路”要继续推进。3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就召开会议，提出“要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坚持稳中求进，集中力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国内发展大局和内外工作全局”，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内外融通在中央层面的调子。4月习主席召开政治局会议，主要研究防治疫情，他也说到“要坚定扩大对外开放，保障国际物流畅通，严把防疫物资出口质量关，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路不平要有人来填。

5月下旬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两会上关于“一带一路”的议论很多，而我们总理的报告当中也继续提出来“一带一路”要健康重启再出发，要高质量发展。6月的时候，我们的国务委员、外长王毅主持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的视频会议，习近平主席致辞，最后这句话我觉得可以引用一下。王毅部长强调，当前，战胜疫情、复苏经济是各国的共同和紧迫任务。中国愿意优先加强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的沟通协调，愿意和国际伙伴并肩努力，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合作之路、健康之路、复苏之路和增长之路，开辟“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更加光明的未来。这句话其实含义还是很新的，他非常明确指出了在疫情之后中国应该怎么样去推进“一带一路”，我们过去提出“一带一路”好多目标，比如说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绿色、廉洁等等。那么在疫情之后，王毅部长就提出第一是合作，因为大家都在疫情之后，不合作是不行的；第二个大家都认为健康是首要目标；第三个我们要走世界经济复苏之路；第四个我们要在复苏之后还要增长。这就是在疫情之后“一带一路”推进的一个主要目标了，因为刚才我也说到要赋予它新的合作含义，这就是“一带一路”未来所有的新的含义。

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 展望“后新冠疫情”的世界

朱云汉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执行长

今天我的主旨发言，想要谈的题目是“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展望‘后新冠疫情’的世界”。我们知道，自从今年年初新冠病毒的疫情肆虐全球，带给人类社会非常严峻的健康风险，也严重干扰了所有国家经济社会的正常生活。在这场危机还没有结束之前，其实很多专家都在认真地辩论，到底这场危机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什么样一种长远影响，特别是对于全球化未来的前景，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察。

比较悲观的学者认为，全球化本来就已经面临各种裂解的压力。而这次新冠病毒危机的暴发，更加强了、加深了全球化所面临的危机，很多国家转向经济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的情绪高升，而且，对于过去全球化的各种风险，也带来更深刻的认识。很多国家把自己的国境大门关闭，让很多正常的经济、文化、科技交流合作的往来都很难进行，这是很多人产生悲观预期的原因。当然我个人认为如果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后新冠疫情”世界，固然使全球化面对非常严峻、前所未有的一些新挑战和裂解的压力，但他还是有非常充沛的推进力量。它给世界各个不同的族群、国家和社会创造的各种经济红利，也还没有完全释放。所以我还是认为，全球化有很强的一种再融合的动力，会慢慢涌现出来，应该可以平衡掉对全球化带来障碍和困难的裂解压力，这是我的整体性观察。

我们知道在新冠病毒疫情还没有暴发之前，的确全球化在过去几年前进的脚步逐渐缓慢下来，遭遇到很多新的而且前所未见的一种障碍。这里面很多学者认为，全球化当前面临的危机，至少有四种类型的冲击。第一种冲击就是在很多国家，全球化他所仰赖的社会支持基础出现了动摇，尤其是在欧美发达国家，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排外主义、反移民，还有倾向于关起门来自扫门前雪的这种孤立主义情绪，以及主张反全球化需要重新考虑经济自给自足的这种思路，这几年可以说是风起云涌，而且带来各种不同的反全球化的政治运动。尤其是英国的脱欧，还有美国特朗普当选，都是这个风潮最显著的一些政治上的里程碑。

第二种冲击是支撑全球化的很多国际规则和多边体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尤其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全面转向单边主义，而且也抛弃过去作为国际社会领导者的责任跟角色。所以我们很担心，战后70年支撑经济合作、支撑经济自由化的那些基本规则，还有这些重要的国际组织，是不是能够正常运作，甚至也会出现劣迹。

第三种危机是全球化经过35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面对一个空前未见的地缘政治冲突，这也跟特朗普有关。特朗普上台之后，开始升高对中国以及俄罗斯的战略对抗，而且他身边的一些鹰派智囊，甚至不惜把中美关系带入一场所谓新的冷战，进行不仅是贸易上的摩擦，还有科技上的封锁，还有试图切断中美两边过去已经累积了非常深厚的，在文化领域、科技领域、教育领域的各种现有交流机制。也就是说，中国跟美国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出现了所谓“脱钩”，或者是叫裂解的现象。这个现象对全球经济、对全球化，也带来了非常沉重的压力。

第四种全球化所面对的挑战是过去三十多年全球化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快速前进，但整个人类社会在政治领域以及全球治理问题，在社会跟文化领域，是不是有更强的一种全球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或者是全球社会有一种共同的愿景，这些领域的发展非常滞后。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走在前面，但是社会文化跟政治领域的全球化建设，远远落后于经济全球化。这就带来高度不平衡，也使得很多全球化所制造的各种社会矛盾难题没有办法有效解决。同时，我们地球也在面对各种前所未见的威胁人类生存的各种危险。

其实，新冠病毒所代表的传染病风险只不过是其中之一。今年，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各地都有非常特殊的异常天候，以及各种不同形式的巨大自然灾害。这也意味着全球暖化危机、全球生态问题，也到了一个几乎可以说是无可逆转的危机关头。当我们还要面对所谓的金融危机、文明冲突以及大规模杀伤

武器扩散等威胁时，实际上都需要更强的国际合作和更有效的全球治理。可是这几年这方面发展完全是原地踏步，甚至可以说有所倒退。所以说其实在新冠病毒还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就面临着这些非常严峻的危机。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冠病毒暴发对全球化前景来讲，当是雪上加霜。

不过，我整体感觉还是有一定程度的积极跟乐观的一面。因为我们可以说，反全球化的社会运动或政治势力，主要集中暴发于欧美先进国家，如果你看大量的新兴市场国家，还有其他广大的发展中地区，其实对于全球化充满着憧憬，还是希望能够参与这样一种全球的分工、合作，进行互补有无的各种不同形式的交换，来增进他们自己的发展机遇。从这角度来看，还是有相当程度潜在的支持者。在这方面，我们并不是真的担心全球化缺乏前进的动力。

另外就是过去35年的快速全球化事实上已经搭建了一层一层、非常厚实而且非常复杂的、支撑全球化的各种不同的运作机制。这些机制有它的韧性，尽管出现像特朗普这样代表某种程度上破坏全球化的力量。但是到今天为止，他还是没有能力完全撕裂过去三四十年所累积的基础。当然我们知道，在“后新冠疫情”的世界里，由于汲取了这场危机带来的各种教训，所以全球化路径还是会做一些修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全球供应链也会做一些调整，过去走的水平分工可能更多会走向垂直整合，但这只是一种合理的阶段性调整。当然，未来对跨境人流方面会有更强的一种健康安全管制，它也会变成常态。如果疫苗能够很快速地研发上市，也许这方面的风险也可以逐渐达到一种可控的地步。

同时我们也看到，因为疫情的倒逼，很多新的机制很快就会浮现。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应对新冠疫情危机过程里，各种过去实体经营的活动都大量移转到云端，移转到线上，而且它完全不受国界的限制，也不需要人跟人直接面对面接触。所以各种虚拟会展，各种线上娱乐还有体育活动，线上教育形态还有远端医疗，在这个时期都取得了蓬勃发展。这些趋势我觉得还会继续加速。同时，还有很多领域因为疫情刺激，也会加速进行技术上的创新和突破。事实上，这些发展还有助于整个世界经济的融合，深化各个国家之间的合作。比如说电子支付、微型金融，透过网路、透过人工智能的这些新技术，还有数字货币，这些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看到的一些新的展望。同时这场危机也会刺激5G通讯与万物联网这方面大步向前跨越。未来人工智能机器人会大量进入制造业、服务业，这都是推动全球化下一轮增长的可能的重要力量。

所以整体而言，我认为新冠病毒危机将对国际秩序产生一定影响，也折损了美国国际领导的威信，也让过去被世人所推崇的西方政治体制很多优越性，面临了更严酷的检验。同时，在这场危机之中，我

们可以看得出来，很多人都感觉得到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能运用有效的治理机制，运用最新数字科技进行有效风险管控的社会治理能力，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在新冠疫情暴发的尖峰时期，国家力量、国家治理能力，事实上是战胜这场疫情的一个关键因素。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短期内疫情激发了许多社会内部负能量，助长了狭隘的国族主义，那种自扫门前雪的观念在有些社会大行其道。

但是长期来看，事实上这场疫情我认为它还是会激发更强的一种全球意识，因为病毒是不认边界、不认种族、不认宗教、不认阶级的。要有效对抗这场疫情，克服这场疫情带来的所有政治、经济、社会风险，唯有更强化各国合作跟相互资源互补才能实现。尤其未来在健康公卫领域要分享成果，如何让疫苗成为国际公共服务产品，我觉得这些观念也正在形成之中。我想将来在全球范围，需要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健康公卫资源的应急互助机制，因为每一个国家的个别应对能力都有它的极限。

整体上而言，我认为其实从长远来看，没有国家可以自外于全球经济和全球社会，即使庞大如美国也难以自给自足。拥抱全球化的利益攸关的群体还在扩大之中，而且尤其是所谓的“全球南方”，就是发展中国家，还有巨大的增长潜力有待释放。同时中国大陆也正在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透过“一带一路”，正在推进一个大规模的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能够为未来的全球化打造更厚实的基础。“一带一路”不仅是从事关于贸易合作和自由化、投资的便捷，同时它把全球化的基础扩展到金融产业领域的合作，包括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在新能源、在农业科技、在网络、在环保、在教育和文化及公共治理的经验的相互借鉴等等方面，都在进行更积极的跨国多边合作。所以从整体上来讲，我认为在疫情逐渐消退之后，全球化的再融合动力还是非常可观的，而且应该足以抗衡全球化所面对的当前危机，以及它们所带来的裂解压力。

教育文化分论坛主旨演讲

就业服务与教育服务的协同是落实产教融合战略的基础

陈李翔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

我主要聚焦在就业服务与教育服务部门的协同以及如何推动产教融合的战略落实。在中国各部门当中与职业教育最相关的是两个重要部门，一是教育部门。二是人力资源部门。他们分别在就业服务和教育服务方面起到主要政策制定者的作用。

2020 年 9 月 8 日中国政府隆重表彰在抗疫斗争过程中表现突出的英雄，并为他们授予了国家勋章。应该说这是中国抗疫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中的一个信号，给社会、民众提供了一个非常可信的信号，帮助大家理解当前我们在这个阶段中大家所经历的一些变化。这是疫情之后可以反思这个过程，但疫情现在还没有完全过去，全球的疫情还在一个演化的过程当中。尤其就业和教育的工作者们已经开始在思考疫情后的一些事情的变化。

在我看来，疫情之后有三个重要变化正在重塑就业和教育的关系，一是在疫情之下，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的变化。二是技术变革推动工作方式和学习方式的变化。三是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国际贸易的一些冲突正在引发全球供应链的

变化和重组。所有这些变化会集中地反映到就业领域当中，而且会直接影响到劳动力供给的规模、质量和结构。一方面，由于疫情中的社交陷阱和受疫情影响劳动力流动意愿的下降，实际上已经影响到劳动力的流动，而产生一定程度的流动性劳动力的短缺。

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与技术的变革正在引起劳动力的重要变化，会出现技能短缺与技能替代的现像，因为新技能的不断涌现，能够掌握和运用新技术的人员正在学习和开发过程中，技能替代是新技术正在广泛替代一些规则性劳动、规则性工作。这样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产生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

当然，在疫情期间，八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看到，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培训方式、供给方式的变革，以及改善了劳动力的供给状况，特别是为疫情后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的恢复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更看重的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教育和产业的互动与协同关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使我们能够更加充分和深入地在一起，为一个共同的目标产生一些新的方式，比如新的学习方式、工作方式。表现比较突出的是线上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开展。

线上学习强化了知识和技能获得的碎片化的程度，这是我们现在特别关注的一个发展方向。这样的方向使得我们认识到劳动者就业能力的开发，一方面，我们学习的供给正在快速碎片化，但另一方面，企业的需要特别是在特殊时期工作岗位的需求更加依赖于技能的迁移性和技能的共享。劳动力市场对劳动者就业能力的灵活性和包容性的要求通过疫情期间的变化越来越高。

这就产生双面性。一方面，以互联网技术为特征的线上学习发展使得技能获取更加碎片化。另一方面，产业对于技能人才的要求又是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包容性。在这种背景下，在学习资源、学习过程、学习评价等方面，可能需要朝着数字化、过程化和综合性的方向进行变革。这样变革的方向使得我们更需要加强产业部门、就业部门和教育部门之间的互动性，特别是协同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两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可能就会变得比较重要。

据观察，两个部门之间关系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观念是需要引起大家重视的，首先对于一个社会来讲，就业的公平和教育的公平是这个社会公平两个最重要的基石。

中国政府认为，就业是民生之基。随着社会发展，我国的就业目标已经从实现充分和体面就业发展到追求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所以国家在最近的 20 年中开始提出，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并且

把积极的就业政策与财税和金融政策作为中国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之一。在疫情之下，要实现社会稳定必须在保障国民健康生活的基础上实现有序地复工复产。最近半年的实践当中看到，积极的就业政策和有效的教育培训举措在保障此次疫情后有序复工复产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与此同时，职业教育体系在改革，改善我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对提高劳动者终身的培训，保障劳动者的就业权利特别是增强产业的竞争力起到了重要的基础作用。

在这个基础上，理解教育的公平和就业的公平实际上是同等重要的。从疫情当中可以看到，这两者之间的紧密合作是保证社会运转最基本的基础。就业服务和教育服务是产教融合最重要的基础。比如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经历了将近 40 年，目前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在新技术应用日益广泛的背景下，既能替代深刻的影响、劳动力的供给结构和供给质量。发展高新技术领域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实施产教融合的国家战略，已经成为国家在提升劳动力供给能力上的重要途径。人力资源部门、就业部门而言，他们最近正在广泛推行一项影响产业和教育的计划，称之为技能提升行动。这样的计划的实施使得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无论是初次就业的学校毕业生还是企业内的就职员工，都有机会能够参与到普惠制的培训项目当中来，核心的目的就是要改善他的技能结构，来适应企业在技术应用和产业升级过程当中技能短缺的需要。这个计划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一个大规模的培训时代正在迅速到来，我们已经看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些基本特征，一是终身的培训制度正在常态化，并成为国家基本社会政策的一部分。二是培训项目与企业需求和产业变化对接机制的精准化和敏捷化正在成为所有培训项目、培训政策的目标追求之一。三是劳动者技能形成的过程化和培训学习方式的个性化正在培训行动当中产生越来越多的影响。四是如何让培训变得更加有效，培训的评价和监督机制的数字化也在过程当中得到发展。评价技术，在培训技术方面也开始受到相关机构的重视。

在整个改革过程当中，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知行合一、工学一体已经成为职业教育的基本原则，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政策正在成为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一方面看到的是国家社会政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看到产教融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业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协作，正在推动它向更深入的方向发展。怎么做才有可能产生协同？目前不太让人满意的地方是，更多的人在关注两个部门或者两个系统之间关于办学的一些不同的观念，很少有人会特别关注到政策的协同和标准与技术的协同方面如何产生更多的作用。实际上就业部门和教育部门所开展的就业服务和教育服务就产业需求而言，永远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所以我们要强调如何保证政策的协同，首先是中国正在开始进入

到“十四五”规划阶段，确保就业战略和教育战略的协同性是这在社会发展当中非常重要的。特别要提到具体的就业服务政策和教育服务政策方面要具有协同性。如何确保人才评价政策在就业服务和教育服务中保持一致性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现在“1+X 体系”的试行，如何和劳动力市场的人才评价标准之间建立起比较广泛的联系开始变得比较重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在标准方面进行协同，人才的评价标准和教育评价标准方面需要有一些很好的对接一是确保国家的职业分类和国家教育专业目录方面能够有很好的衔接性二是职业标准和相关教育标准之间能够有很好的衔接性以及在就业部门所推行的职业认证标准以及教育部门推行的学业评价标准之间保持一致性；目前在人力资源部门和教育部门之间有两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评价系统，这两套系统之间如何保持等值性的评估也是对于未来的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就业服务的开展都是极富挑战性的工作。保持标准协同就需要有信息的支持，在信息协同上使两个系统的信息保持有效的沟通和共享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比如人力资源部门会定期或不定期发布人力资源市场的信息，教育部门也在广泛收集产业方面的信息，包括教育内部跟学习有关的信息。在这些方面如何真正实现信息的共享？特别是推动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学习资源的共享方面以及关于技能训练资源开发方面的共享。要实现信息共享，在今天恐怕需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的工作。就业服务信息和教育服务信息的数字化以及数字化标准的一致性，这个就会开始变得非常重要。

希望就业部门和教育部门能够在政策协调方面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共同推动中国职业教育的变革以及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新西兰的 TVET 与微证书改革

John Clayton
新西兰 Awanui ā rangi 大学土著创新学院 Mark Laws 教席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新西兰的TVET（技术、职业教育与培训）改革及微证书的相关问题。在新西兰现行教育体制下，学生五岁进入小学，十三四岁进入初中，十五岁至十八岁就读高中。在高中阶段，他们首次接触到技术和职业教育，然后可以顺着这条路到理工学院、私人培训机构进修，之后还可以到毛利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他们也可以选择一条传统的学术道路，即在大学从学士读至博士学位。

新西兰有一套非常严格的教育质量保障管理体系。首先，所有教育机构都需要得到新西兰资历认证署的认证，以确保这些机构提供的教育是良好且稳定的。此外，所有的认证都需要得到新西兰国家资历框架的正式批准和注册。而且，所有教育机构都要定期接受外部评估和审查。

作为新西兰教育体系的核心，新西兰国家资历框架是世界上最早的几个资历框架之一。此框架不仅能使相关方衡量其学历水平，还能更好地对比新西兰与世界其他地方提供的学历标准之间的差异。

新西兰国家资历框架分为10个等级，涵盖了从证书到博士学位的一系列学历。等级是基于学习的复杂程度而划分的，1级最简单，10级最难。新西兰国家资历框架列举了学生在每个学历等级需要学习的技能。

新西兰国土面积狭小，地理位置偏远，十分依赖国际贸易。因此，面对不断变化的培训和再培训形势，新西兰需要做好准备，以在全球经济中保持竞争力。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带来了重大影响，旅游、住宿、娱乐和酒店等行业规模缩小，而农业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也就是说，对初级行业技能培训及第一产业员工技能提升的需求有所增加。

在这种不断变化的环境下，行业要求现任员工接受再培训，以适应先进的生产流程，为产品增值。此外，行业还要求教育机构培养出有工作能力的员工，希望他们在上岗后能迅速给公司带来业务增长和盈利。个人则要求获得提升技能的机会，以满足相关行业对其的资历要求，从而保持就业。个人还要求能有机会获得行业所需的就业竞争力和证书。

因此，新西兰需要一种易于理解和掌握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体系。这一体系需要既能满足学生和用人单位的需求，又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做出灵活的改变。那么，我们来看看新西兰职业教育的改革情况。

疫情和保持全球竞争力的需要意味着，职业教育改革的目标是为所有新西兰人建立一个更可持续的TVET（技术、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这里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行业和用人单位。我们需要培养具备企业所需技能的毕业生，为用人单位和从业人员提供更多的支持，以提高培训质量。我们需要在技能、课程和资格认证方面加强全国的一致性，需要鼓励更多的用人单位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培训。第二个重点是学员。我们需要为学员提供更多的支持，给他们提供与工作相关度更高的培训，如果他们需要在不同地区或国际间流动，要为他们提供一条途径，使他们能够更容易地继续学习。

目前有六项关键改革建议。首先，成立新西兰中央技能与技术学院，以提高经营活动的效率。第二，成立劳动力发展委员会，对未来需要的技能提出建议。第三，设立区域技能领导小组，对每个区域所需的技能提出建议。同时，还需设立卓越职业技能中心，用于调查职业教育的趋势。此外，需要进一步提高对工作场所学习的支持力度。最后，还需要设立统一的资助体系及对毛利教育的认证体系。

新西兰国家资历框架的更名很关键，现在叫做新西兰国家资历与证书框架。后续还将建立微证书系统，该系统总体基于评估标准目录，这一目录提供了一个可以验证TVET资历和证书授予情况的框架，并且依然遵循传统的从1到10的等级评估方法。

此系统的一个主要变化是，行业中的用人单位成为了所有活动的焦点。劳动力发展委员会为劳动力战略提供建议，保障劳动力供应，并同意为行业和用人单位提供培训和服务。

未来，TVET将继续进行校园培训，也就是院校开展的培训。但与此同时，会越来越重视基于工作场所的培训。传统的证书和文凭，以及微证书等新式证书都会被用来认证培训。此外，人们会越来越重视工作场所学习的证书认证。

让我们来深入研究一下微证书。微证书和中国推出的“1+X”证书的侧重点非常相似，这两种证书都肯定了学习者在知识、技能和态度等几个重要方面上达到的某些具体标准。微证书或“1+X”证书对技能的认证，有助于扩展现有资历体系的深度，同时可以提高员工的专业水平。

微证书以成果和能力为基础，通常被称为以结果为本的教育。基本上，工作任务可以用该领域优秀员工通过重复执行某些操作所产生的业绩来描述。所有的成果都是对知识、技能和态度的直接反映，这些指标是从业人员和受训者为了顺利完成工作场所的任务所必须拥有的。

微证书的设计主要针对三个关键问题。第一，用人单位如何知道学员的学习积累和现有的工作能力？第二，学员需要具备哪些职业能力才能被录用？第三，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学员还应该掌握哪些能力？

微证书的开发有四个要点。一是要训练学生必须掌握特定学科的专业能力，例如，使用某种特殊机械的能力。第二是形成他们把在其他地方学到的知识进行转化的能力，例如数学知识或使用测量工具的技能。第三是为工作做准备的相关能力，如准时上班、遵守健康和安全规程。第四是为工作做准备的人际能力，如沟通与团队合作。上述每项能力都能用于开发微证书或“1+X”证书。

微证书的本质是价值。这些证书通过分享经验、建立关系，为国家的文化层面增添了价值。政府拥有能够提高国内生产总值的高技能劳动力。个人拥有更多就业和获得认可的机会。机构拥有更多成功的学员，从而促使机构的知名度进一步提高。行业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拥有更高质、更高量的生产能力。

但要使证书获得国际认可，我们必须参照国际标准。我们要保证培训的透明度，使职业技能培训与

国际框架下的学习成果相符；使学分认定、累积和转换程序与国际通用方法相符；提供明确的证书等级说明；还要确保资历和证书的认定与国际通用做法相符。

国际上，联合国制定了全球资历等级标准。该标准基于资历框架中用于等级描述的几个常见因素，根据界定资历水平、证书和能力的其他结构性因素而制定。通过使用这一全球标准，我们能让微证书变得更加国际化，也能以国际上其他资历认证体系为基准来规范新西兰的资历认证体系。我们要确保新西兰的体系符合国际标准，确保我们的毕业生具备全球竞争力，这是我们已经进行的一些初步工作。

以全球资历等级标准为指导，我们能将“1+X”证书和微证书的等级与新西兰国家资历框架和全球资历等级标准相对照，从基础学习和简单工作的能力，到具备完成较简单的任务的能力，再到可以胜任最复杂的任务和职责的能力。

让我们来看看微证书和中国—新西兰战略伙伴关系的情况。“新西兰职业教育示范项目”是新西兰与中国在职业教育合作伙伴关系协议中达成的一项承诺。该项目涉及中国教育部和新西兰教育部，希望通过研究和合作，提高TVET领域的实力。

此项目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学分累积和转换系统，我们需要辨别学员、中国和新西兰的TVET体系对培训分别有哪些需求。我们需要确定使学员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具体知识、技能和态度。我们需要保证我们授予的学分和证书是有效的，确保学员可以转换学分，并利用学分和证书来获得就业机会。

学分积累和转换系统的关键在于计算能够被用于授予证书的实际学分。今年正在进行的初步研究集中在参数模型和认知负荷的理论上。基本上，参数模型表明我们能够确定学员在阅读、写作和完成任务时所需时间的关键因素。由此，我们可以对认知负荷进行计算。如果我们知道学员从输入信息到感觉记忆所花费的时间，我们就能够计算出大脑需要花费多少时间来完成给定任务的工作记忆。然后，大脑将把一些成功的策略存储在长期记忆中，以备将来使用。这些活动的每一项都需要耗费时间，通过参数模型来确定各项活动所花费的时长。

让我们以构建电路为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进行五小时的课程，举办五个实践会。通过参数模型，我们可以了解到，产生影响的三个时间因素为学生预习、参与听讲和课后复习，而实践会的时间影响因素有两个。

在一项特定任务中，我们会让学员用30分钟观察电路的构建过程，然后要求他们花40分钟自己搭建电路。此外，我们还会让他们准备一场测试，准备时间大约是4个小时。总的来说，这项任务的总工作量是36.88小时。在新西兰，这一时长对应的是3.6个学分。

为了保证微证书的质量，我们需要确保评估的一致性。也就是说，资历评估标准要一致，并且资质可以快速对比，以确保一个国家不同地区的学员具备相同的资质。

数字化交付和评估平台的初步工作重点是认证站点，人们可以在站点进行技能提升，以确保他们能够持续地胜任他们要执行的任务。在这个站点中，每一个专业人员都能够学习一系列课程，使他们能够获得最新的信息，例如饲料作物的基础灌溉信息。让我们再详细一点。以灌溉的基本原理为例，学员必须要学习这些材料，通过这些材料来理解这一课题，随后，我们要求他们执行特定任务，通过评估来衡量学员的能力水平。我们能够通过学校给学员出的测试题来评估每位学员的能力，同时也能够通过对比每个学员的能力，来确保在这个职业领域中的表现有一致性。在课程的最后，每个人都能被授予一份可以用于今后职业发展的证书。在这个例子中，学员能获得四个学分。

我们还需要有一个弹性的评估方法来收集适当的能力评价标准，并且这种评估方法必须包括学员的知识、实际能力、表现以及对其未来表现的预估。这是学员从初学者到行业专家的转变。

我们最开始的分析评估和收集评估标准的工作围绕开发一套工作表和模板系统展开。这些工作表和模板可以确保评估的一致性，并确保我们能够收集适当的评估标准，以确保学生已经完成任务。每个模板的开头都有使用介绍。然后，我们为学员提供一份评分及报告单，以确保所有学员都能收到关于其表现的信息。

我们现在正在为课程开发者、教师和评估人员开发微证书。这将确保课程开发、考核评价、教学策略的一致性，并保证微证书在影响从业人员态度上的一致性。

科技驱动下的职业教育终身化

蒋悦炜
协进教育集团董事长
世界终身教育委员会（CMA）
亚洲区主席

今天我跟大家讲的是在科技驱动下职业教育终身化的这样一个话题，也分享一下我们这几年在做的一些工作。现在的教育经过数字化科技的来临下，教育已经发生了一些很大的变化，这些教育本身已经不是大学独有的一个特征。学术的垄断主义正在走向知识扩散的这样一条道路，那知识扩散，就原先的知识的主要传播者是由大学来形成的，那么慢慢地变成了二元结构，就是大学和政府。

再往后，现在是三螺旋的理论告诉我们，三元制大学、政府、企业所形成了这样一个共同的知识或者说知识的社会传播，形成了共同的社会形态。那么这样看来，企业今后成为了知识传播的一个重要的场所。科技时代所带来的这种变化，那么在原先数字科技不发达的情况下，企业传播知识的效率是非常慢的。大学因为集聚了一些社会的创新的精英，大学的知识再生产的能力非常强大。然后，就形成了知识的垄断主义。

那么，这些知识的垄断，就由大学来分配，以学位的方式来分配知识。然后，现在的数字科技情况下，因为大家获得知识的途径非常多，不光是从大学来获得知识，从互联网，从其他的路径，从工作当中获得的知识，甚至与人交流当中，获得的知识的增量非常大。那么就形成了这个三元结构，就是政府、大学以及研究机构，以及企业共同来传播知识。这就是数字科技下的知识创新的第一个变化。

第二个变化是我们在技术端，对人的学习方式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过去我们很多时候需要参加正式的学习，我们从K12再到大学，然后到企业里去工作。因为在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我们是很难在参加工作以后，再获得持续教育的这种可能，或者说我们为获得持续教育，会付出比较大的代价。所以才会掀起企业内部的一些培训，这些培训是根据人的技能的需求和岗位需求所提供的一些实用性的培训。

那现在，数字科技这么发达，包括在今后从5G或者说后面的互联网技术，或者说网络技术再提供的话，我们学习就变成了非常便利的一种条件。不再是一个高校的唯一的一个权利，那么高校今后怎么为人类提供教育服务呢？高校今后将会有比较多的场景，甚至说可能百分之七八十的教育，可能是在企业里，或者在工作场景里面实现教育功能。那么这个统称，我认为今后都是以职业岗位为导向的教育，而不是以专业的学科为导向。当然，高校里面还会保留很大的一批以学术基础，或者说我们叫基础学科的研究，或者知识创新的一批人。

他的教育是按照我们传统的非常严谨的知识体系架构来实现的，但是很大一部分的职业教育应该是在工作场景里面去实现，尤其是企业。那么今后这样一种知识传播的效率会非常高，就是通过数字科技的技术，及时地提供知识到企业，那反过来，企业也是。一个知识原创的地方，知识也是通过这个教学过程，跟学员的互动的过程当中快速地记录，然后反馈回高校进行知识修正和重新架构知识进行创造。

那么这样的话，知识的再创新和迭代的过程效率就会非常高。第二个，我们在培养的人才上面，在培养这个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上面不脱节。我们现在基本上，就能做到在岗位上进行教育。第三个，解决了人的终身学习的过程，因为人在一辈子学习的过程当中，不断会碰到新鲜的事物，不断地会碰到创新以及社会变化所带来的新的知识，在脑子里会形成很多知识的模块。在原先的教育中，虽然企业提供了一些培训，但是不能够提供知识架构。通过这样一个体系高校的体系化的教育来帮助企业里面的员工，企业提供知识架构，通过知识架构整理出知识体系它可以保持数十年。在企业当中，知识的不断更新和学习，形成有体系地去发展。这样保证了企业的创新能力。

最后一个，其实在学产研的教育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比较大的弊端就是我们没有打破高校和企业之间的围墙。我们的知识不是那么顺畅地从高校转移到企业，企业基础的应用场景的知识创新也不能快速地回到高校，不能够形成知识创新。那这样的话，学产研的效率被阻隔。因为企业里面没有足够多的人

才，或者说知识体系来吸收这样的知识创新到企业里面，通过这样一种职业教育的架构能够快速地把高校的原创知识输入到企业。企业通过运用这些新的知识来进行创新，然后形成企业的竞争力和个人的竞争力。

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三螺旋的学习理论，能够帮助企业或者说帮助职业化教育的终身化，也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帮助高校快速地产教融合或者学产研一体化。前面我讲的是，高校、政府、企业与个人的知识协同循环系统，我们把它定义成学习型区域，或者叫区域型学习理论。那么这一部分其实是会构成我们，因为技术所带来的变化构成了社会知识传播路径和方法的变化。

那第二部分，由此所产生的第二个环节，技术所带来的职业教育的变化在于我们真正地把企业办成了大学，把企业办成了大学，让每一位在企业当中的员工形成终身化的学习。那原先我们在企业当中办大学有很多的弊端，因为这里涉及到很多的学位的教育和应用场景的教育。在这当中，因为这是两个社会的主体，所以一直没有把它完全融合起来。

我们的学位不完全跟岗位匹配，我们的岗位所需要的人可能跟这个知识体系是不相容的。所以，在这当中我们一直存在着差距。那现在尤其数字科技的发达以后，我们把企业真正办成了大学，大学就要求一定的体系化。那么我们如何把企业的大学办成真正的终身学习的一个职业教育的大学平台？

我们原先在想的我们的教育体系，教育体系里面其实应该分成两大类。第一大类的是学术型、研究型的教育。那么有学术型的硕士、博士，还有（更高研究）博士后的研究。但是其实存在很大一部分是叫应用型教育，应用型教育我们定义为职业硕士、职业本科、职业博士。那么这些教育就是做应用型开发、应用型研究、应用型教育，是为解决企业实际问题来设置的课程和教学方法。

这样的一种教学方法在企业当中去根据实际的情况来设置学科教育手段可以通过线上线下，以及通过导师的指导的作用，内部的训练和外部的训练相结合，来实现教育知识内化的过程。本质上碰到另外一个问题，我怎么能够在工作当中、在企业当中怎么构建一个知识循环体系，这个知识循环体系有序地被记录下来，然后构成人的知识图谱和学习地图，构成在企业当中的岗位的能力匹配。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一种方法，就是因为数字化的这种技术所带来的一种变化，记录人的学习的

路径的变化。我们以前一般来记录人的学历水平，我们用的是文凭，本科、硕士、博士这样一种文凭来记录。但是现在因为文凭本身的构成，由无数个学分构成，学分所代表的是很多的课程和能力模块所构成的。

这部分的学分，在数字科技下面就可以再往下细分，叫颗粒化知识，就是我们细化到知识点上来学习，这样一种知识点上的学习以后，就会构成每一个人在岗位上所形成的背后的知识图谱，以及岗位所需要的知识能力的图谱，这当中构成的差距就构成了人的学习地图。

这样一个学习地图在他的工作当中，时时发生。然后，他的学习的驱动力是在于兴趣和岗位要求。这样的话，他的学习不是被填鸭式的，而是拉动他学习，他的学习的应用场景，他学的过程的应用可产生的效益立马可以获得体现。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知识颗粒化以后，容易以数据的方式被记录下来，因为很多的数据的颗粒就构成了知识颗粒。

这样的数据在记录下来以后，就变成了企业的一个知识库。这样一种知识库被萃取就构成了企业的一个知识体系，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跟大学进行互动，通过我们把学位教育、职业教育当中的学位部分，这些体系化的这个功能拆解，拆解以后分成了无数的知识图谱。

每个人、每个岗位、每个部门、每家公司，都会形成这个知识图谱，我们就容易找到他的学习路径。这就是我们说的未来的职业教育、场景化教育，就在企业里面，高校做知识原创，这就是我们讲的把企业当成学习型区域，把企业本身当成大学。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去创造，在企业当中去创造，不断去学习，再不断创造，这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就在企业里面。

那么企业里面通过知识库和知识的传播，跟社会、跟大学就形成了一种体外的知识的循环，构成了企业的外部的知识环境和能量的交换，构成了企业的原创的外部输入的能力，我们叫外部输入性的知识。那这两部分构成了企业的知识创新的主要方式。

那第三个，通过技术手段。就是说知识颗粒到知识的数据形成，我们其实完成了一个很好的方式，叫知识萃取。我们原先企业里最大的一部分资产其实是被我们忽略的。就是说除掉有形资产之外，有一部分是无形资产。无形资产的一部分是被提炼过的知识，这些知识可能是以专著、书本、课程形成的。

但还有一大部分是隐形的没被使用或者提取的隐形知识，它的构成是经验、文化和内行的默契的行规或者公司内部的一些无法表述的东西。这一块的知识其实是公司保持创新的很大的一个部分。所以企业在这上面没有工具，或者说没有意识到。

现在的数字科技以后，对这样一种隐性知识可以提供一些快速萃取。这些萃取了以后就变成了显性知识通过内部循环进行快速传播和创造价值。这部分对企业的知识的贡献会比较大，所以，这边的企业所形成的知识萃取和高校之间的知识原创形成了循环，构成了第三个知识循环体系。

在企业当中就保持了知识不断地创新，知识内部的循环，社会的循环，跟高校之间的知识原创的循环构成了企业大学，或者说企业的教育场景的持续的、终身化的教育的能力。这就是我前面介绍的就是科技驱动职业教育终身化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是科技驱动了职业教育的整体的社会化，这个社会化变成了我们已经以工作场景为主要的教育场所，不一定完全是在大学高校里面去实现的一个教育的过程。那这样的话，表现方式有很多，可能是以产业学院、行业学院或者企业大学构成的学习的主要体。

第二个部分是企业内部如何应用科技技术来实现他的内部的学习系统的完成。主要是通过内部的终身化的学习体系的构建，知识库的构建，然后通过与社会、与高校之间三者之间的互动，构成了企业的持续创新的知识体系，来为员工提供持续发展的动力，员工同时也创造了这样一个企业学习的环境。

第三个，通过对经验、技能以及知识的三者之间的共通，基于学分化，构成了一个人的知识的构成体系。那么，把他在这个学习当中原先很枯燥的在大学里面学习的过程变成了一种需要，变成了在工作场景当中应用场景带动他快乐学习的过程，让他能够学即用。

这就是我们前面介绍的三方面的变化，最核心的一个思想是今后会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学习即联通，联通即传播，传播即创造，知识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实现再创造。

在线教学与产学协作模式下的职业教育

Yosuke Kato
日本滋庆学园高等课程综合音乐科
规划与推广系主任

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如何通过公司合作与在线学习推动职业教育发展。今天我要讲的是公司合作与在线学习下的职业教育。

首先我想介绍一下滋庆学园。滋庆学园创立于1976年，在日本拥有78所下属学校。我们的任务是通过打造以实践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来服务社会。我们的学生毕业后可获得毕业文凭以及高级职业资格证书。滋庆学园是一个职业教育集团，与日本国内公司保持合作。滋庆学园下属的每一所学校、企业和机构都致力于提供产学协作的职业教育，让学生掌握对社会最有益的实用技能和知识。我们教授的内容覆盖十大领域以及五百种职业，包括医疗保健、创意艺术、表演艺术、生态学、生物技术等。目前，我们大约有32000名学生。

自成立以来，滋庆学园基于“实用教育”、“人文教育”和“国际教育”三大教育原则，根据社会发展需求量体裁衣。滋庆学园的教学实践将专业教育与就业指导相结合，并通过国际教育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语言技能，发展人力资源，从而使学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发挥积极作用。职业教育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入学前、就读中和毕业后。“学生的目标是什么？”是自我发现的过程。“学生为实现这个目标采取什么行动？”是自我转变的过程。“达到这个目标之后要做什么？”是自我实现的过程。在每个阶段，学生都会找到自己的目标，并努力学习自己所需的技能和知识。

其次，我想谈谈滋庆学园的国际网络。我们的触角覆盖全球，且制定了一套国际视野培养方案。这种积极的技能交流计划旨在培养学生的全球化意识。滋庆学园一直期待着我们的全球网络会让我们与众不同。

再次，我来讲一下滋庆学园的教育运作模式。学生们的兴趣在不断变化。我们需要抓住这些变化并创造教育机会，以满足他们的学习需求。因此，第一我们需要发现学生的兴趣所在。第二，我们的教育不仅要在学校，还要在公司进行，因为现实场景可以带来实践经验。第三，通过实际的工作，学生可以在工作中找到快乐、获得回报，并让学生思考："这是适合我的工作吗？"通过这样的方式，学生就可以判断这个职业是否真正适合自己。第四，我们要为学生匹配适合他们的职业。我们支持每个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学生常常担心自己的未来，担心自己未来的职业。老师们会对学生特别是毕业生给予支持和鼓励。滋庆学园还拥有终身支持系统，通过学校网络为学生提供就业机会。我们还结合就业信息，为每一位学生提供就业建议，利用与行业的合作网络，举办实践课程和模拟面试，帮助学生找到工作。学生在毕业后可以继续享受就业系统的支持。滋庆学园将一直帮助学生，助力他们在未来成为专业人士，并取得成功。

我们有着非常独特的教育方式，我们称之为公司合作模式。我们与各行各业的公司都保持紧密合作，这些行业也一直都在寻找新的人才。因此，学校和行业共同合作来提供实践教育。现在，我们开始寻求与中国公司的合作，希望能与他们成为合作伙伴。我们的教育合作公司超过了1300家，与每个行业的标杆公司都开展了合作项目。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与全球公司的合作数量会不断增加。

我们的学校与行业内的公司合作，为学生提供工作经验，例如舞蹈、演唱、演奏、作曲、表演、动画配音等等。这些活动可以写在学生的简历上，增加就业机会，例如进娱乐公司。学生有机会在拥有很好资源的著名电视节目上表演，比如上红白歌会，这是元旦期间在日本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

现在我们来看看在线学习系统的评估。滋庆学园做好了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准备。我们不会停止教育工作，会积极利用在线技术继续开展教育。第一，学生可以观看并积极参与课程内容；第二，提交报告和在线测试；第三，从专业人士那里得到反馈；第四，修正并提高自己的职业表现。

现在，我们每周日会开设K-POP在线舞蹈班。现在，K-POP在日本非常受欢迎。所以我们使用

Zoom视频会议软件让学生在线参与学习，效果非常好。学生也很享受这个过程。此外，我们还可以提供教育性短片供学生观看。我们从多机位拍摄视频，从而让学生可以从任何角度去观摩学习。

我们认为学生需要动力来提高自己的职业表现，使学生可以在就业市场中实现自我价值。现在滋庆学园就扮演这样的角色。我们需要通过与公司合作和使用在线技术为年轻人提供更多机会，并且整合专业技能以传授给下一代。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办学使命所在。

同时，滋庆学园也非常愿意招收国际留学生，并成为一所面向世界的学校。目前，来自34个国家42所学校的1000多名国际学生在滋庆学园学习日语和专业技能，寻求就业并成为职场新星。滋庆学园欢迎国际学生，并且会为他们在日本的生活和学习提供支持。

构建国家资历框架 助力中外职业教育合作

刘京辉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国家留学基金会管理委员会秘书长
（2008–2017）

一、世界其他国家制定资历框架的基本情况

进入 21 世纪以来，各国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为本国公民提供便捷的终身学习机会，促进就业和跨国流动，许多国家都开发建立教育与培训相互认证与衔接的资历框架。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于 2017 年联合发布的《全球区域和国家资历框架目录》显示，已有 154 个国家建立和实施了资历框架。全球建立 7 个区域资历参照框架，为 126 个国家提供了跨国资历和学分对接标准（CEDEFOP，2017a）。其中，在“一带一路”沿线 65 个国家中，有 58 个国家已建立资历框架。50% 以上国家加入区域跨国资历和学分互认体系。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马燕生先生于日前详细介绍了欧盟资历框架的情况。欧洲资格框架于 2008 年制定，2011 年在欧洲国家正式实施。目前已经有 39 个欧洲国家参照欧洲资格框架，从而实现一个国家内部地方资历框架和跨国资历及学分互认的机制（CEDEFOP，2018）。东盟也于 2014 年为其 10 国建立资历框架。近几年我国的专家学者纷纷介绍并研究上述一些主要国家的资历框架，比如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法国等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的资历框架，并为中国构建资历框架提供借鉴经验与方法。总体来看，各国在构建终身教育资历框架中，大多采用政府主导、各利益相关机构全面参与的模式。而资历框架建设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工程，包括资历框架立法、政府管理和相关利益机构参与机制，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学习的成果认证、政府专职部门的资历认证等。

二、以职业教育为例，中国构建资历框架的政策和实践基础及其难点

我认为，构建中国国家资历框架需要通过全方位的改革创新来实现，其中包括政策层面、法律层面、人事制度以及改变传统观念等诸多方面。

1、从政策层面，我国在资历框架政策准备上，近年来影响最大、表述最为具体的政策文件有两个，分别是 2010 年先后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 2020 年）》（以下简称“纲要”）以及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其中《纲要》提出“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纵向衔接、横向沟通”。2016 年 7 月，在教育部出台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加快推进中国教育资历框架开发”。由此可见，我国已把国家资历框架建设纳入教育发展战略目标，并希望国家资历框架在我国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中能发挥重要作用。

关于职业教育，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提出，要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教育体系。在 2019 年颁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职教 20 条”）文件中第一次强调职业教育是一种类型教育并强调产教融合和普职衔接，提出实施“学历证书 + 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1+X 证书）制度”，“学分银行”等。我认为“职教 20 条”提出的上述政策措施将为构建国家资格框架奠定良好的基础。

2、从实践层面，中国教育部已将“1+X 证书试点工作与学分银行建设和国家资历框架建设结合起来，有序开展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所体现的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和转换”作为其工作重点之一。据了解，截至目前，“1+X 证书”已经遴选出 73 家培训评价组织并颁布 92 个证书。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多年来开展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为广大一线劳动者通过职业培训从而达到职业晋升提供了有效途径。

3、构建中国国家资历框架，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对于职业教育而言，我认为有以下难点需要解决，一是职业教育吸引力问题。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农村和偏远地区，上普通高中以及考上综合性大学仍然是他们的首选，甚至是唯一选择。二是从体制机制上真正解决职业教育的校企融合问题，特别是明确企业在教育的地位与责任。三是通道问题。建设国家资历框架可以清晰地展现接受不同层级教育学习者的发展水平，这不仅在形式上实现不同类型和层级教育的联通，而且在内容上也让不同类型和

层级教育所需的知识、能力以及素质得以衔接。目前，我国教育系统内部不同资历、学历和职业资格的连贯性和交融性都不是很强。

三、构建中国国家资历框架，助力中外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

2020 年 9 月 5 日，在北京举行的 2020 国际教育服务贸易论坛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中国已与 188 个国家和地区、46 个重要国际组织建立了教育合作与交流关系，与 54 个国家签署了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中国致力于提高双向留学质量。近几年，中外在职业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越来越频繁。每年都有不少国际学生来华并在职业院校学习进修以及接受短期培训。也有不少中国学生在国外接受职业和专业培训并就业。据了解，有几十名中国学生在德国接受技工教育与培训，并通过德国的严格考试、获取德国行业协会认可的职业资格证书，现已在德国大中企业工作。另外，中国的一些行业和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当地行业与企业合作开发项目，需要聘用大批通过正规职业学历教育和非学历职业培训的技术人才和员工。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人才中心副主任宋凯介绍，他们在“一带一路”国家的矿业项目，就聘用了近 50 万的本地员工。这些员工都必须接受相应的职业培训。另外，中国的一些高职院校与国外的教育机构合作在合作国当地开办职业院校。

综上所述，教育和培训是我国与各国以及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要合作选项。我们不仅要与国外签署高等教育的学历学位互认协议，也应该建立职业教育领域的互认标准，而建立国家资历框架正是可提供的标准对接平台。

我国建立国家资历框架，不仅要考虑与现有地方资历框架对接和中国特征，还应考虑与国际上的资历框架对接。这有助于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教育和培训的合作，实现教育和培训资历和学分的互认和转换。国家资历框架中的各项资历指标和标准，不仅可以对境内发生的教育行为进行质量审查，同时还能对境外教育行为输入进行质量监控，从而使教育行为具有更大的透明度。东盟资历参照框架的实施，把“一带一路”沿线的东盟 10 国的资历框架对接起来，并与欧洲资格框架进行对接，为全球教育的深化合作打下了基础。

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学习各国在教育领域的先进理念与做法，在构建国家资历框架中借鉴国外的经验。在后疫情时代，我们应该更加深化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应该搭建更多平台，建立国家资历框架，加强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和其资格认定，继续促进留学人员的国际流动。努力形成中外职业教育“共商、共建、共享”的有利格局。

欧洲资格框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马燕生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中国驻法国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
（2013–2017）

我本人曾经担任中国驻欧盟使团首任教育文化参赞和中国驻法国使馆公使衔教育参赞，在欧盟和法国都有任职的经历，因此我想借今天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欧洲资格框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这样一个话题。

我今天的演讲分两个部分，首先，我简要向大家介绍一下欧洲资格框架，什么是欧洲资格框架？它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它有哪些辅助的实施工具以及它的积极意义。然后我再和大家谈一谈欧洲资格框架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以及今后我们努力的方向。

那么我们先从第一部分开始。

首先介绍一下欧洲资格框架产生的背景，那么在本世纪伊始也就是 2000 年，欧盟通过了《里斯本战略》，提出要把欧洲建成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和活力的知识经济体”，确认了教育和培训在新世纪欧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欧盟认为，教育和培训系统兼有社会和经济职责，应与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要求相适应，并能应对经济全球化给欧盟带来的社会、经济挑战。

在 2002 年，欧盟《哥本哈根宣言》确定了发展职业教育的四大优先领域：一是大力发展具有欧洲特色的职业教育和培训，

使其成为世界职业教育的参照体系；二是提高职业教育的透明度，加强信息交流和职业指导，支持欧洲人的跨国流动；三是开展能力和资格认证，制定参照水准，建立职业教育和培训学分制；四是加强职业教育的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促进各国在质量标准方面的经验交流。

从 2006 年起，欧盟委员会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计划，并与欧洲终身学习资格框架衔接。在国家层面上，欧盟要求各成员国继续加大公共财政和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建立开放的职业教育体系，提高职业教育的针对性和质量。在欧洲层面，积极落实《哥本哈根宣言》中确定的目标，建立开放和灵活的欧洲职业资格制度，实施欧洲职业教育学分转换制度，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把欧洲职业教育体系建成世界职业教育质量参照体系，这个雄心还是非常大的。

第二，我介绍一下欧洲资格框架的主要内容。2008 年 4 月，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正式批准了建立“欧洲资格框架”英文叫 Europe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其实它的全称应该是欧洲终身学习资格框架，只不过大家约定俗成，把它简称为欧洲资格框架，建立这样一个框架的目的是，在欧洲范围内建立一个共同的资格框架互认参考标准，在尊重欧盟各成员国资格体系多样性的基础上提高资格体系之间的透明度、兼容性和可比性。欧盟鼓励各国自愿采用欧洲资格框架体系，也就是 EQF 代表欧洲资格框架体系，重视对正规、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成果的认证，也鼓励各国设置并颁发各教育阶段的资格证书，以鼓励公民终身学习和跨国流动。

欧洲资格框架最重要的核心，也是它的创新，其实就是以“学习结果”为衡量基准的 8 级等级的资格描述。每一个资格等级都以知识、技能、能力三个要素来描述，其中知识分为理论性知识和事实性知识；技能分为认知性技能和操作技能；能力分为责任性和自主性。实际上这 8 个等级中，等级一、等级二对应的是初等教育。等级三对应的是初中教育。等级四对应的是高中教育。等级五对应的是大专。等级六、等级七、等级八分别对应的是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每一个资格等级都是以知识、技能和能力三个要素来描述。

第三个方面，就是欧洲资格框架实施保障措施。欧盟推动建立了共同的质量保障体系。第一，欧洲职业教育质量和保障网络。这里就包括了资格以学分的互认有赖于各国对彼此职业教育质量的相互信任。资格与学分透明的前提必然是教育与培训质量的透明。为了保障各国职业教育的质量水准，提高透明度，

2005 年 10 月欧盟开始推行建立“欧洲职业教育质量保障网络”。它旨在促进各个成员国在自愿基础上，建立持续性的质量保障合作机制，在欧洲层面建立一个信息交流平台，供成员国之间相互学习借鉴，以便建立相互信任。

第二，就是各成员国多元化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迫切需要一套框架，设立共同的参照指标。这样就催生了欧洲质量保障参照框架，它是作为一项工具，帮助成员国支持并监控其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的发展，保持各国制定的职业教育政策的连续性，并增加它的透明度。各国可以根据该框架内设定的共同目标和专项指标来改进本国职业教育的质量和管理。

第三，欧盟推出了共同的实施辅助工具，这里面简单地说就是 EUROPASS 和 ECVET。所谓 EUROPASS 就是欧洲通行证。欧洲通行证 EUROPASS 是五合一的教育与职业培训档案及履历格式，它的实施有利于提高欧洲各国资格和文凭的相互承认，增强整个欧洲地区的教育竞争力，可以作为欧洲公民向雇用单位呈现本人能力与资格的通用范例，这里面包括：欧洲通行简历 EUROPASS CV、语言能力档案 EUROPASS LANGUAGE PORTFOLIO、欧洲流动文件 EUROPASS MOBILITY、证书补述说明 EUROPASS CERTIFICATE SUPPLEMENT 和文凭补述说明 EUROPASS DIPLOMA SUPPLEMENT 等等。这是五个要素。

第四，就是欧盟推出了职业教育学分转换制度，European Credit System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简称“欧洲职教学分制”，英文缩写叫 ECVET。在借鉴高等教育欧洲学分转换制和积累制度，这是非常有名的 ECTS 系统的基础上，欧盟建立了一套欧洲通用的职业技术的标准，各项学习成果被赋予不同的 ECVET 学分，使不同制度下的学习成果更加容易比较与采用，以便帮助欧洲公民更加方便地完成跨国培训，使其在国外通过教育和培训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得到各成员国的正式承认。这对于欧洲公民个人而言，EUROPASS 和 ECVET 作为其教育和培训档案，也是它现终身学习目标的重要工具。

目前，欧洲各国国家资格框架基本上已经进入实施阶段，并对各国教育、培训和就业政策及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截至 2015 年 2 月，已经有 34 个欧洲国家正在建立涵盖各级各类资格的综合性国家资格框架；32 个国家已经提出建立或采用 8 级资格框架；24 个国家已经实现了国家资格和欧洲资格之间

的顺利衔接，也可以叫顺利对接；18 个国家正在全面实施国家资格框架。其中，42 个国家资格框架包括综合性的或者非综合性的已经被建立；29 个国家资格框架已经被正式采用。欧洲资格框架的实施对教育机构改革、非正规教育发展、劳动力技能匹配都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其中为各级各类资格的比对和互认提供了平台，因此非正规教育和私立办学机构所授予的资格可以与其他正规教育和培训系统所授予的资格实现等值互认。这就为参与非正规学习的学习者提供了更多的转学和升学机会，从而增强了人们接受非正规教育和培训的意愿。同时还为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交流、衔接搭建了平台也为用人单位和教育机构提供了专门的交流平台，特别有利于相互的信息沟通，相互之间开展合作。

如果举一个国别例子的话，我们可以看一看法国国家资格框架和欧洲资格框架之间的对接情况。以法国为例，法国的国家资格框架增加了与欧洲资格框架第 1 和第 2 相对应的等级。因为法国 1969 年时确立的法国培训资格是 5 级，现在变成了 8 级。同时，其等级描述充分体现以学习成果为导向的这种理念，能够衡量劳动者 3 个维度的水平：一是劳动者的专业理论知识水平；二是劳动者的实践技能水平；三是劳动者的责任感和自主性。

法国 1969 年的时候实行的培训水平分级以及法国改革以后按照欧盟的标准制定的法国国家资格框架以及它所对应的欧洲资格框架。其实像法国这种情况在欧洲并不少见。据我了解很多国家都已经实现了本国的国家资格框架。不管是几级，大部分是 8 级，和欧盟的 8 级资格框架进行了完美地对接。国家资格框架根据等级描述中的各项指标对证书进行分级，所有被纳入国家职业证书目录的证书均需分级。这有利于打破不同证书之间的壁垒、促进证书之间等值与融通。

刚才我们对欧洲资格框架整体情况做了介绍，现在我来谈谈欧洲资格框架对中国的启示，我认为欧洲资格框架对我们中国有三方面的启示。第一，欧洲资格框架提出了尊重各种学习形式的“新理念”。

欧洲资格框架的基本理念是承认和科学评价各种学习形式的价值，它改变了传统上以学习投入评价资格的做法，而实行以学习成果为参照基准的全新体系，是教育和培训体系适应知识经济社会的重大创新，也是首创。它不以学习的时限和形式为唯一标准，而注重学习的具体成果，实际知识和能力水平。学习成果概念颠覆了对于学习形式的狭隘认识，认可“非主流”学习路径。无论是正规教育，还是非正规教育比如培训、进修等，还是非正式教育，比如说自学、社会实践等，只要达到了相同的成果，就可

以对应相同的资格等级。学历资格和职业资格并重，正规学习和非正规学习并重，它是一次思想观念的解放，有助于树立全社会尊重学习的良好氛围，并且激发了大众参与终身学习的热情。

第二，是欧洲资格框架构建了终身学习和跨国流动的“新通道”。欧洲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丰富多样且千差万别的教育和培训体系，无论是国家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还是普通教育、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均互相分隔，无法衔接。而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欧盟一体化的推进，促进公民终身学习和自由流动是欧盟 21 世纪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是实现欧盟教育与培训发展的整体战略目标。

由此看来，提高资格的透明度和可比性是实现欧盟教育与培训发展整体战略目标的必要前提和重要环节。通过欧洲资格框架的建立，不同国家、行业、教育体系、学习路径的资格体系变得更加透明并且可以互相转换，从而实现对接，扫清障碍，最终能够帮助学习者和劳动者在这些相异的国家、行业、教育体系和学习路径之间自由流动。

第三个启示就是欧洲资格框架开辟了教育体系和就业市场紧密衔接的“新思路”。欧洲资格框架以知识、技能和能力为三大支柱，并且对每一层级的资格水平进行了三个维度的具体描述。它向全社会，包括教育体系和就业市场，清晰地传达了一系列重要信息，即未来的欧洲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每个欧洲公民要在知识经济中获得成功必须掌握哪些知识、技能和能力？欧洲教育与培训体系应该如何调整人才培养方向？我想在这些方面，欧洲资格框架都发挥着“灯塔”的作用，引导就业市场的需求与教育培训体系的供给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同时，构建一套系统规范的资格框架，也为欧洲就业市场一体化扫清了障碍，使劳动者的跨国流动更为便利，对于促进人才就业和提高就业水平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现在我们就一起看一看中国的情况。2019 年 1 月，国务院颁发《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方案中指出应“推进资历框架建设，探索实现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互相衔接，在有条件的地区和高校探索、实施试点工作，制定符合国情的国家资历框架”。我在这解释一下，资历框架和资格框架是一个意思，英文都是 QUALIFICATION FRAMEWORK，所以大家不必在字眼上纠结，是一个意思。

2019 年 2 月，《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这份文件明确提出了“建立全民终身学习的制度环境，建立国家资历框架”，一些地区已经开始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

我认为，中国可以在构建我们自己的资格框架的历程中，学习借鉴欧洲的有益经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进一步努力。

一是加快建立国家资格框架体系。我想我们可以先尝试建立层次结构清晰的职业教育资格框架体系，纵向搭建完善的职业教育层级结构，横向实现职业教育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的等值互认。职业院校毕业生获得文凭证书的同时相当于获得等值的职业资格证书，可以直接进入劳动市场就业，也可以继续学习获得高一级的学历文凭或者资格证书。相应地，企业员工包括社会人员在需要时可以重返职业院校，通过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继续获得高一级学历文凭或资格证书。

二是建立与国家资格框架相配套的辅助工具。也就是说建立并完善学分制，即学分的累计、认定和转换制度。通过学分转换，打通非学历教育与学历教育、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之间的壁垒，促进学习者在不同的教育机构之间有序流动。其次，建立先前学习鉴定认证制度，明确先前学习认定的适用范围、标准和原则。对不同年龄段的学习者通过非正规和非正式途径获得的知识、技能和能力进行认定，为他们提供进一步学习的机会，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潜力。

与此同时，我想还需要提高对国内或国际上非正规、非正式途径获的知识、技能和能力的认证。这一点我觉得，目前来说是非常欠缺的，但是是非常必要的。根据 2018 年教育部公布的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情况相关数据统计显示，2018 年度我国出国人员总数为 66.21 万人，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留学输出国。但是绝大部分学生出国学习都是读本科、硕士或博士，很少有学生是主动出国学习“技能”。原因很简单，即使学生真地想在国外学习“技能”得到资格证书，国内目前也无法对其资格证书进行认证，企业对资格证书的含金量也存在着各种的质疑。我给大家举个例子，2018 年 1 月发布的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评估办法》中第 7 条就表示，暂不提供认证国（境）外各类职业（执业）资格证书。因此我想我们不仅需要考虑国内的学分积累、认定和转换，还要考虑后续不同年龄阶段的学习者通过非正规或非正式途径获得国内、国际上的知识、技能和能力的认定。

第三是建立跨部门的沟通协调和联动机制。国家资格框架的利益攸关者包括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教育机构、企业、行业组织甚至就是个人，每一个学习者，所有这些利益攸关者都是影响资格框架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要建立综合性的国家资格框架，构建一个可以对各级各类资格证书进行比对、评价、认

证的国家平台，就必须建立有利于各个利益攸关方进行沟通的机制，搭建能够使各方充分表达意见和建议的“平台”，我想这样才能获得各方的支持，确保资格框架的顺利运行和实施。因此，我觉得可以考虑设立一个综合性的国家资格管理机构，统筹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其它有关部委，构建一个有效的政策协调机制，进而在管理机构的主导下，建立利益攸关方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合作与监督保障机制，清晰界定各利益攸关方的权责关系，以促进各方积极有效地参与。

志合越山海——
职业教育合作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人才保障

宋凯

有色金属工业人才中心副主任
全国有色金属职业教育教学
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6年多来，中国依托有关国家的双多边机制和区域合作平台，大力构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取得了积极进展。

我本人负责有色金属工业行业的人才工作，对“一带一路”人才需求有切身的体会。中国的有色金属工业是中国最早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始全面合作的行业，在亚洲、非洲，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建设了大批的矿业项目，产品涉及40多个有色金属品种，聘用了合作国本土员工近50万人，开展了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的国际合作。我们协助印尼建立了冶金工业，为印尼发展汽车工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协助哈萨克斯坦建立了完善的有色金属工业，为哈萨克斯坦全面工业化提供了持久的动力。

但是在合作中我们也感到很多合作国的年轻人就业能力还不强，职业教育和培训还不能满足企业的需要，企业很难找到大批的合适的技术雇员，很多时候不得不花高昂的代价从中国聘请雇员，对企业造成了很大的负担，也影响合作项目带动本土就业的能力。随着国际化合作的不断加强，“一带一路”倡议的朋友圈越来越壮大，成果越来越丰硕，“一带一路”倡议也正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变为现实，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走向深耕

细作的“工笔画”新阶段。在当下的后疫情时期，很多商业模式、合作模式发生了改变，技术技能人才已经成为深化“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供给侧需求，因此开展多边合作，培养高质量专业技术技能人才是深化“一带一路”建设的迫切需要和重要保障。

新世纪以来，中国已建立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每年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有一千多万人，具备了大规模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能力。在促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各沿线国家可以展开合作，充分利用中国职业教育的庞大产能，以能力和实用技术传授为依托，以服务当地经济发展、促进就业为导向，开展对“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国本土员工、社区居民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致力于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人才供给。那么主要的合作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是在合作国开展多元合作办学。合作办学是服务人文交流、拓宽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开展政府主导型的合作办学。由政府有关的部门牵头制订相关计划与政策，通过达成援助与其他国家的职业教育机构或项目，从而实现高等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合作；开展产教协同合作办学。以在合作过程中投资生产企业为核心主体，推进职业院校与企业利益、制度、文化、技术、资源、人员等融合，以校企合作办学方式加强“一带一路”人才培养。

2015年有色金属行业受教育部委托，以中国有色矿业集团为首个试点企业，组织国内13所试点院校在赞比亚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开展了校企协同国际化办学，通过面向企业本土员工和社区居民开展培训，有效促进了当地青年就业，为企业和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沿线国家高职院校可与一个或多个院校，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方面进行合作，通过共同的投入和努力达到人才培养的目标。

第二是加强本土教师的合作培养。随着国际产能合作的加速，很多“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国教师实践的教学能力不能满足产业迅速发展的需求，因此需要培养“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化人才。为了培养人才，首先就要拥有一支具有系统化理论知识、实践化技能知识以及国际化教育理念的合作国本土师资队伍，可以发挥中国职业教育的作用，利用来华留学资金和企业培训资金等支持合作国本土教师到中国来学习培训，打造高素质本土师资队伍。

第三是联合制定职业教育发展规划。“一带一路”是各方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大平台，“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发展共同体的全球倡议，同时也对接着沿

线多个国家的发展规划，包括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东盟提出的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光明之路”、巴基斯坦提出的“2025愿景”、土耳其提出的“中间走廊”、蒙古提出的“发展之路”、越南提出的“两廊一圈”等。这些“一带一路”倡议同沿线国家发展规划的衔接促使在人才培养规划方面也需要密切对接。因此为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和各国发展战略，需要一带一路沿线多边国家共同制定职业教育领域内的发展规划，共同培养区域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高质量职业技术技能人才。

第四是共同实施职业教育的“三教”改革。“三教改革”是指教师、教材、教法的改革，其中教师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教材是基础，教法是途径，它形成了职业教育发展的“闭环式”整体，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内容。在“一带一路”人才培养中，构建国际化的教学标准、加强国际化教学资源建设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抓手。这就需要围绕产能合作国的经济发展和中资企业海外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联合开发相关专业标准，建立多语种的教学资源库、专业语料库，加强各国职业教育标准的融会贯通，从而构建国际化专业的教学标准体系。

第五是创办“一带一路”国家技能竞赛。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企业产能合作国积极开展技能竞赛，为各国学生的专业技能交流搭建合作平台。通过以赛促教的方式将学校、企业、行业、政府联系起来，探索如何将更多的国际理念、国际元素、国际标准、竞赛规程等融入到专业教学中，逐步推动教学标准建设与同类型的国际大赛接轨。通过技能竞赛、教育培训、技能推广、职业发展与国际合作等形式，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质量的技能人才。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能量不断释放，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正在酝酿新的变革，“一带一路”建设将沿线各国的命运紧紧的连接在一起，形成了命运共同体。人才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需要各个国家共同努力，积极开展人才培养交流与合作，共同提升教育理念、完善专业技能，更好的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人才保障。

志合越山海，携手共奋进！愿我们搭建起中国职业教育与世界合作交流的实体桥梁，共同促进“一带一路”长远发展。

关于促进技术及职业培训教师持续专业化发展的概念框架

Yok Sothy
柬埔寨国家培训学院主任

首先，柬埔寨国家技术培训学院提供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也为这一领域培养未来的技术培训教师。

自 2000 年起，参加我院培训课程的教师有超过 3000 位被政府聘任。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同各位分享有关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教师可持续职业发展框架的一些想法与经验。在座的各位可能都会明白人永远不会停下学习的脚步，学习的过程会持续到生命最后一刻，它不会随着我们从学校毕业就停止，不论是对学习者还是教师都是如此。我们要时刻都在学习，并根据当前自身环境的发展随时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

作为教育培训机构，我们一直都确保我们的毕业生能够适应未来世界，为从事专门职业做好准备。为此，我们也要确保我们的教师能够帮助学生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并给学生带来改变。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教师们要寻求专业上的发展，这既可以为学生带来更好的学习效果，也可以提升教师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满足感。

柬埔寨国家技术培训学院确保教师在上岗培训前的几年就具备合格的培训技能。并且我们是在国家劳动与职业培训部门监督下规划教师培训框架的公共机构。

我谈一谈框架中的一个要素，也就是一个有知识的人如何能够成为教师培训教育者以及未来的职业发展规划是什么。申请我们学院需要持有任意技术专业高级文凭，最高到博士文凭，并且需具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被成功录取的学员将接受为期一年半的职前培训，课程内容包括教学实习。学员在毕业并获得技术培训或职业培训教师证书之前将进行能力与绩效评估。

这是第一阶段，他们需要先实习一年时间，然后可以成为政府聘用的技术培训或职业培训教师。在经过两年时间的适当绩效评估之后，可以成为初级教师。在这个阶段，他们可以选择一直从事教师工作，也可以转而从事教师培训工作或成为职业教育领域的行政人员。从事教师培训需要三年教学经验，接受一年培训并且拥有硕士以上文凭。成为职业教育行政人员，需要五年以上工作经验和一年培训管理经验。

接下来我想谈一谈我们这一框架的概念，我想讲一下教师培训教育者在整个职业中要经历的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他们要学习知识和基本教学技能，这通常在职前培训中进行，使教师具备培训资质。第二阶段，他们需要参与实践活动以获得实践经验，在工作中继续学习，在教学中完善技能，增加知识。

第三阶段，教师培训教育者通过多年的经验与研究达到更高水平。第四阶段当其他教师遇到问题，需要建议的时候他们可以提供参照标准，成为专家。除了上述阶段，我们还需考虑框架中的其他几个部分，包括教师培训人员的工作实践和道德规范。

第一，能够证明对学科的熟练程度，对科目资源、参考资料、相关理论、科目适用性、学习评估以及学科内研究课题都要熟悉。第二，具备自主课题研究能力，他们可以分享最佳的教学实践与专业协会网络或加入能够提高教学质量，改善教育价值观的机构。第三，能够理解自己的职业需求，能够在短期和长期计划中找到学习重点和职业目标，并且能够及时了解当前教学和学习发展的最新情况。第四，能够运用各种工具对教师进行观察和评估，支持教师的学习并帮助教师选择教学科目。第五，能够将教学技能运用到实践中，制定并管理课程计划， 管理班级，并将教师的学习表现与教学表现联系起来。第六，能够创造性地使用学习工具，熟悉学习资源使用和开发的理论与实践，对教师的学习做出指导。第七，能够推行和选择最适合教师培训的学习活动，例如头脑风暴，小组讨论等学习方法。第八，能够利用各种与成人学习、教师教育和成人学习理论相关的资源、机会、和在线平台。第九，了解当前国家、地区、地方的教育政策、改革和立法以及机构政策和实践与课堂实践的相关性。

接下来这一部分是关于创建教师培训最佳实践环境的推动因素，例如：

- 开放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能够接受学生对问题态度和看法的转变，并能够审视这种情况和看法，然后做出应对。
- 互动性：与学员交流看法一同参与活动并创造互动机会。
- 共情力：创造积极的学习环境培养学员和教师之间的信任。
- 责任心：对专业教学行为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判断力。
- 抗压能力：在教学和学习过程中克服挑战或以建设性的方式，应对批评和冲突。

最后一个部分是能够提升能力的一些有效技能：

- 团队协作能力，包括与来自不同背景的学员开展合作活动或项目。
- 批判性思维能力，包括在教学过程中做出正确的教学选择和其他决策。
- 领导与监督能力，这有助于教师为学员设定目标，鼓励自我反思，全面提升技术培训教师的能力。
- 有效的组织能力，包括自主制定观察时间表开展细致的培训并记录教学表现。
- 激励能力，通过关注学员的优势找到影响学员进步的阻力，支持和鼓励遇到困难的学员。
- 有效的沟通技巧，找到使决策过程、教学选择、学习成果与理论和课堂实践相关联的方法。

我之前所展示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教师可持续职业发展框架的内容值得我们思考。基于我的个人经验，我向大家强烈推荐这一理念，希望大家关注这些在职业教育培训教师管理过程中最值得注意的问题。

国家技能形成体制与多边技能合作

杨钋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系主任，副教授

今年教育与文化论坛的主题之一是关注多边合作的桥梁，关注各国职业教育如何实现有效对接，以及中国职业教育如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实现合作。今天我利用这个机会结合对国家技能形成体制内涵和发展的一些讨论，谈一谈我对中国参与“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多边合作的三点看法。

第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技能形成的多边合作同时需要技术和制度条件的支持。我们应该充分认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技能形成体制方面的差异和由此带来的合作挑战，因地制宜地制定技能合作战略。

2019 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要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职业教育合作。为实现职业人才的跨境流动和职业教育的跨国合作，既需要技术条件的支持，又需要制度条件的支持。在这里技术条件是指建立包括国家职业资格框架在内的职业教育标准，这些标准使得具体的合作有章可循。而制度条件是指国家技能形成体制及其配套性的制度安排，它可以加速或者阻碍合作的出现。

国家技能形成体制是指一国在技能形成方面的一整套制度，它涉及培训风险承担、技能标准化和认证、职业学位体系的分层

和差异化、培训主体角色安排，以及与其他社会经济制度关联方面的问题。已有的研究对先进工业化国家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研究发现，各个国家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深嵌入到包括集体工资谈判、公司治理和财务、劳动力市场和国家福利政策，以及劳资关系在内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网络之中。

正是由于各个国家在这些方面的制度安排不同，因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国家技能形成体制。当前，全球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技能形成体制大体可以分为四类：一是以德国为代表的集体主义技能形成体制，它的特点是国家和企业卷入职业教育的程度都比较高，强调国家干预和市场自治的均衡；二是以北欧国家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技能形成体制，由国家直接投资和主导技能培训，企业的角色被边缘化，技能发展成为国家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三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技能形成体制，国家和企业的参与程度都比较低；第四是以日本为代表的分割主义技能形成体制，企业的参与程度高，而国家干预程度低。

除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差异，国家之间技能形成体制的差异也会构成跨国技能合作的制度距离，影响多边合作的可能性。以往对于德国跨国公司双元学徒制培训模式向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日本和巴西等国家迁移的分析表明，由于东道国制度环境和母国的差异，双元学徒制很难“原汁原味”的在东道国展开。

古语有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关注多边合作的桥梁，不仅需要了解其他国家的技术条件，同时也需要了解这些国家的制度条件，以便于我国制定和实施相应的职业教育培训“走出去”战略。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技能形成领域技术和制度条件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克服制度距离、促进有效的跨境技能合作。

第二，理解我国的国家技能形成体制有助于更好地提炼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经验，提升中国职业教育与其他国家发展的相关性，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力资源的开发。建国以来，我们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过渡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此期间，我国也从具有集体主义特征的技能形成体制过渡到具有国家主义特征的技能形成体制。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国家企业和政府参与技能形成的程度都很高，国家以公共财政承担全部的培训成本。当时普遍采用了企业师徒制和中等专业教育相结合的技能供给方式，以发展企业和行业专用技能为主，同时也限制了劳动力在不同企业和不同教育体系之间

的流动，因而具备了集体主义技能形成体制的一些特征。这种以企业为主的技能养成体系与统一的工资制度、计划性用工制度和单位福利制度一样，是当时“单位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国家行政性协调实现技能供求的均衡。

进入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我国逐步偏向国家主义技能形成体制。此时企业内部的技能养成方式逐步被政府主导的外部技能养成方式所取代。国有企业的改制使得企业卷入技能职业教育的程度降低，此时职业教育以培养通适性技能为主，劳动力在不同企业和不同教育体系间的流动性增加。与职业教育培训体系配套的是市场化的企业治理机制和社会保护制度。

国家技能形成体制是我国职业教育取得今日成就的重要基础，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对该体制进行了比较大幅度的调整。我国职业教育改革政策先后涉及到职业教育和培训的风险承担机制、技能标准化和认证、职业学位系统的分层以及职业教育和培训主体角色安排。实际上，我国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向着集体主义技能形成体制的方向发展，现在强调职业教育从政府主导转向多元参与，鼓励社会资本和企业办学、深度参与产教融合。

我国的职业教育是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是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转型的产物，其成就和问题均与我们的国家技能形成体制相关。因此，对我国国家技能形成体制的分析，可以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好地理解如何通过技能形成体制的调整来满足加速工业化和城镇化时期的产业技能需求，从而实现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跃迁。

第三，借鉴我国宏观技能形成体制下的区域创新经验，可以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地方创新建立富有活力的跨境职业教育实验区。产业发展滞后或者缺乏强有力的行业组织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也是制约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和跨国企业技能投资的主要挑战之一。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同样也没有培育出强有力的行业组织来协调和沟通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这一点在职业教育中尤为明显。这种协调机制在我国通过地方政府职能的变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补偿。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认可、激励、协调和参与的方式介入本地区的校企技能合作，形成对地方技能合作的产权保护。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缺乏强有力的行业组织来协调企业、政府和职业教育机构关系的难题。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和改革的经验表明，宏观层面国家技能形成体制内部的张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地方政府创新来解决。

众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采用了与我国迥异的国家技能形成体制和职业教育标准，解决上述国家间的制度和技术条件差异需要很长的时间。为了加速多边技能合作，可以考虑将我国在地方实践中发展出来的多种多样的政校企合作模式率先推广出去，尝试在东道国的区域层面建立起由地方政府协调的技能投资模式，形成富有吸引力的跨境职业教育的实验区。

今天，结合教育与文化分论坛的主题，我与大家分享了三个主要观点。第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的多边合作同时需要技术和制度条件的支持。对各国技能形成领域的技术和制度条件的理解，有助于克服制度距离、促进有效的跨境技能合作。第二、理解我国技能形成体制的特征与其变化有助于更好地提炼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经验，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力资源开发。第三、借鉴我国宏观技能形成体制下的区域创新经验，可以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地方创新，建立富有活力的跨境职业教育实验区。

技能评价技术及其对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启发

赵志群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

（2009–2018）

在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职教 20 条》）中提出要建立“1+X 技能等级证书”这项工作。这对中国现在或者未来职业教育发展产生非常重要影响同时也是进行系统化体制建设工作。“1+X 证书”制度建设有所期望达到政策性目标。在宏观方面，中国政府希望通过“1+X”制度建设把职业教育建立为“独特”教育类型，并为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但我想讨论的不是宏观制度建设，而是制度和人才培养模式以及技能评价模式方面的关系。

根据规划一方面，希望通过制度建设，能够对未来技能性人才培养尤其是复合型技能人才培养新模式建立以及评价模式建立提供支持和帮助。另一方面，对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也发挥出“指挥棒”作用。在实行“1+X 技能等级证书”之前，中国实行“双证书制度”（学历制度 + 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截至目前，“双证书制度”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其中的原因，一是可能是管理方面原因，二是可能是技术方面原因。“双证书制度”是职业资格证书考试质量问题，是技术能够评价结果的质量不高（预测效度不高），其中没有完全反映企业对技能人才真实需求。因此，这种证书的人没有被社会所认可。如果证书不被社会所认可，那么证书很难存在下去。这是目前“1+X 证书”改革起因之一。

在未来发展进程中，想要保证“1+X 证书”制度成功实施，必须保证“X”技能评价科学性。“1+X”中的“1”就是传统学历教育，“X”是技能等级证书。应当说“1”不是新事物，但“X”

对我们而言是新技能等级评价。要高质量评价就要谈到质量标准（信度、效度、区分度和客观性），以及需要满足这些技术评价和技术标准要求。

技能评价是复杂领域，而技能评价的方法有两大类：一是考试，二是能力测评。其中，考试有对错区分，能力没有对错区分，只有高低区分，例如厨师能力，厨师能力无法用对错区分，只能称这个厨师的能力高低。职业技能考试反映出课程或者职业标准的效度，无论你课程和职业标准如何，只需满足课程要求就能获得满分。如果课程标准满足不了社会需求，也与课程无关。但能力评价不是按照课程标准，是按照真实工作对人的要求，所以没有标准答案。这两种技能评价的方法，各有所长，互为补充，无法相互取代。

此前大家讨论或者研究较多的都是传统技能考试。目前，技能考试分两部分，一是知识考试，二是实践技能考试。其中知识考试是通过笔试，而技能考试是通过观察实际操作过程进行评分。除技能考试之外，还有各国家和地区或者各学校开展技能竞赛或技能大赛。但技能考试有局限性，其中最大的局限性是没有办法开展大规模技能考试。假设要举办大规模技能考试，并想达到足够的质量、信度和效度，费用会高到无法接受。奥运会是全世界最高水平技能考试。例如，奥运会跳水比赛，是十几位评委取平均分进行评分，由此可见，全世界最高水平的评委评判标准都不同。反观我们进行技能考试时，想要公平就需许多位评委打分，但目前根本无法实现。如果不同评委给不同的人打分，分数是无法评估。因此，大规模技能考试标准是很难制定。随着工作复杂程度提高，技能内涵发生深刻变化，除动作技能之外，新式技能成分也越来越高，这使能力测评难度提高。在时政调查中，传统观点中认为技能大赛能够促进技能能力和职业发展。如果技能竞赛与技能考试题目不好，即使得到好成绩的人最终职业发展也并不好。这反映出目前较多技能考试或者技能大赛题目不好，所以没有实现所期望的政策目标。

从学术上讲，传统技能考试有很多局限性。例如想了解一些引导人正确行动的知识，几乎是无法诊断。目前心理学研究还没实现如何能诊断知识能够指导或引导人完成专业性的工作任务。现在许多国家在技能考试中推崇标准化测验。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是在进行标准化测验，但标准化测验对职业教育并不合适。据个别国家研究发现，这甚至阻碍创新发展，单纯对与错很简单，但在实际的工作中，很少有绝对的对或错。因此根本无法反映工作世界的要求。

在《职教 20 条》中“X”是技能等级证书，但定义表现为技能等级证书是职业技能水平的凭证，

同时反映出职业活动和个人职业生涯发展所需要的综合能力。而技能凭证反映是综合能力，A 的凭证反映的是 B。虽然听上去感觉像逻辑有问题，但我认为此逻辑问题恰恰反映出对进一步理解的发展。

目前，我们开展与德国、中国、南非、西班牙、瑞士、波兰等共同合作的综合能力评价项目。该项目对综合能力的评价指标最低为功能性能力，并完成职业岗位功能。第二是企业层面过程性能力包括企业的经济效益、工作过程、生产流程。最高的层次是整体化设计能力，设计能力特别强调创新性、社会责任感、社会接受度。这不仅满足功能要求，还要满足企业层面要求和满足社会层面，甚至实现人的个性发展和创新。

经研究发现，能力测评能够有效预测工作技巧。经工作两年的单位中表现发现，实操考试好的人与未来在企业里发展无关，相关系数基本为负。但职业能力测评可以有效预测未来工作的绩效，也就是采用不同能力的评价方式对绩效预测的准确性是不同的。

目前“1+X”正处于试点阶段并公布几批，但水平上有高低之分。因为起初公布时，教育部并没有统一技术评判标准，因此各证书标准不同。但我认为当统一技术标准后，各证书的标准会提高。能力测评对未来技能评价可以提供帮助，例如能力测评中有许多基本理念，符合“1+X”的技能评价。能力测评的基本理念和“PISA”的理念相同。“PISA”是评价学生现实生活和终身学习，而职业教育是评价职业工作生涯发展所需知识和技能和实际工作情景中创造性运用知识和技能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职业能力评价首先要建模，我们建立的三维模型，一是能力要求纬度。从初学者到专家，过程是初学者、生手、熟手、能手、专家 / 高手，不同发展阶段经受的工作内容不一样，所以我们能够评价它能够完成什么样的工作。

二是行动纬度，因为职业教育培养技能型人才需要完成实践工作，必须过程完整的实践性的工作，职业教育就是教给学生干活工作，按照这几个纬度就可以进行能力测评或者能力评价。举例说明，电类专业的能力测评题目是要求某一个人需要建造一个光伏发电设施。这个问题无标准答案，这是一种开放性的题目。这种能力测评开放性的题目有什么特点？这来源于企业真实的工作实践，是企业的典型工作认为，有不同的深度和广度的答案，它的考察重点是实践性的知识，而不是理论知识。这样的话，学生拿到的结果不是单纯的分数，除了分数之外还有能力的轮廓。通过轮廓可以诊断学生，比如诊断不同的学校类型，甚至不同的国家。

根据护理专业能力诊断结果，其中有中国 11 所高职、重庆 12 所中职、瑞士 15 所高职学校，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高职和瑞士的高职有什么区别。瑞士的高职可能发展为更全面，它的 K1（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功能性的能力中国和瑞士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瑞士学生的 K8（创新性）、K6（社会责任感）和中国的学生有显著性的差别，明显比中国高。中国的中职和高职学生能力轮廓惊人的相似，这和学校没有任何的关系，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国的学生和瑞士学生的差距不是偶然的因素造成的，可能是系统性的偏差或者结构性的缺陷，如何造成结构性的缺陷、系统性的偏差体？就是我们的课程。我们职业教育的课程目前为止都是学科性的课程，我们要教学生学会工作，但我们的课程是教会学生学会数学、制图、理论、技能，这些工作要素之间是不联系的，但是没有将工作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因此无法实现人类认知的关联性和全面性，也没有办法培养人全面的工作能力。

当我们知道原因就可以进行教学改革，教学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整体化的情境学习，给学生提供一个整体化的学习的情境，涉及到工作的方方面面，工作对象、工具、工作材料等。

通过教学改革、学习任务的改革，从中发现学生的质量得到提高。中国现在职业农民新的教学改革，要求学生出去创业、生产无公害的产品或者绿色产品，这个学校是教育部组织的能力测评最好的学校，我们从中发现环境非常好，环境意识、创新性反而是农业类的学生。因为整个对能力的要求不一样，教学改革也跟上，但是不是绝对的。

高质量技能评价的特点和“1+X”技能等级证书的建设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个机会是要通过高质量的技能评价来进行。一方面要评价出优秀的技能工作者；另一方面，希望技能评价能够给我们未来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提供一些启发。高质量的技能评价的方式应该是采用真实性评价策略，关注认知和精神领域的内容。重点考察行动能力，而且这个行动能力是全面的结构完整的行动，不是简单的操作，要动脑筋的行动，要自己去制定计划。在未来的技能评价也要建立模型，也要参照能力测评而不是简单的考试，因为简单的考试有可能考不出效度，如果没有效度，考试成绩好或不好就没有说服力。所以要借鉴能力评价的理论，建立技能考试的模型。

最后，技能评价实际上有价值趋向，需要理解和反思，如果定义为综合的职业能力，就会为未来职业教育课程和教学改革提供一些启发。

前沿科技分论坛主旨演讲

抗疫斗争实践中对数据权属问题的再思考

陈智敏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特邀）
中国友谊促进会理事长
公安部副部长（2009–2017）

在去年第三届太和文明论坛上，我分享了关于数据权属问题的再思考，指出大数据时代数据权属的主体在民、主权在国、使用在企业。认为现有的通信结构、技术形态加之法律和规则上对数据权属问题的缺失正在加大社会的贫富悬殊，可能形成数据寡头控制人类社会的局面。呼吁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法律法学家要关注并研究大数据时代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别对大数据时代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国际格局、体系的制度、标准、规则进行研究和设计，以适应快速发展的新时代。

在此基础上，今天我想就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数据权属问题进行再思考，与大家进行分享。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至今，全世界已有 20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 2458 万余人感染了新冠病毒，死亡超过 83 万，疫情仍在全球继续蔓延。一是疫情的源头至今没有找到。美国指责中国是疫情源头，但是中国首先暴发疫情并不意味着源头就在中国。据西方媒体的报道，欧洲国家甚至在 2019 年 3 月的生活废水的样品中就检测出了新冠病毒。二是病毒的传染方式、链条还不十分清楚，新冠病毒不但可以

人传人，物也可以传人，物与物之间也会相互污染。三是新冠病毒的疫苗和治疗特效药还在研发中，大规模投入使用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斗争仍在继续，这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一次重大考验，是对人类的生命安全防范机制、医疗卫生防疫体制、各国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政治和社会秩序，甚至是对现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提出的严峻挑战。到目前为止，中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和新疆建设兵团从首先报告的病例到现在，累计确诊是 85013 人，治愈了 80091 人。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也取得了重大的战略成果。中国不仅比较好地首当其冲地应对了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挑战，而且还向国际社会提供了新冠病毒基因序列、感染者病历以及临床治疗情况、已经发现的病毒传播的途径和链条、抗疫的相关经验，应该说为人类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中国之所以能够有效应对新冠疫情，我认为主要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成立了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向湖北等疫情严重的地区派出了中央指导组，坚持全国一盘棋，充分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体制优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把人民生命健康安全放在第一位，不惜一切代价，不遗漏一个感染者，不放弃一位病患，打了一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同时我感觉到，在这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大数据信息化手段发挥了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大数据之所以能够发挥这么大作用，是因为中国这些年来为大数据的广泛应用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截至 2020 年 6 月底，我国移动电话基站总数是 877 万个，其中 4G 基站就有 560 万个，全国光缆线路总长度是 4890 万公里，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的数量也达到 9.31 亿个。应该讲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大数据的作用概括了七个方面。一，大数据在疫情防控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大数据帮助快速确定传染源。以北京 6 月暴发的本地传播疫情为例，通过大数据分析很快就确认了传染源在“新发地”，通过大数据溯源发现“新发地”的新冠病毒来自于欧洲，并发现了此次疫情病毒传播途径是物传人，通过物质传到人身上，然后再人传人。针对这个新情况，北京采取了更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以“新发地”为中心，将不同区域分成高风险、中风险、低风险的等级进行防疫控制，很快控制住了疫情蔓延。通过

大数据对特定人群的活动轨迹、位置数据、支付数据进行分析，锁定受感染人群以及他们的密切接触者，这就增强了我们筛查、调查的时效性，然后通过集中隔离、加强核酸检测等手段，有效防止了进一步扩散。利用大数据加强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使社区起到了安全堡垒的作用。利用大数据分析，有针对性地进行核酸检测，大大提高检测的效率。用大数据支持健康宝、健康码的使用，保证健康人员的正常的社会流动。

二，大数据在生活保障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社会隔离和自我隔离是武汉实施疫情防控的有效手段。“封城”情况下人民的生活物资怎样保障呢？这次来看，主要是靠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在网上、线上运行，然后与外卖、物流等互联网企业有机结合，通过网上购物、网上订餐、网上订购防护物资，有力保障了居民生活，实现了需求与供给的精准对接、精准有序投放。据统计，武汉封城期间，外卖小哥单日的接单量是过去的 3 倍多。

三，大数据在保证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如健康宝、健康码维续了城市、单位、社区、部门之间的联系，维护着疫情条件下社会的必要流动。广大社区依靠着人脸识别、大数据很好地发挥了安全堡垒的作用，各级政府也充分依靠大数据来履行管理职能、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

四，大数据在推动复工复产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各个企业依靠大数据保障了工人来到企业能够健康工作，依靠大数据调用生产资料和销售产品。网上办公、网上订货、网上销售得到了迅猛发展，中国第一季度 GDP 下降了 6.8%，复工复产后的第二季度 GDP 迅速变成了增长，达到了 3.2%，应该说大数据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五，大数据在网络教育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我国有大中小学生 2.82 亿人，专任教师 1732 万人，在疫情期间，通过在家里的网络学习和网络教育不仅做到了停课不停学，保证了师生的安全，而且还实现了一些优质教学资源的共享，这为解决教育公平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路子。

六，大数据在保证居民正常生活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受疫情的影响，居民大多时间待在家里，形成了社会隔离，但是通过网上的娱乐、网上的体育锻炼、网上的厨艺等网上生活，大大地丰富了居民的居家生活、减轻了心理压力。我有很多朋友就在这个期间学会了做饭，手艺在不断地提高。

七，大数据在国际社会疫情防控工作和维护国际社会交往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世界卫生组织依靠各国提供的每日确诊的人数、死亡人数等数据来判断世界疫情发展趋势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对一些疫情严重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组织协调、支援帮助。同时依靠大数据有效保证了国际社会之间、各国之间人员有效地往来和疫情防控。世界各国还通过网上开展双边、多边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同时利用网络召开了一些重大的国际会议，包括一些峰会。

大数据在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中第一次大规模的有效应用，是人类社会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次特别重大的实践，极大地推动了大数据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和普及，可以说大数据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能。这次重大的实践给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启示，就是数据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一切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基础，而个人数据是一切数据的基础和源头。人自身的数据如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号码、手机号、微信号、各种 APP 账号等是基础数据，人类社会在网络空间活动的数据是网络数据，人自身的数据是产生、形成网络数据的基础，人是网络空间的活动主体，人自身和人的活动产生的数据是网络社会的主体数据。

人在网络数据的生命周期中发挥着源头性、基础性的作用，因此在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的数据权是与生俱来的，公民应该拥有数据权。大数据时代数据权属的主体在民，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在大数据时代的体现。个人数据要成为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数据，需要互联网企业进行收集、清洗、整理、分析、挖掘，从而使分散的、孤立的、互不关联的数据成为有价值的产品和商品，企业的活动保障和支撑了数据的有效运行，从而产生了数据的效益，所以企业有权占有、使用、受益、处理这些数据产生的权益。国家掌握的各种数据是有效治理和服务社会的重要依据，国家通过掌握数据的主权来维护国家之间的正常交往和正常秩序，保障国家安全和国际社会的安全。所以说大数据时代的数据主权在国，是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核心表现，国家享有对其政权管辖范围内数据的管理权、发展权、服务权、控制权、防护权、反制权、司法权和应对网络战的权利。

在抗疫斗争的社会实践中，再次有效地验证了数据权属主体在民、主权在国、使用在企业这一数据权属划分的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这里我要说一下这样划分的意义在于，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可以有效地坚持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数据创造的财富为广大人民共同享有。人民群众与生俱来的数据参与国民财富的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从而保证了社会的基本公平正义。同时也保证

了国家对大数据时代重要战略资源的有效掌控、管理、服务、保护，从而保护数据安全、互联网安全和国家安全。而且还能使企业在数据使用过程中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等价交换的原则，保证数据交易的公平正义、数据股份市场的正常发育、企业之间合理竞争和数据在国际社会的合理流动，从而有效地防范少数企业和个人对数据的垄断、成为数据寡头。但数据权属要真正落实和体现在社会经济活动和各项法律制度中，还要靠公民数据意识的提高、国家法治的完善和企业有效的实践，在三者的结合过程中形成相应的规矩、标准、准则、法律、制度。

这里还提出一个需要引起我们思考的问题，就是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能够产生经济效益，并且在反复使用中可以不断地升值、不断地增值。因此在大数据时代，统计和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和社会总财富时，应该考虑将数据和数据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社会财富纳入统计范围。同时，人与生俱来的数据是数字经济和数据活动创造社会财富的基础，应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与再分配。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的设计提供理论基础，也为社会就业提供新的思路，为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模式的创新提供了新的方向，也为社会财富共享提供了新的理念。

我注意到了相关国内外专家学者也提出类似问题，例如在第六届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宾塞就提出，当前数字经济所产生的很多社会价值没有被计入 GDP，应尽快将数字经济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都是以数据权属问题为基础的，所以数据权属问题是数字经济社会最基本的问题。因此，我在这个会上再次呼吁专家学者们重视并认真研究数据权属的相关问题，中国友谊促进会也非常愿意与参会的各位专家在网络安全研究领域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数字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现代文明如何在危机中求生？

John B. Cobb Jr.
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
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创院院长

很荣幸能借此机会跟大家一起交流。我来自美国，而美国正将中国视作敌人。当下美国的两个政党正被反华派所裹挟，力图在美国民众中激发反华情绪。但目前为止，他们的行动并不成功。我十分感激中国政府面对恶意宣传和可耻的挑衅行为展示出非凡的智慧与耐心。

中国展示出自身实力也至关重要。能生活在中国是一件幸事，因为中国始终能够立足于未来采取行动，减少一切不可避免的灾难所带来的影响。我希望本次论坛将推进这一进程。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建立生态文明。与之前的所有文明不同，生态文明主张人类完全归属于健康的自然环境。我们必须建立后现代的生态文明，现有的文明都在以不可持续的方式进行自然开发，新文明必须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找到定位人类社会的方式。

这种新文明对社会各领域的现代性带来了挑战。目前，现代工业化农业明显不可持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冰川即将融化殆尽、含水层几乎枯竭，这加剧了全球变暖，并改变了作物的种植地，使粮食的保产更加困难。对于耕作十分重要的表层土壤每年都在流失，并随着河流沉积在肥沃的三角洲中。

现在，现代粮食生产导致的气温上升正在使海平面升高；海水的倒灌将破坏三角洲土壤的肥力，四千万孟加拉人将不得不放弃恒河三角洲的农场；杀虫剂对现代农业至关重要，但杀虫剂的大量使用正在杀死传粉昆虫。同时，杀虫剂会驱动害虫的进化，从而促使技术人员生产出效力更强的杀虫剂，而这些有害物质最终会进入食物和人体。

有几种方式可能会破坏人类的交通系统。其中之一便是金融灾难。强风和暴雨会引发滑坡和洪水。随着海平面上升，沿海城市会变得尤其脆弱。交通问题引发的不满会导致持久的罢工。我们需要彻底改变保护粮食安全的优先事项。成千上万的人已经开始从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粮食生产，从而推动粮食安全。他们不需要杀虫剂，后现代耕种的方式增加了地表土，减少了用水量。这些生态农民无法与工业化农业生产以及其产品价格竞争，因为工业化不需要为他们造成的一切损失买单。

现代衡量进步的方法也限制了后现代粮食生产，我们已经知道了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粮食生产方式。经济也是如此。在当今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经济都是由金融资本主义控制。这种资本主义极大地增加了一小部分人的财富，但是却不能提高国家和政府的生产力。它仅仅是将其他地方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用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经济是否成功虽然极具误导性，但依然宣告金融资本主义的失败。

全球金融机构之所以能够存活下来，仅仅是因为它们得到了政府的巨额救助来弥补损失。现代文明的这一典范显然是不可持续的，然而，现代大学教授的经济学仍然支持这个总体设想。幸运的是，已经有经济学家认识到只以 GDP 增长为目标是不合理的，并制定了维护经济良好运行的替代性方案。生态经济学家已经准备好从那些还在努力维护衰落的现代经济学的人那里接手经济学教学。现代经济秩序推崇在少数地点进行大规模生产，而新经济则鼓励地方社区尽可能就近生产。

尽管目前金融处于主导地位，但人们却对它知之甚少。今天，西方世界已经从工业资本主义转变为金融资本主义。尽管工业资本主义带来了诸多问题，但它确实创造了真正的商品和服务，而金融资本主义仅仅通过当今以其自身为中心的世界来赚钱，使钱继续生钱，债务不断增长。我们关注西方的这种情况尤其重要。为了让人们付清债务并偿还利息，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一定会增加。在工业化社会中，这种增加通常是足够的。但是，当唯一增长的是股票市场时，那些不持有股票的人就没有多余的钱来还债，他们只能借更多的钱。这一体系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不是国会与美联储合作，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救助，华尔街早就崩溃了。

金融崩溃也许是不可避免的。随着地方社区成为生态文明的基本经济单元，地方公共银行和货币变得更为重要。中国也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当然，中国会因为美国金融机构崩溃而受到影响，因为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也融入了全球金融体系，但是中国所处的位置是美国无法达到的。中国可以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经历金融体系的崩溃，而不会深陷其中。世界期待中国能够建立一个服务于人民，而非剥削人民的金融体系，避免金融崩溃给世界带来的混乱、困惑和痛苦。

中国甚至有可能带领世界走向生态文明，这将包括各级社区之间的新型关系模式。致力于建设生态文明的人喜欢构想一个有很多层级的社区，每级社区下都包含新社区，最终让全世界变成由社区组成的大社区。最近的历史中，有一些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趋势。法国和德国决定共同带领欧洲成为一个欧洲共同体以避免未来的战争。欧洲国家的主权确实被削弱了，因为相当大的权力都交给了欧盟，所以很难想象联盟内成员国之间会发生战争。鉴于欧洲的历史，这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成就。可以设想，其他国家也可以组成类似的联合体，成为由国家组成的全球社区，从而建立一个生态文明所需要的世界秩序。

欧盟是一次向生态文明方向发展的伟大实验。我们要从它的成功和失败中吸取教训。在我看来，为推行欧元而废除国家货币严重削弱了欧洲国家的权力，而将太多权力集中在欧洲银行。在生态文明中，国家应尊重它们所组成的社区并赋予其权力，而这些社区也会尊重下一层级的小社区。当我们在各级社区工作时，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加强相对自治的地方社区。

如果这些社区之间相互合作，它们就会成为一个多级社区，并在当前危机中存活，而一个充满现代竞争个体的世界则不会。我这次演讲的目的，是向大家介绍生态文明的形态，以及它如何在危及现代文明和人民的环境中发展。同时，我也想告诉大家，无论是哪个国家，只有致力于建设生态文明，我们大多数人就会拥有更好的生活。实现这些对生态文明的期望还需要做大量工作，这项工作是我们的使命，非常值得去做。

秋冬季疫情反弹风险高，但有信心做好防控

吴尊友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

今年年初，发生了新型冠状肺炎的暴发疫情，至三月份以后疫情很快在全球蔓延。现在，全球每天报告人数已经达到了二十多万。我们对新型冠状肺炎的认识，仅仅才有六个月的时间，要彻底地防控新冠肺炎，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需要我们去认识，今天我们一起来讨论新冠肺炎疫情及防控策略。

首先，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最早发生疫情的前三周的具体事件。2019 年 12 月 27 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张继先大夫，报告了几例特殊的肺炎病例。这些病例引起了武汉市卫健委的高度重视。2019 年 12 月 30 日，武汉卫健委发布了通知，关于紧急加强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通知，这个通知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12 月 31 日，国家卫健委、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派出工作组、专家组到武汉协助调查。早期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病例都有共同的暴露史，也就是说，都曾经去过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这提示华南海鲜市场可能是一个传染的源头。工作组和专家组当即决定，立即关闭华南海鲜市场。也就是在 2020 年 1 月 1 日，华南海鲜市场关闭。1 月 3 日，尽管我们还不清楚这起不明原因肺炎的病原体，我们把相关的疫情情况通报了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相关的国家。这里所说的相关的国家包括美国、日本、韩国、英国、欧盟等国家。

1 月 7 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单位分离了新型冠状病毒，并鉴定新冠病毒是这些不明原因肺炎的病原体。在 1 月 9 日，中国政府把这样一个病原学鉴定结果报告给了世界卫生组织。在 1 月 10 日，我们研制了诊断试剂，派往武汉用于临床诊断。在 1 月 11 日，中国政府开始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每天的疫情进展情况。1 月 12 日，我们与世界卫生组织分享了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序列。也就是说，我们把基因序列的数据上传到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流感数据平台。这个数据的上传，使得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分享这样一个基因序列，并根据基因序列研制生产诊断试剂。1 月 20 日，新型冠状肺炎列入国家法定报告传染病。1 月 23 日，武汉实施封城措施。在后续的几天，湖北省其他 15 个城市也相继采取了封城措施。

回顾最早的三周我们的响应，在这三周，我们做出四项重要的发现。一是，从确定疫情到分离病毒，前后只花了七天的时间。从分离出病毒到诊断试剂派送到武汉用于临床诊断，只用了两天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认识一种新的传染性疾病，创造了人类历史最短纪录。还有，我们确定了平均潜伏期，常见潜伏期为三到七天，最长十四天，这个最长潜伏期也作为我们隔离密切接触者的时间，还有我们确定了主要传播方式，那这四项发现，分离病毒、鉴定基因序列、研制诊断试剂、确定潜伏期、确定传播方式是中国制定防控新冠肺炎策略的科学基础，也是世界制定防控策略的科学基础。这四项发现也是中国科学家对人类控制新冠肺炎最大的科学贡献。回顾早期的疫情，我们认识到，控制新冠肺炎最主要的两个瓶颈性问题，一个是床位不够，短时间内大量病人的发生，而传染病床位不够，使得大量的病人积压在家庭，积压在就诊的门诊。这些病人由于不能及时地入院，不能及时地被隔离，他们继续在家庭、在医院门诊传播扩散，引发了更多的病人。

第二个制约瓶颈性的问题，是诊断能力不够。由于新冠肺炎早期的诊断采用的是核酸检测，而这样一个检测技术，需要一定的生物安全级别的实验室才能够进行操作。由于诊断能力不足，在武汉积压了大量的病人等待诊断，那这两个制约性的问题就成为了我们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瓶颈性问题。随后，中国在武汉建立了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又利用现有的建筑改建了方舱医院。那么通过这些措施，我们解决了床位不足的瓶颈性问题。

我们刚刚提到了方舱医院，这个方舱医院也是中国对世界控制新冠肺炎的又一大贡献。由于新冠肺炎病人的主要表现，特别是大多数的病例属于轻型、普通型，大约占了总病例的 80%。而这些病人不

需要特殊的医疗照顾。把这些病人安排在方舱医院，那么在短时间内可以分配少量的医务人员照顾几百甚至几千轻型的病人。方舱医院的作用，主要不在于治疗，更重要的是，把病人放在这些场所起到的是隔离作用。在方舱医院，他们不会再停留在家里，不会停留在社区。这样，把传染的源头就给切断了。所以方舱医院其实最大的作用是隔离病人、切断传播方式。在应对新冠肺炎的过程当中，我们创造性地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方舱医院是其中之一。我们还采取了很多其他的公共卫生的措施。这些措施的综合应用，使得我国在短时间内成功地控制了新型冠状肺炎疫情。这些措施包括我们常用的公共卫生措施，像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保持通风，这些措施看上去科技含量不高，只要落实到位，就能够很有效地控制住疫情。

中国的疫情，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或者叫做第一波流行，是以武汉为源头向全国蔓延。这一起疫情，在三月份就得到了基本的控制。第二波疫情是以输入病例为主，在输入的地方局部形成了地方的传播，像在东北绥芬河、舒兰、吉林等地四月份、五月份出现的局部输入引发的传播。第三波发生在北京，以 6 月中旬，6 月 11 号开始在北京出现的新发地为源头的暴发疫情。这些疫情前后经历了一个月的时间，总共有四百人发病。第四波，七月份发生在大连和新疆乌鲁木齐，这两个地方同时发生的疫情也是局部的聚集性疫情。这几起疫情，都说明了新型冠状肺炎，它没有明显的季节性，不分冬天夏天。只要防控措施不到位，或者防控措施有松懈，疫情都有可能出现卷土重来的情况。如果我们不是及时地发现，及早地采取措施，那么这些疫情，它的规模可能会变得更大。大家都特别关心，在未来特别是秋冬季，疫情会不会卷土重来。我们首先看一看全球疫情的流行态势。从三月份开始，全球疫情一路上扬。

到了五月底，全球每天报告新冠肺炎病例突破了十万。从七月初开始，全球每天新增新冠肺炎病例突破二十万，现在每天有数千人死于新冠肺炎。也就是说，从三月份以来，全球的疫情一直处在一种上升、高水平流行的状态。随着冬季的到来，这种全球流行的态势还会继续加重。我们国家目前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是会出现类似于在北京、在大连、在新疆出现的突如其来的暴发性的、聚集性的疫情。那么这些疫情提示一个新的现象，也就是说，受污染的海产品和外包装可以把病毒带入国内，引起局部的暴发疫情。另外一方面的压力，只要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疫情没有控制，都有可能对我国的疫情反弹造成威胁，所以要防止秋冬季疫情反弹，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做好外防输入。外防输入最主要的是要把好国门关，把好国门关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要防止感染的人把病毒带入国内，造成传播流行；二是要防止污染的冷冻食品和外包装，把病毒带入国内，造成新的疫情。大家都很担心秋冬季疫情反弹，实

际上新冠肺炎不分冬夏，只要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随时都有可能卷土重来。当然，秋冬季其他呼吸道传染病会高发，使得新冠肺炎的诊断防控变得更加困难、更加复杂。但我们有信心，我们有能力相信，即使秋冬季新冠肺炎发生的风险增大，我们也有能力控制新冠肺炎，不会再出现类似于武汉早期的严重疫情局面。

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有两个方面的事实依据。一是在今年春季和在冬季一月份、二月份的时候，当武汉为源头的疫情发生以后，有相当比例的感染者从武汉春节返乡流落到全国三十个省，全国三十个省都及时采取了有效的防控措施。没有一个省，报告总病例数突破两千，实际上，在三十个省当中，只有四个省，病例数超过了一千。这样一个时间点也是在这个寒冷的季节，也是在呼吸道传染病高发的季节，所以这是一个事实。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在五月份发生的输入性病例引发的局部传播流行，还有在北京也好，大连也好，新疆也好，我们都能及时地发现，并在短时间内成功地控制疫情。现在我国的疫情，特别是本地传播的疫情又回归到零的状态。这些事实，都说明我们中国有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以及坚定控制新冠肺炎的决心，还有我们全国十四亿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使在冬季，新冠肺炎疫情再来时，我们有能力及时发现，及时控制。要应对好秋冬季的新冠疫情，我们还是要从几个方面入手。一是要加强监测。我们需要一个灵敏的监测系统，及时发现疫情。在这样一个灵敏的监测系统当中，普通的老百姓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当出现头痛、发热等症状时，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拖延。

每一个人及时就医，及时发现疫情，对于控制疫情是非常重要的。还有我们基层的医疗机构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病人来就诊时，我们应该有能力第一时间诊断病例，能够及时上报病例。第三，我们的疾病控制部门当出现疫情以后，我们能够及时地发现传染的源头，确定疫情的规模，并提出控制的策略。如果我们这三项措施都能够落实的话，我们就一定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可能的疫情，并及时将其扑灭。第二，我们要利用我们新的诊断技术，就是核酸检测技术，尽可能早地发现疫情，了解疫情的规模，为更多地发现早期感染者提供新的技术。第三，要采用疫苗防控策略。这里说的疫苗，实际上有两种疫苗，一种是已经在使用的预防其他呼吸道传染病的疫苗，包括肺炎疫苗、流感疫苗。那么还有一类，就是大家特别关心的新冠疫苗，这种疫苗是特异性的预防新冠肺炎。目前我们国家五条技术路线的疫苗，都在有序地向前推进，有望在年底以前疫苗能够问世，为预防新冠肺炎疫情提供新的技术手段。我相信这些新技术的应用为我们增添了控制新冠肺炎的手段。我们有信心，我们有能力在短时间内把可能出现的疫情控制住。

提升生物安全的 AI、物联网、机器人技术

张建伟

德国汉堡科学院院士

德国汉堡大学信息学科学系教授、

多模态技术研究所所长

在去年太和文明论坛，我们讨论过人工智能的伦理之后，我们今天聚焦生物安全这一重要的时事话题。德国汉堡也是德国的高技术聚集地，也有像艾本德生物仪器这样的高技术公司。德国汉堡大学医学院进行着非常前沿的、交叉的学科研究。Klaus Püschel教授作为汉堡大学医学院的病理学教授，解剖了在汉堡因为新冠病毒去世的前一百多个病人，找出了他们死亡和病毒的联系和机理。Johannes Knobloch教授负责大学的病毒处理，在和我们进行机器人自动化方面的密切合作。下面是我们和汉堡医学院进行的一个跨学科的人工智能和大脑机理的研究项目。

在去年的太和文明论坛中，我们讨论过新一轮经济社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作为数字化、网络化之后的智能化，其已经变为人口红利和流量红利过去后，价值和智能红利来临的重要因素。人工智能如何落地，和未来的理论的实践如何在能思考、能行动方面做出最好的实践，需要我们从深度学习，扩展到更广泛的机器学习，到所谓的强人工智能的深入研究。人工智能机器人现在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如何把我们做的这些成熟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到解决我们的生物安全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在去年的中国学术机器人年会中，我组织的这场机器人展

示，显示了很多的机器人平台，从仿生的机器鱼到四足的机器狗，到爬行的壁虎和飞行的蜻蜓，以及用大脑芯片控制的自主自行车等等，这些都显示了机器人技术取得的重要成果。在北京举行的自主机器人大赛中，我们展示了一些现代人形机器人技术，用在线的视觉和决策，如何在拥有复杂地形的比赛中显示出它们的能力。这是我的两个德国本科生在参加比赛时候的场景。人工智能自动化已经从生产延伸到社会，在先进制造、健康医疗、交通物流、智能农业、检修维护，还有家政服务里都越来越起到重要的作用，今天让我们聚焦在大的健康医疗方面的应用。在当今时代，物联网已经成为汇聚传统数据网和服务网的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使能技术。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不识国界的病毒，对我们全球性进行的挑战。从上世纪初的西班牙流感到前几年的艾滋病毒和SARS病毒，到我们今天的新冠病毒。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机器人，来进行病毒的建模、传播和防治，变成了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研究题目。

这是我们在宏观领域里头，做的一个基于位置信息的交互传播建模的一个工作，右边是一个杭州的出租车司机之间交互的数据。我们利用IoT物联网的技术，利用地图匹配的方法，可以把传统的GPS定位精度提高到一米之内，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人的位置信息，变成人和人之间的交互信息。在移动大数据下，建立个性化的传播逼近模型，在新一个确认者之后，我们可以利用所谓的潜伏期隐藏日子的交互模型，来进行这些感染者周围人群的可感染性的概率推理和学习。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人工智能的学习和推理办法，在确认一个感染者之后，推理出每一个其他周围人可能感染的概率。这样我们就可以精确地推算出，在黄码和红码之间每个人可能感染的精确概率。在测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挑选这些可能感染概率最大的人群进行测试，可以极大地节省测试资源。在全球抗击疫情的初期，我和哥廷根大学的于晓华教授，提出了关于协调推进高效防治疫情和经济平稳发展的四方面建议。其中科技助力也是我们的重要话题之一，加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在重大疾病中的应用，包括采样、分析、诊断、治疗、服务、配送等工作的应用。同时，充分利用超算中心的资源，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更精确的量化分析，为应急管理的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依据。这款我们开发的“安杰协作机器人”，具有全世界最好的力控性能，也将在病毒测试的自动化方面起到重要的本体作用。这是我和我的学生在深圳的博为医疗机器人公司开发的一款静脉药物配置机器人，可以帮助护士和医护人员减少工作量，减少感染的可能性。二十年前，我在做助理教授的时候开发的这款生物实验室的移动操作机器人，当时是给拜耳制药厂，为了节省人工和夜里的取样实验而开发的一款自主机器人。在今天我们的病毒实验室里头已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十年前，在欧盟第五框架的资助下，我们和英国健康总署，一起开发了这款基于灵巧手和灵巧操作的病毒处理机器人，在今天已经可以走向实用阶段。在疫情的初期，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领导，一起设立了这个共融机器人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重大研究计划的2020年的补充项目指南，其中包括应急问诊与检疫智能机器人作业。针对重大疫情，在问诊/初筛、采样、检测、分析等环节无感染的应急处理，研究这些机器人的设计方法、采样工具、物理交互、人机交互等等方法，来实现问诊、采样、检测和分析一体化的无人操作。另外，在传染病房护理多模态机器人作业方面，我们将研究重大疾病患者的健康状态监控、送喂药、日常生活护理等无人操作的需求，重点研究传染病房内多模态护理机器人的移动操作、感知和交互。我们汉堡和上海现在正在联合开发精准可靠的自动采样的机器人系统。通过集成高端的多个视觉系统和安杰的力控机器人，进行自动定位、自动力控，进行高效、安全、精确、标准的口腔和鼻腔的病毒采样。在国内，如果出现第二波和第三波病毒的来临，大量测试的需求下，我们可以用一个医生来同时管理多个自动采样的机器人，来实现高通道的采样需求。在德国的应用场景，我们想象着在机场和主要的车站，安装这些无人自动采样系统，使得旅客在国际旅游返回的过程中，能够很快地拿到测试结果，决定是否进行隔离。

在机器人自动病毒采样之后，对高效率、高精度、自动化的病毒检测，也存在着巨大的需求。现有的核酸PCR的检测方法，需要几个小时甚至数天的时间，才能确认结果。如何用快速的检测方法实现高效率、高通路的检测，在全球实现尽可能多人数的检测，也是一个重要的研发方向。在德国，我们和PixelBiotech进行着密切的合作，在高探针和染色的技术指导下，我们用人工智能和光学的方法能够实现一种高效率、高精度、自动化的光学检测方法，可以看到左边这个正常的健康的细胞，和右边这几个被新冠病毒感染的细胞。我们利用人工智能的新的递阶抽象和合并的算法，能够更精准地发现病毒的形态和它们的个数。使用人工智能的算法，可以大大地改善图像处理的分类结果。上面这一行显示了用传统的分割算法测出来的结果，下面是我们用人工智能的清晰的分类结果。我们也用这个新的算法来进行特征的量化和不良细胞的发现。比如第一个是正常细胞，第二个是轻度变异的细胞，第三个是高度变异的细胞，第四个是癌症的细胞。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和光学和测试方法的深度结合，使得我们在生物安全技术上能够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把全球的测试数据和资源融在一起来进行防疫抗疫，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中德联手抗疫，在中德中心已经有了一个新的指南的召集，在新型的病毒结构、感染机制和传播历史，以及动物和环境的

传播可能性、医院的管理，还有感染的处理、保护医护人员以及科学的伦理方面，我们都设置了新的指南。我们和中德的防疫医院进行密切合作，包括汉堡大学的UKE医学院和在武汉最先处理病毒的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进行密切合作。让他们在整个病毒检测、处理、自动化、标准化方面和经验交流方面，和整个平台的共享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合作。要真正实现病毒的检测、处理以及防治的自动化和无人化，还需要在理论和技术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由我领导的中德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工智能基础研究项目——跨模态学习，立足在开发2.0的机器人和2.0的人类方面，继续进行中德合作和探索，试图理解跨模态学习中的认知、计算和神经机制，利用理解的知识和模型来提高人和人工智能系统的效能。在前四年的合作中，我们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其中包括大脑启发式的深度学习。利用人工智能模型设计灵感多来自基本的神经学习机制的研究，来进行更好的模式以及病毒的识别。我们也利用多模态的数据处理，利用先进的神经成像和电生理技术，探索各种情况下的跨模态信息的脑中的处理情况。

我们已经实现了不同模态之间的互相转化，利用深度神经网络将视觉和语言信息相融合，实现原始输入信息的语义理解。比如右下这些图，给机器一张图像，机器能够自动产生出语义的描述。一个在刷牙的孩子，长颈鹿在吃草，一个行驶的火车等等。在人机协作中的跨模态感知和学习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包括可视化调节视觉，以实现虚拟现实中的姿态训练等等。我们把开发的软件和硬件相结合，在第一期已经实现了一些典型的应用，包括多模态的机器人的抓取、交互和触觉的远程感知，以及机器人的在线服务等。在未来的跨模态学习中，我们将更加重视知识重用、语义理解、多感官数据处理以及它们的表征和记忆，开发下一代的强人工智能技术。我们将把理论和实践更加密切地结合，在人机交互、康复、病毒处理和人机协作等方面，取得更多的应用场景。信息通讯技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高度融合、交叉、协同来完成我们生物安全的责任，让我们共创和谐社会，共创美好生活。

青年对话分论坛主旨演讲

翻转极限：气候灾难对青年领袖的挑战

程一恒
罗马俱乐部成员
同济大学教授

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年轻的领袖在面对气候变化时在哪方面可以发挥一些作用。从工业上的角度来着眼的话，第一个是所谓的工艺改进，这个主要是指工艺的优化。减少碳排放优化。事实上，这是工程师传统的工作。因为它都是在工艺固定的情况下，做一些资源效率的提升，或者资源利用率的提升，就是叫所谓的工艺优化。就是发达国家资源效率用得更好，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相对是比较落后的，同时也有很大提升的空间。我们也相信，在今后（二氧化碳在 2050 年时要降至零）的 30 年里，对这个年轻一代工程师们还是有很多可以优化的部分。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就是二氧化碳的回收转化。转化我们指的是氢化和合成，或者封存。其实封存是很有争议的，因为主要是要确定有适合的地质，而且是保证不会变化的地质。从目前来看，不只是中国，全世界还是以化石能源为主来进行发电和生热。目前所有的已经存在的二氧化碳回收纯化等这些工艺都还没有达到商业化的过程，还处在实验室中试或者小试的阶段。所以今后的 30 年，二氧化碳资源化的工艺、开发、应用、商业化会是主轴的产业之一。因为二氧化碳资源化过程中的一个重点是甲醇，所以甲醇经济的时代基本上已经拉开序幕。

第三个方面是非碳工艺。前面讲的两个方面是在已经产生了二氧化碳的条件下在管道末端的治理。如果要从源头上去采取变化的话，就是要改变原来的所谓的碳工艺，而采用非碳工艺。所谓的非碳工艺是什么呢？就是在源头上就要采取不使用碳的工艺，譬如说氢基炼钢，目前用的是碳基炼钢，将来会产生的是氢基炼钢，现在在德国已经在做展示，或者实验的阶段，中国也开始在钢厂里在尝试着使用氢来作为能源，用氢来作为主体。当然，随后的还有不同的氢的应用，譬如说氢能发电、氢能电池、氢能社区等等。

中国最近考虑得比较多的是氢能社会，目前已经逐步开始用氢能电池作为汽车的能源，这逐渐会成为主流。但这个带来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也是非碳工艺是一个新的技术，即氢工艺。碳工艺是我们成熟的技术，我们的社会已经很容易接受，或者说已经完全地接受，甚至在这一方面都已经习以为常。但是换成氢工艺的时候，这是一个新的产品，关于氢本身的安全问题以及安全带给社会产生的后果，还有它的修复等这一连串在社会上可能造成的后果，变成了我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所以，关于新科技的采取，要考虑的是适应、转化、学习、进化这些方面的内容。相信作为青年的领袖，诸位一定会有越来越多像这类社会创新的项目可以参与。

新技术发明以后，对社会不同阶层会产生不同的变化，而且它会涌现一些新的需求。作为社会的主导者，作为青年的领袖，大家必须要去解决这些问题，或者是适应这些需求，也相信年轻的领袖都可以找到能最大化发挥才能的空间和机会。在非碳工艺里头，比如太阳能，大概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的能源使用比例占了 3%（2018 年 1.3%）都还不到，风能大约 3%（2018 年 4.7%），当然风能和太阳能有很多没有真正能够上网使用的弃电。水力用得比较充足，大概 10%（2018 年 16.2%）左右，可能到 12%。这些都是公认的无碳再生能源。

可是每一个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能源，都有各自的短板，我们应在今后的 30 年里面尽可能的减小这些短板，或者提高他们的利用率。这也是未来年轻的领袖们，可以做的事情。最后还有一个，大家都不太愿意谈的核能，目前是小于 5%（2018 年 4.3%），但它是无碳的。未来对核能，很显然地会进一步地确保安全，同时在核能废料的处理跟利用上，都比现在还会更完善。另外储能设备，储能设备必然是今后 30 年主要的产业之一。

最后我想简单谈一下交易平台，交易平台是碳排放权的交易。还有一个就是融资平台，所谓的绿色金融。今天的碳排放交易市场，欧洲大概在 25 欧元左右每吨，估计要涨到 65 欧元每吨，这个是像阶梯式的上涨。中国目前 25 人民币每吨。世界二氧化碳总排放的高峰大概在 420 亿吨每一年，其中中国占 120 亿吨。2019 年中国的交易量只有大概 2 亿吨，所以 2 亿吨对 120 亿吨，这只是一个调剂。

要想在 2050 年降低到零排放，那么用 50:30:20 的比例，就是第一个十年，基本上要减少的排放量是 60 亿吨。要想达到这样子的比例或者总量就必须改变总额。在之前我们都是用配额的方式，就是要改变成用总额逐步下降的方式。第二个，就是一定要加上碳排放税，只有在碳排放税增加的情况之下，这个碳的价格才会增高。增高的时候，才会使这个回收和再利用有利可图。融资方面，目前二氧化碳的市价大概 600 人民币一吨。从 65 元到 600 元提升的过程中间，如果以 300 元来计算，我们有 60 亿吨的二氧化碳要去做融资，这样总额就在 18000 亿元。也就是说，这个总额作为碳交易或者碳科技的融资，可以说是足够大的。

接下来就是国家发改委和银行可以用专款专用的模式进行融资。我认为青年领袖们可以做的实在是很多。以上罗列的只是工业的一些角度。气候变化或者气候灾难，确实带来一种危险的挑战，但是也是发展的机会。相信青年领袖们会好好地把握这个机会，发挥你们的才能。

如何通过非政府组织活动发挥青年人的影响力？

Odil Gafarov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 2017 届学者
上合国家青年平台项目负责人

SCOLAR Network 是一个隶属于上海合作组织驻北京秘书处的青年平台，上合组织 18 个成员国的青年领袖汇聚于此共同开发新理念、新项目。

“上合组织模拟青年论坛”是一个青年峰会，模拟上合组织的常规会议和首脑峰会，为青年领袖提供机会研究组织各机构的工作和运作方式，以及当前的地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新方法。“上合组织模拟青年论坛”秉承“上海精神”的精髓，传授基于共识的解决方案的基础知识，并成为年轻人与该地区政治领导人之间的一座“桥梁”。

今天的太和文明论坛青年对话分论坛聚集了最活跃的一群年轻人，他们正在对我们的社会产生影响。在座的每个人都知道，想要产生真正的影响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时间。我很乐意与大家分享我的经验，以及我从中学到的三件重要事情，这三件事对建设有影响力的项目至关重要。

我所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持之以恒。“永不放弃”很难学会，即使是军队也不会教。这是我曾经历经艰难才学会的道理。后来，这种坚持对“上合组织模拟青年论坛”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我们都快要失败了，但我们把挑战变成了机遇。

我学到的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是志存高远，有时候更高远的目标更容易实现。这就是为什么当我来到北京时，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很高的目标：学习如何实现互利共赢，建立一个未来领

导者的网络。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见证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和经济成就。我知道我们可以从中国朋友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在这方面，举办“上合组织模拟青年论坛”是一个极佳选择。事实上，上海合作组织是唯一将中国、俄罗斯、中亚地区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联系在一起的组织，也是唯一的区域性活动平台。

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努力工作。我们团队的重要特征就是我们都是非常勤奋和有纪律性的人。我记得首届上合组织模拟青年论坛筹备前夕，以及在海南省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国家青年代表大会时的那些不眠之夜，还有许多组织其他活动前不眠不休的工作时光。想不努力就做出成绩是不可能的。就像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的：“想要立竿见影看见工作成果的人适合去当一个鞋匠。”想要产生实质性影响就需要努力工作和付出时间。

事实上，近几年，这三件事让“上合组织模拟青年论坛”从一个形式简单的聚会发展成为一个享有盛名、对所在地区年轻人颇具影响力的青年项目。该项目因代表本地区青年活动发展的前瞻性方向被纳入2018-2019年上海合作组织杜尚别和塔什干首脑峰会联合声明中，并被各大媒体所报道。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团队已经完成了五个具有高竞争力地区会议的组织工作，这些会议聚集了 100 多位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高校机构和区域青年组织中的杰出人士。在此之前，从未有任何一个学生办的项目能得到国家领导人如此高的关注。

这样的影响来自团队协作，而不是某一个人的能力。只有一群能鼓舞人心的人聚在一起，才有可能取得理想的结果。在这方面，非政府组织和志愿组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将拥有不同技能和背景但怀揣相同理想与信念的人们聚集起来。如今，智库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指导和资助青年研究员从事前瞻性的工作。其中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太和青年国际学者联盟，青年学者可以聚集于此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并与资深专家交流。我认为我们需要发展这样的项目和联盟。我相信没有合适研究背景的倡议是不会成功的。因此，在未来的青年项目中，智库的作用将愈发重要。

最后，我想用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一句话来总结我的演讲，是这句话引领我来到中国，并开创了“上合组织模拟青年论坛”：“二十年后当你回看今天，你会更多地为你没做过的事感到失望，而不是那些你所做过的。所以摆脱桎梏，驶出安全港。在航行中抓住信风。尽情去探索，去梦想，去发现。”

分论坛重要观点综合摘要

国际关系分论坛

受疫情影响，第四届太和文明论坛国际关系分论坛于2020年9月6日至7日在线上举行，连续两天，200多位国内外嘉宾围绕“中美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这一主题展开了充分而有意义的交流探讨。现将有关国内外嘉宾的主要观点摘编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Rashid Alimov
太和智库高级学者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2016-2018）

中美作为两大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作为两大经济体，中美在过去的 40 年当中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互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美之间发生的任何紧张局势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负面的影响。

程永华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中日友好协会常务副会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特命全权大使（2010-2019）

日本会继续维持和加强日美同盟，但同时也会慎重处理好与临近各国的关系。尽管特朗普政府不断推动对华经济“脱钩”，但不少外资企业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企业都在中国取得了很好的发展。

崔立如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2005-2013）

中美能否真正实现对战略竞争的管理，取决于双方能否就合理认识和妥善处理新格局下的战略竞争建立一种稳定的关系框架。这一框架的实质含义是根据变化了的现实重建中美战略平衡。

Susan Elliott

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中美不应该让各方势力选边站，而应找到一个多边的途径解决问题。世界两大经济体需要合作，“脱钩”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此外，目前限制人员往来、留学生以及驱逐记者的行为也需要降温。人员交流是双方建立互信和增进互相理解的重要途径。

Thomas Fingar

美国斯坦福大学 Shorenstein APARC 研究员

很多中国人比美国人更担心中美关系恶化，认为责任在于特朗普政府。但这一问题应通过共同协商，而不能仅仅依赖美国来解决。

郭长林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知名国际问题专家

中国还是多极中的一极，不是两极中的一极。说中美是两极不太符合现在的国际现实，现在的国际现实可能还是多极，美国还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两极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未必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格局。

Geoffrey Harris

前欧洲议会官员（1976–2016）

中国和欧洲可能会是竞争对手，但同时也是国际体系中的伙伴，避免“脱钩”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欧洲与中国有合作关系，与美国也有共同的目标，但欧洲领导人最基本的目标是要维护多边主义与多赢。

Cliff Kupchan

欧亚集团主席

中美“两极”体系相对更加安全的原因有二：一是与美苏不一样，中美寻求的是经济上的平衡，而非军事平衡；二是中美合作，包括军事危机管理、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合作都可以成为未来双方合作的方向。新出现的中美“两极”体系有可能在短时内加剧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但也可能会使我们的未来更加稳定、更加安全。

Kishore Mahbubani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研究员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新冠肺炎疫情是中国的敌人，也是美国的敌人。既然有共同的敌人，中美就应携手合作，停止恶性竞争，共同应对疫情。

Evan Medeiros

乔治城大学沃尔什外交学院亚洲研究项目首任 Penner Family 讲席教授
美国乔治城大学 Cling Family 美中研究杰出研究员

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政策和美国的主流观点渐行渐远、背道而驰，尤其是蓬佩奥几个星期前在尼克松图书馆发表的讲话在美国两党内部并未获得广泛认同。美国商界非常关心中美科技合作，并不希望看到中美之间的冲突与对抗。

门镜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中国与欧盟在经贸、气候变化等领域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与美国相比，欧盟对华政策的出发点是发展合作伙伴，而不是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和中欧关系存在本质区别。

Stephen Orlins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

中国并没有对美国造成多大实质性威胁，无论是对于我们的国家还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果将中美关系定位为战略竞争，将有可能会损害我们未来的发展，中美领导人要重新审视中美关系。我们要结束战略竞争，这样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

钱锋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

印度游走于中美之间，“保持战略自主、借重但不依赖美国、对华务实但不友好”将成为其今后一段时间对外政策的一个方向。

Pravin Sawhney

Force 杂志主编

我所担心的是，即将到来的以信息技术为驱动力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因有太多不可控性因素，很多技术可以被运用到军事上，甚至可能会改变未来战争的形态。信息技术有“脱钩”的可能性吗？如果这种“脱钩”一旦发生，将会使世界两级分化，不利于人类的繁荣与福祉。

Susan Thornton

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亚太安全论坛项目主任

美国政府的一些行为造成了中美之间目前的问题，但中国也应仔细审视自己的政策和行为。如果中国不想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就需要思考如何帮助守成大国完成转变，就像美国当初帮助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一样。21 世纪，我们需要新思维，中美都需要改变，也必须和平共处。

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丝路学院副院长

中美恐怕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学会适应新的彼此。在此过程中，中美需要制定发布第四个甚至第五个中美联合公报，其中至少要包括一条：确立中美关系的基本底线，即不要发生战争。中美之间爆发战争将是人类的灾难。

王湘穗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中美之间存在战略竞争，但这种竞争不是“冷战”，“冷战”具有太强烈的排他性，不符合中美竞争的特点。用“冷战”形容中美战略竞争是一些鹰派政客设定的话语陷阱，目的是唤醒“冷战”记忆，动员西方世界建立“反华同盟”。中美要确立行为边界，实现“竞争式共存”，不要打翻了博弈的棋盘。

王在邦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知名国际问题和世界经济问题专家

世界格局不完全是一个力量对比的问题。美国和中国在经济上的确是两个世界大国，但判断世界格局是两极还是多极，不能完全从力量对比来看，还要看相互关系的状态。当今世界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出现两极格局了，应该还是一种复合多极的状态。

Vladimir Yakunin

文明对话研究院董事会主席
俄罗斯铁路股份公司总裁
（2005–2015）

跨文明的沟通是可行和可能的，而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也能够解决紧张和纷争。想要达成一个积极的结果，一方需要是明智的，而另一方也需要有智慧。中美两国有足够的智慧缓解紧张关系，跨越障碍。

邹明

凤凰新媒体副总裁兼凤凰网总编辑

中美两国在政治上“打嘴仗”，但军方相对都很低调。现在中美各自的政治手段依然没有用尽，美国面临选举，中国也面对疫后经济发展问题。中美两国都将在相当程度上保持定力，不大可能爆发战争。

教育文化分论坛

2020年9月8日至9日，第四届太和文明论坛教育文化分论坛成功在线上举行。来自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柬埔寨等国的职业教育专家学者、院校代表、企业家代表，围绕“构建未来人才职业图谱”主题，就职业资格框架、后疫情时代职业教育改革、职业教育评价与微证书、职业教育政策协调与跨国合作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陈李翔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

在整个改革过程当中，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知行合一、工学一体已经成为职业教育的基本原则。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政策正在成为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

John Clayton

新西兰 Awanui ā rangi 大学土著创新学院 Mark Laws 教席

要使证书获得国际认可，必须参照国际标准，保证培训的透明度。使职业技能培训与国际框架下的学习成果相符，使学分认定、累积和转换程序与国际通用方法相符。同时提供明确的证书等级说明，以及确保资历和证书的认定与国际通用做法相符。

高扬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财经与艺术系主任
中国－新西兰职业教育示范项目研究员

如何保证在线教育的质量，涉及教育教学理念的重新确立。我们把整个学习的概念进行了扩展。并不是只有老师给学生传递知识的过程，或者只有我们看似学习的行为才叫学习。实际上，只要是学生感兴趣的，包括学习资料的选择，在企业的在线工作，我们都纳入到课程中，只要和教学目标、课程目标相符，都纳入到课程学习的达成度。

顾伯平

太和智库首席文化学者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2013-2015）

职业教育对于广大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大众实现自身利益是极端重要和紧迫的。太和智库紧扣时代进步脉搏，依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将注意力集中于研究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推动职业教育国际合作，这是中外教育人文交流中最为迫切，也最为有效的工作方向。

Yosuke Kato

日本滋庆学园高等课程综合音乐科规划与推广系主任

对于教师来说，需要继续提升他们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技能。这样教师的教学内容、授课内容就会继续引起学生的兴趣，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教师们应该学会更好的分配课堂的时间，这样网上授课的角色才能得到更好的利用。

刘京辉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国家留学基金会管理委员会秘书长
（2008–2017）

建设国家资历框架可以清晰地展现接受不同层级教育的学习者的发展水平，不仅在形式上实现不同类型、不同层级教育的联通，而且在内容上也让不同类型、不同层级教育所需的知识、能力、素质得以衔接。目前，我国教育系统内部的不同资历、学历和职业资格的连贯性和融通性还不是很强。

马燕生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中国驻法国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
（2013–2017）

不同国家、行业、教育体系、学习路径的资格体系应该变得更加透明并且可以互相转换，从而实现对接，扫清障碍，最终能够帮助学习者和劳动者在这些相异的国家、行业、教育体系和学习路径之间自由流动。

Craig Robertson

世界职业院校与应用大学联盟主席
澳大利亚职业院校院长委员会
（TDA）首席执行官

我们现在讨论高质量职业教育正当其时，全球疫情对职业教育的影响，新技术带来的变化，以及职业教育原有的问题，都需要我们去找到解决方案。在澳大利亚，我们非常重视以工作能力为基础的职业技术培训，而不是单纯强调学习过程。这是培养人才的关键。

宋凯

有色金属工业人才中心副主任
全国有色金属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在后疫情时期，很多商业模式、合作模式发生了改变，技术技能人才已经成为深化“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供给侧需求。因此，开展多边合作，培养高质量专业技术技能人才是深化“一带一路”建设的迫切需要和重要保障。

Yok Sothy

柬埔寨国家培训学院主任

在柬埔寨对职业教育讲师的评估框架中，包括专业能力、学习能力、研究能力、教学实践能力和教学管理能力等。此外，团队合作、批判思维、沟通能力也是教师团队内合作的必要条件。教师发展需要开放的、交互的、互信的、弹性的外部环境。

王东江

北京市教委职成处处长

要加大专业的调整，人才结构要适应产业的需求，专业调整要适应区域和产业的需求。人才培养方案，要逐步对应国家的职业教育课程标准和未来的职业资历框架，加大校企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由多年来的学校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朝着未来学校和用人单位联合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要朝着高质量、高水平去转变。

杨昊

太和智库常务理事
完美世界教育副总裁

疫情正在改变着全球产业链分布、区域内产业结构以及行业内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行为。很多变化并不是由于疫情而产生，但是它们变化的速度由于疫情而加快。在职业教育方面，教育方式、教育技术、教育评价都在因为疫情而加速变化。疫情期间，线上教育变得不可或缺，基于数字技术的新型课堂被迫成为了主流。但是，我们显然没有为这种变化做好充分的准备。

杨钋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与
管理学系主任，副教授

为了加速多边技能合作，可以考虑将我国在地方实践中发展出来的多种多样的政校企合作模式率先推广出去，尝试在东道国的区域层面建立起由地方政府协调的技能投资模式，形成富有吸引力的跨境职业教育实验区。

余有根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职业教育与
培训部副秘书长

中国教育部组织了全国 53 万所各级各类的学校，2.8 亿在校学生，1732 万专职教师，开通了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面向高校免费开放，包括 1291 门国家精品课程和 3 万余门在线课程，成功实现了停课不停学。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在线社会实践，提升了各界对教育信息化的实践，同时加速了教育信息化的发展。

赵志群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
（2009–2018）

对知识和技能可以用考试的方法评价。能力评价的标准不是课程标准，而是实际工作对人的要求，所以没有标准答案。这两种评价方法各有所长，互为补充，但没有办法相互取代。

前沿科技分论坛

2020年9月10日至11日，第四届太和文明论坛前沿科技分论坛在线上举行。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生物医学及生物安全专家、数字与信息科技以及伦理与治理领域的专家和企业界代表，围绕“用新兴科技和创新机制维护全球生物安全”主题，就全球语境下如何应对生物安全威胁，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给生物安全及社会治理带来的启示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

崔建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院长助理

未来，再应对突发疫情时，以集装箱式、模块化为基础的应急医疗中心建设将逐渐成为主流。同时，我们要深入思考模块化的应用，包括一些医疗单元的设置。

Arran Gare

澳大利亚斯威本大学哲学与文化
探索教授
《自然与社会哲学杂志》主编

西方现代医学过于依赖高科技，对于病人的关注反而减少了，而中医有更统一、更全面的方法，更关注病人的感受。

顾伯平

太和智库首席文化学者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
（2013-2015）

要解决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真正提高全球语境下的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就必须有积极的、主动的、科学的态度，不仅要有这样的态度，更要有管用的方法。

Susan Pertel Jain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管理学院媒体、娱乐和体育企业管理中心全球合作总监

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包括环境破坏，需要人们切实改变生活和思维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改变行为模式。

Thorsten Jelinek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欧洲中心主任

美中之间有巨大的鸿沟，西方世界和中国之间也有巨大的差异。未来我们不能靠战略性竞争去推进历史进程，必须依赖合作，合作是基础。当下大国之间从合作变成竞争的趋势非常危险。

李兴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感染性疾病诊疗中心首席专家
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
突发事件卫生应急、
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委员

防控常态化要正确理解。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情况，但经济要发展，人要活动、要交流，因此防控常态化应该是动态的，要不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评估，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手段。

彭波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北京大学互联网研究院（深圳）院长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2012-2015）

在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舆论引导中，我们要做到温情的舆论引导与柔性的网络调控。一个好的故事，胜过一百句口号。在舆论场的调控中，要学会少讲道理，多讲一些故事和细节。一定要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用润物细无声和细水长流的手法去引导。

Andrew Schwartz

美国生态文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美国过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超越卫生问题成为了文明问题。如果我们只依赖疫苗和一些技术性解决方案，而不思考深层次的问题，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David A. Schwerin

美国伦理意识研究院院长
美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

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不稳定因素，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不平衡。社会的加速发展也进一步破坏了我们的栖息地，打破了自然物种的平衡。这种结果将使人类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

Wendell Wallach

耶鲁大学生物伦理跨学科中心
技术与伦理研究名誉主席
黑斯廷斯中心高级顾问

我寄希望于中国能够参与领导世界范围内技术方面的治理合作，使我们找到更多的方法，让科技造福于人民。当今世界，中国在数字科技、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方面都是数一数二的，希望中国能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王杰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隆正互联董事长兼总经理

这几年国内物联网企业发展迅猛，极大地推动了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应用，在中国建设一个更加高效、安全交互、军民融合的应急物资调动平台已经具备了相当强的技术基础。

王玉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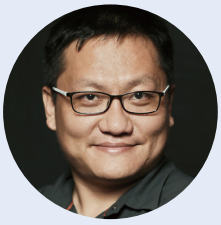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第四届
理事会理事长
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
（2008-2013）

生物安全有三大挑战：一是生物袭击，阴魂不散；二是自然杀手，肆意横行；三是技术风险，利剑高悬。需要增强我们的风险意识。

王治河

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
美国过程研究中心中国部
联席主任

对于今天的生态危机，科学难辞其咎。现代西方科学，是“一种极具工具理性的科学”，它是西方特殊文化的产品，仅仅是科学的一种形式，而且这种形式也是有缺陷的。现代科学是为工业文明服务的，随着工业文明的式微，现代科学也将走向式微。



尹烨

生命科学科普作家
华大基因 CEO

在科技抗疫方面，中国通过向外输出公共卫生健康领域的能力，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的一种新模式。

于洋

太和智库研究员
中译语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EO

我们需要利用大数据技术手段对生物医学大数据的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制定非常严格的管理措施、管理规定。

曾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传染病研究所所长

经过专业团队的讨论与合作，把信息整合后再传递给民众，这样专业知识就可以对舆情的控制发挥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张柱庭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我们需要利用大数据技术手段对生物医学大数据的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制定非常严格的管理措施、管理规定。

青年对话分论坛

气候变化的长期威胁愈演愈烈，人类生存环境持续恶化，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危机更是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同时也将深刻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青年是推动数字技术发展的生力军，也是应对全球挑战的重要力量。如何更好地激发青年的创造力与活力，如何更好地摒弃偏见、共同合作来应对全人类面临的问题，都是当下的重要课题。

2020年9月12日，第四届太和文明论坛举行青年对话分论坛。分论坛由太和智库主办，上海合作组织国家青年平台SCOLAR Network作为合作伙伴共同发起。来自学界与企业界的专家学者和全球青年代表以线上研讨的方式，共论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影响下的教育变革和困扰全人类的气候变化问题。

气候变化板块

Jovid Aminov
塔吉克斯坦国家科学院高级研究员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各种结果中，也包括二氧化碳排放减少。但是，这不会改变气候危机的整个趋势。显然，没有世界范围内的结构性工业改革，这种排放减少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程一恒

罗马俱乐部成员
同济大学教授

我们在讨论新技术及其带来的结果时，还要考虑另一个问题，也就是社会的恢复力。人类应该思考怎样应对这些新技术带来的变化。

Olga Krylova

俄罗斯铝业联合公司可持续发展及
市场营销经理

新冠肺炎疫情提示我们，气候变化并没有导致不可逆的环境改变。所以我们需要寻找更加智慧的方法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梅子雯

为蓝教育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创始人、执行理事长

服务业应当引导并要求消费者减少塑料的使用，我们期待外卖平台可以更加积极地支持和推动相关行动。可以倡导餐馆提供更加环保的包装，或者给予消费者经济上的奖励，鼓励消费者拥有更加绿色的生活。

Heïdi Sevestre

国际冰冻圈气候倡议科学交流主任
冰川学家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完全脱离化石能源，只能尽量减少使用，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冰川和冰盖，延缓海平面上升的速度，避免不可逆转的改变。

Max Song

Blockdynamics 创始人

2020 年至 2030 年，未来十年事实上是未来一到两世纪地球环境保护最关键的十年。我们用了第一年的大部分时间被迫进行反思，这是很有意义的。

青年对话分论坛

教育板块

古茜

悉之教育 CMO
中国技术社群联盟成员
SheroChina2016 女性影响力年度获奖者

技术不应受到地理区域的限制，我们在调查走访过程中，发现一些农村地区还没有完全认识到技术所起到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告诉他们应该了解技术能够帮助学生，学生需要有条件使用这些技术。只有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才有足够的动力去找到解决方案，才有足够的动力跟地方政府协作改善目前的状况。这不仅仅是怎样使用一个工具、一个产品，而是一种教育方式的改变，是在帮助提升教育公平。

黄尔诺

清华大学终身教育处世界慕课联盟发展高级主管

线上教育需要考虑到硬件条件的问题、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也需要考虑因材施教。每个人的兴趣点、特质都是不同的，需要给学习者建立起一些个人档案，如需要了解他们之前的背景是什么，他们目前的兴趣是什么，具体需求是什么。

Ekaterina Kologrivaya

燕京学堂研究生在读

我们需要把线上教育和线下课堂教育结合在一起，但同时我们不仅仅需要在教室里进行教育，也需要考虑走出教室，进行一些实践性教育。

林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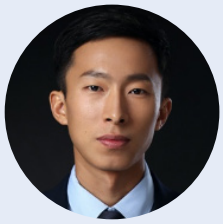
车车科技首席战略官

新冠肺炎疫情促使我们去探索更广泛的数字化学习平台及教学技术，如网上的语言教学和动手实践等，这是当前中国教育的发展趋势。但我们也需要关注人际交往方面的教育，要确保家长跟孩子之间保持沟通交流，同时孩子们也需要开展个人社交活动。

Leonie Nagarajan

亚欧基金教育部门主任

教育的路径不再是一条线性轨迹，而是一条伴随终身的灵活学习道路。教育支撑着社会流动性和社会凝聚力。我们需要一个建立在价值观基础上的教育体系，这些价值观使学习者在同理心、同情心和创造力的引导下改变我们的社会，使之变得更好。



田霖

晓天下教育创始人

疫情期间偏远地区学生的教育情况值得关注。教育部门可以考虑通过电视授课把一些教育资源、教学材料通过电视传播给学生们。因为中国有很多学生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有很多学生享受不到技术的便捷，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考虑的数字鸿沟问题，是不是所有学生都能够通过线上途径享受到基本的教育。

媒体传播

2020年9月6日-12日，由太和智库发起的第四届太和文明论坛于线上举行。为求论坛期间与会嘉宾能有更充分的探讨空间以及最大程度提升目标受众的参与度，本届论坛于8月18日至9月5日开展线上预热活动，以视频、图文等形式将各分论坛主旨演讲及相关内容于今日头条、抖音、微博、领英、Facebook、Twitter等海内外自有平台发布。据不完全统计，全平台播放量突破262.3万、点赞数超1.8万、评论数达851条，太和智库官号粉丝量增长1.2万。

第四届太和文明论坛获得海内外媒体高度关注，包括新华网、人民网、每日经济新闻、凤凰网、环球网、新浪网、中国网、金融界、香港中评社、香港大公报、香港明报、今日俄罗斯通讯社等在内的多家高权重媒体对本届论坛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全平台发稿累计72条。

预热视频

郭新宁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国际项目高级主任
关于重构中美关系
战略框架的几点思考

王在邦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知名国际问题和世界经济问题专家
新时代中国对美外交
需要耐心和智慧

John B. Cobb, Jr.
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
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创院长
生态经济学家
人类必须建立后现代
生态文明

陈虎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世界军事》杂志总编辑
(2006-2019)
中美军事冲突
威胁来自何方？

徐奔郁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关于中美关系的
三点宏观研判

Thomas Fingar
美国斯坦福大学
Shorenstein APARC研究员
中美关系以及国际体系

John Clayton
新西兰Awanuiārangi大学
土著创新学院Mark Laws教席
新西兰的TVET
与微证书改革

加藤洋介
日本滋庆学园高等课程
综合音乐科规划与推广系主任
在线教学与产学协作
模式下的职业教育

Kishore Mahbubani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
卓越特聘院士
推动中美地缘政治竞争
的深层次力量

钱峰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
对中美关系“危机时刻”
几个问题的看法

宋凯
有色金属工业人才中心副主任
全国有色金属职业教育教学
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志合越山海
职业教育合作为“一带一路”
建设提供人才保障

朱云汉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执行长
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
展望后新冠病毒的世界

蒋悦炜
协进教育集团董事长
世界终身教育委员会（CMA）
亚洲区主席
科技驱动下的
职业教育终身化

吴尊友
中国疾控中心
流行病学首席专家
秋冬季疫情反弹风险高
但有信心做好防控

Odil Gafarov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2017届学者
上合国家青年平台项目负责人
如何通过非政府组织活动
发挥青年人的影响力？

程一恒
罗马俱乐部成员
同济大学教授
翻转极限：气候灾难
对青年领袖的挑战

杨钋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系主任，副教授
国家技能形成体制
与多边技能合作

马燕生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中国驻法国使馆教育处
公使衔参赞（2013-2017）
欧洲资格框架
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张建伟
德国汉堡大学信息学科学系教授
多模态技术研究所所长
提升生物安全的人工智能
物联网、机器人技术

陈智敏
中国友谊促进会理事长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特邀）
公安部副部长（2009-2017）
抗疫斗争实践中
对数据权属问题的再思考

吴海龙
太和智库首席国际关系学者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
如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中美关系并非无法逆转

相关媒体报道（部分）

媒体	报道内容
中国网	【中国网-智库中国-中国圆桌第29期】2020太和文明论坛专题页
	【中国网-智库中国-中国圆桌第29期】吴海龙：中国会走稳自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
	【中国网-智库中国-中国圆桌第29期】马燕生：欧洲资格框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网-智库中国-中国圆桌第29期】Susan Elliott: 中美需要重启贸易和经济对话
	【中国网-智库中国-中国圆桌第29期】张柱庭：智慧交通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实践
	【中国网-智库中国-中国圆桌第29期】Craig Robertson：现在讨论高质量职业教育正当其时
	【中国网-智库中国-中国圆桌第29期】刘京辉：构建国家资历框架，助力中外职业教育合作
	【中国网-智库中国-中国圆桌第29期】John Clayton教授：新西兰微证书和中国“1+X”证书的侧重点相似
	【中国网-智库中国-中国圆桌第29期】吴尊友：新冠肺炎疫情及防控策略
	【中国网-智库中国-中国圆桌第29期】陈智敏：公民应该拥有数据权
	【中国网-智库中国-中国圆桌第29期】彭波：国家突发公共事件的网络舆论引导
	【中国网-智库中国-中国圆桌第29期】马凯硕：中美需联手应对共同挑战
	【中国网-智库中国-中国圆桌第29期】阿利莫夫：中美关系和每个人都密切相关
	【中国网-智库中国-中国圆桌第29期】共克时艰，砥砺前行——写在第四届太和文明论坛闭幕之际

中国网	【中国网-智库中国-中国圆桌第29期】诺罗夫：现代世界正处在前所未见的革命性技术变革边缘
	【中国网-智库中国】第四届太和文明论坛将于9月6日线上开幕
	【中国网-智库中国】太和智库：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都是灾难
	【中国网-智库中国】崔立如：中美需寻求建立稳定的关系框架
	【中国网-智库中国】融真知聚共识 第四届太和文明论坛开幕
	【中国网-智库中国】太和智库：中国开展职业教育对外合作，须考虑对象国的特殊性
	【中国网-智库中国】第四届太和文明论坛：融真知聚共识，开辟时代盛景
	【中国网-智库中国】教育文化分论坛：建立职业资格框架是中国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
	【中国网-智库中国】前沿科技分论坛：以系统性的认识和解决方案应对生物安全问题
	【中国网-智库中国】国际关系分论坛：对话是中美解决分歧明智的选择
	【中国网-观点】疫情凸显人类面临的全球生物安全威胁和挑战
每日经济网	【每经网首页-新文化热点】世界职业院校与技术大学联盟主席、澳大利亚职业院校院长委员会执行官Craig Robertson：技术和自动化会持续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
	【每经网首页-新文化热点】世界职业院校与技术大学联盟主席、澳大利亚职业院校院长委员会执行官Craig Robertson：技术和自动化会持续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
	【每经网首页-新文化热点】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赵志群：考试有对错之分，但能力没有
	【每经网首页-新文化热点】数字技术打破原有知识垄断 后疫情时代职业教育办学理念发生根本转变
	【每经网首页-新文化热点】她让50多个国家的人“画出生命”，吸引联合国、Facebook等争相合作
	【每经网首页-要闻】中国在线教育市场今年预计突破4000亿元 全球180个国家12亿学生需要线上学习
	【每经网首页-要闻】亚欧基金教育主任Leonie：教育成为全球性公共产品，后疫情时代需寻求颠覆性推动力
	【每经网首页-要闻】人类还没有错过气候变化拐点！碳捕捉、碳封存技术利用，提升可再生能源比例很关键

每日经济新闻	【每经网首页-要闻】疫情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意外影响？专家估算：一季度全球二氧化碳减排17%
	【每经网首页-世界】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丁一凡：竞争不应成为中美关系的障碍，而应激发发展动力
	【每经网首页-世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崔立如：中美需寻求建立稳定的关系框架
	【每经网首页-世界】欧亚集团主席Cliff Kupchan：稳定的两极体系正在形成 中美合作存在更多可能
	【每经网首页-世界】中美关系“螺旋式下行”？中外专家齐聚太和文明论坛共商合作发展之道
	【每经网首页-产业趋势】中译语通CEO于洋：目前需提升对公共数据集成分析能力
	【每经网首页-产业趋势】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柱庭：疫情中智慧交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每经网首页-推荐】华大基因CEO尹烨：大规模普及核酸检测是中国有效抗疫经验
	【每经网首页-推荐】北京地坛医院首席专家李兴旺：公共卫生危机早期预警意义重大
人民网	【人民网-国际频道】第四届太和文明论坛将于9月6日至12日举行
	【人民网-国际频道】融真知聚共识 第四届太和文明论坛开幕
	【人民网-国际频道】中美多方面深度融合 不可能轻易“脱钩”
	【人民网-国际频道】培养高质量专业技术人才是深化“一带一路”建设的迫切需要
	【人民网-国际频道】太和文明论坛聚焦四个主题 促进世界和谐健康发展
	【人民网-国际频道】全球青年应积极拥抱数字时代 要坚定保护人类健康
	【人民网-国际频道】“脱钩”中国，谁之祸福
	【人民网-English】2020 Taihe Civilizations Forum launched online, sets eye on opening up a bright new era
	【人民网-English】2020 Taihe Civilizations Forum concludes, calls for joint efforts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

今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	Эксперт рассказал, как Китаю и США наладить отношения
	Эксперт оценил вероятность военного столкновения США и Китая
	Шанс на улучшение отношений США и КНР есть только после выборов – эксперт
	Конфронтация КНР и США усложнит решение конфликта Китая и Индии - эксперт
	Китай должен приложить все силы, чтобы ЕС не встал на сторону США - эксперт
香港中评社	【首頁 -中評社記者專欄】太和文明論壇開鑼 中外頂級專家共研世界變化
	【首頁 -中評社記者專欄】崔立如答中評：美國對台政策現在有很大調整
	【首頁 -智庫匯聚】太和智庫論壇聚焦後疫情下的職業教育變革
	【首頁 -智庫匯聚】太和文明论坛：疫情下的新兴科技与生物安全
凤凰网	【凤凰网资讯–大陆】第四届太和文明论坛开幕 关注中美关系、新兴科技、青年发展
	【凤凰网资讯–国际】太和智库：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都是灾难 可在三方面寻求合作
	【凤凰网资讯–国际】美国前助理国务卿：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应帮助守成大国转变
环球网	【国际新闻–国际要闻】融真知聚共识 第四届太和文明论坛开幕
	【海外看中国–滚动新闻】美国人：特朗普中国政策和美商界观点背道而驰
新浪网	【新浪网–时事看点】第四届太和文明论坛将于9月6日线上开幕
	【新浪网–时事看点】第四届太和文明论坛将于9月6日至12日举行
新华网	【新华网–正文】专家呼吁中美双方合作应对挑战
香港大公报	【即時-兩岸】中美軍事相互威懾 崔立如籲中美戰略競爭管理
香港明报	【每日新聞-中國】中美學者論未來關係：需為競爭設邊界
金融界	【金融界首页–财经频道–环球资讯】第四届太和文明论坛将于9月6日至12日举行
云南网	【云南网–新闻频道–国际】太和文明论坛聚焦四个主题 促进世界和谐健康发展

太和智库 | Taihe Institute | 太和文明论坛 Taihe Civilizations Forum

T: +86-10-84351977 / F: +86-10-84351957
Web: www.taiheinstitute.org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甲52号 顺迈金钻大厦23层
Add: 23/F, ShunMaiJinZuan Plaza, A-52 Southern East Third Ring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100022